



12

ZHANHOUGUOJIZHONGDASHIJIANJISHI

● 战后国际重大事件纪实

分道扬镳

——苏南冲突始末

● 王捷新 著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战后国际重大事件纪实丛书

分道扬镳

——苏南冲突始末

● 王建新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豫生

封面设计：丁 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道扬镳：苏南冲突始末/王建新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1

(战后国际重大事件纪实丛书)

ISBN 7-5012-0857-3

I. 分… II. 王… III.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矛盾-苏联、南斯拉夫 IV. D1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0044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5.25 插页：2 字数：118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000

定价：7.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二战期间，
铁托领导人民武
装抗击德军的人
民。



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南斯拉夫“铁托”的游击
战士。



南斯拉夫解放后，铁托（左1）与他的军事将领们



战后铁托（签字者）前往苏联会见斯大林，签定友好条约

苏南交恶后，
铁托在南共五大
上抨击苏联的
大国沙文主义



铁托在中共举行的
“自治社会主义”
受到工人的拥护





1955年5月，赫鲁晓夫（讲话者）出访南斯拉夫访问“铁板”



1955年5月，铁托回籍苏联，确立两国新型关系

目 录

第一章	顽强不屈的民族，久经考验的领袖	1
第二章	苏南并肩抗击法西斯	22
第三章	共同战斗中的不谐之音	30
第四章	战后初期的苏南关系：控制与反控制 ...	48
第五章	粗暴的干涉，巨大的压力	61
第六章	铁骨铮铮，顽强抗争	90
第七章	勇于探索，走自己的路	122
第八章	不走回头路：苏南新型关系的确立 ...	129

第一章

顽强不屈的民族,久经考验的领袖

● 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

在世界现代史上,在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上,先后有两个称作“南斯拉夫”的国家,两者之间既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但在领土范围上又有重大变化。第一个南斯拉夫存在于1918—1991年,其名称也有几次变化,1918年建立时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改为南斯拉夫王国,1945年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但领土面积没有重大变化,约25.5万平方公里。第二个南斯拉夫称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是从1991年正式建立的。由于1989年东欧巨变的影响,造成了原南斯拉夫的动乱和分裂,1990年以后,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马其顿先后独立,原南斯拉夫内的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自治共和国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领土面积约10.21万平方公里,约占原南斯拉夫的40%。我们这本书要讲述的,是第一个南斯拉夫和苏联关系的一段历史,主要是1948—1956年苏南之间的恩恩怨怨,认真剖析这一冲突的来龙去脉,对于人们正确把握国际关系发展的内在规律和

发展趋势，有重要启示作用。

南斯拉夫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建立是一部充满了艰辛和苦难的历史。在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初的古罗马文献上出现了斯拉夫人的记载，他们是欧罗巴人种东欧类型的一支，以后逐渐分化成三大支系：东斯拉夫人（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西斯拉夫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卢日戈人），南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黑山人、保加利亚人）等。

公元6至7世纪，斯拉夫部落来到巴尔干半岛，开始在东阿尔卑斯山和德拉瓦河上游沿岸定居，后扩展到弗里乌利平原和的里雅斯特内地，并在反对拜占庭、法兰克、威尼斯人的斗争中先后建立了一些中古式的小国。9世纪起，原南斯拉夫地区，曾在与异族侵略斗争中先后建立过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马其顿民族的国家。16世纪初，南部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分别为奥地利、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威尼斯共和国所占领。在异族统治的400多年期间，南斯拉夫地区各地曾举行了许多农民起义、武装暴动，与占领者进行了英勇斗争。

1809年，塞尔维亚的农民起义军在和土耳其占领者的一场激战中，由于寡不敌众而失败，土耳其占领者为了恐吓塞尔维亚人，竟用952个起义者的头颅砌成一个长宽高各约4米的正方形头颅塔。这个塔今天成为异族血腥镇压南斯拉夫人罪恶的见证，同时也成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英勇斗争的象征。

1878年塞尔维亚公国独立并获得国际承认，1882年正式宣布为塞尔维亚王国，但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等地区仍然处于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的统治之下。

随着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民族觉醒，南斯拉夫人和巴尔干各国反对土耳其的斗争也日益高涨。1912年，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签订同盟条约，希腊与保加利亚缔结军事协定，黑山也与塞尔维亚签订了条约。同年10月8日，黑山首先对土耳其宣战。10月14日，其他三国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10月17日土耳其向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宣战，次日希腊又对土耳其宣战。

在战争中，巴尔干各同盟国节节胜利，土耳其军队土崩瓦解。1913年5月30日签订《伦敦条约》，结束了土耳其在巴尔干的统治。

20世纪初，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形成了“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使巴尔干半岛这一战略要地成了列强之间争夺的中心。英法资本已开始向塞尔维亚、黑山等地区渗透，沙俄则与奥匈帝国达成默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塞尔维亚北部部分地区归属奥地利，黑山、马其顿等属沙俄的势力范围。

正当帝国主义列强间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奥匈帝国吞并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一事件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发生了波斯尼亚青年刺杀奥国皇太子事件。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以此为借口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战后，1918年10月，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人中断了与奥匈帝国的一切联系，成立了南斯拉夫人的新国家，11月宣布与塞尔维亚王国统一，同时黑山和伏伊伏丁那也作出同样的决定。1918年12月1日，在贝尔格莱德宣布成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

国，它包括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大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马其顿、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地区。自此，在南斯拉夫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国家。1929年1月6日，国王亚历山大宣布实行独裁专政，并将国名改为南斯拉夫王国。

● 在艰辛的环境中走向成熟

南斯拉夫成立统一王国后，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是经济上仍然是外国资本控制下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从其本质看，仍是一个以君主政体为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它存在的20多年（1918—1941）里，总共更换过34届政府。所有这些政府都是执行民族压迫和奴役劳动人民的政策，因而南斯拉夫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

随着外国资本的渗入，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发展壮大。早在19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就已开始传入南斯拉夫地区。19世纪90年代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首先成立了社会民主党。以后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等也先后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在马其顿也成立了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与此同时，各地的工会组织也纷纷建立。工人阶级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斗争。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南斯拉夫革命形势逐渐高涨。有3万多南斯拉夫人在一次大战期间参加了奥匈帝国军队，后被俄国俘虏，他们参加了十月革命，其中许多人（包括铁托）回国后成为革命活动的倡导者和积极参与者。

1917年，特别是1918年，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地

区，工人罢工、群众性示威、武装部队起义、农民自发运动越来越频繁。但是，当时各地区的社会民主党无论在思想上政治上或组织上都没有能力把这些活动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并给他们指出革命的前景。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1918年末，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工人组织提出了联合的倡议。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采纳了这一倡议，号召一切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党。1919年4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统一的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统一的政治组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加入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中央委员会，菲利浦·菲利波维奇被选为总书记。与此同时还召开了工会代表大会，统一了工会组织。1919年还成立了统一的革命青年组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1920年6月在武科瓦尔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党。

1920年南共参加了议会选举，获得了59个席位，成了当时议会中的第三大党。1920年12月资产阶级反动政府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颁布禁止共产党和革命工会活动的法令，查封了南共和工会领导机关及出版机构，大肆逮捕和迫害共产党人。1921年8月，国民议会通过了所谓“保卫国家法”，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禁止共产党的一切活动。南共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中央委员会迁往国外，革命进入低潮。一直到1941年4月南斯拉夫遭受德国法西斯占领，南共一直属于非法政党。

南共转入地下后，面临一个主要任务，即为建设地下党制定思想、组织原则，并寻求适当的形式，使党同工人阶级及劳动群众加强联系。而当时南共内部不统一，形成了两个

领导中心。一个是国外的执行委员会，由流亡维也纳的一些领导人组成，另一个是国内的代理执行委员会。他们在政治、思想、组织、农民、民族等问题上意见分歧，这种分歧越来越明显，终于形成左右两派。南共内部出现派别斗争并不偶然，因为它是由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旧的改良主义思想残余对它仍有很大影响。1926年5月，南共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虽然对派别斗争进行了谴责，两派领导人作了自我批评，但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会后，派别斗争更趋激化，使党内政治活动能力近于瘫痪，使党濒于分裂。

1929年1月，南斯拉夫国王为了摆脱国内政治危机实行政变，废除了宪法，解散了国民议会，实行君主法西斯专政。南共趁此机会发动武装起义准备推翻反动政权。由于当时武装起义条件不成熟，双方力量悬殊，实际上是一次冒险行动，结果南共遭到残酷镇压，牺牲了许多优秀干部，数百名党员被判处长期监禁和多年苦役，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以致从1930年到1931年间，只存在一些分散小组，党内生活处于停顿状态。1934年12月，南共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铁托被选为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南共党组织开始重新活跃。

1935年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法西斯国家越来越公开地实现其侵略计划。为了开展反法西斯斗争，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建立人民阵线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南共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政治活动，如罢工、示威游行、参加竞选运动等，并使这些活动具有反对现存制度和反法西斯主义的特点。这标志着南共力图改变多年来所处的地下状态，第一次在较大范围内参与了国内政治生活。在这种形势下，南共必须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制定出斗争的策略方针，

以便进一步地开展政治活动。

而从1929年至1937年，南共中央领导机关一直在维也纳、巴黎、莫斯科，在1933年以前与国内的党组织几乎没有或很少有联系。中央领导机关长期在国外，与国内党组织脱节，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无法领导国内斗争。而且领导机关的绝大部分成员长期流亡国外，其中许多人既有宗派主义，又有个人野心，争权夺利，妨碍了党的统一和团结。因此，整顿和改组党组织成了南共面临的首要任务。

1935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铁托作为参加大会的南共代表团成员，即提出过党的领导机构必须迁回国内的问题，然而南共国外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如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都不愿听。1936年，铁托当时正在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工作，再次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出这个问题，认为党的工作取得胜利的基本先决条件即党的领导人必须在国内和群众同甘共苦。此意见得到季米特洛夫的支持。共产国际任命铁托为南共中央委员会组织书记，直接领导国内的工作，为在国内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准备条件。总书记戈尔基奇留在巴黎，从国外领导党的工作。

1936年8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南共领导干部会议。会议通过决定，铁托和中央组织书记处动身回国，承担起对党和工人运动的直接领导。同年12月，铁托抵达国内。这使他有可能同在日常的革命斗争成长起来的党的积极分子直接共事，加速贯彻执行从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建设党的措施，而这正是他多年来的一贯主张。

3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搞“肃反运动”，甚至波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比如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就有8人被指控为外国间

谍被处决，并导致 1938 年波兰共产党被解散。南共也未能幸免。1937 年 7 月，南共总书记米杰·戈尔基奇被控为“外国谍报机关的代理人”而被捕，在莫斯科的许多南共领导人也被捕，所幸的是铁托于 1936 年底回国而免遭此劫难。加之南共党内派别活动严重，在共产国际名声不好。于是，共产国际准备解散南斯拉夫共产党。铁托坚决顶住，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汇报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以及人民阵线、工会、青年工作实况，提醒他们不能根据南共中央的状况来估计整个南共的状况，强调派系斗争是在党的上层，主要盛行于流亡者中间，而基层组织是健康的，并要求共产国际同意在国内建立新的领导机构。到 1937 年 12 月，才收到共产国际指示信，由铁托担任南共总书记，以后并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有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等。铁托任总书记后，决心根据马列主义原则对党进行整顿和改组。据季米特洛夫回忆，早在 1936 年铁托离开莫斯科时就曾发誓说，南斯拉夫共产党将洗刷掉被各种派系分子涂上的污点，证明它无愧于它的名称。

在争取最终摆脱派系斗争和争取加强南共的团结的这场斗争中，铁托特别重视南共的独立和确立南共自己的政策和战略。他完全明白，能否把南共建设成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点。因此，在铁托回国担任南共总书记之后，毅然着手采取一些实际步骤，对党进行了整顿。

南共通过整顿，党员队伍得到发展和巩固。1929 年党员只有 3500 人，1940 年达到 6500 人，到 1941 年反法西斯战争开始时，党员已增加到 12000 人。南共的这次改组和整顿，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使党有了一个以铁托为首的领导核心，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正是这样的党，成了南斯拉夫全国各族人民抗击敌寇的中流砥柱。

1940年10月，在铁托主持下召开了南共第五次代表会议。会议总结了南共的整顿和改组工作，指出：通过整顿和改组，克服了过去的缺点，消除了派别，纯洁了自己的队伍，南共已经成长为思想上、政治上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会议还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在欧洲，法西斯已开始进攻，南斯拉夫已受到直接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南共制定了争取民主化和保卫国家独立的战斗纲领。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熟，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为后来领导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 非凡的经历，杰出的领袖

诚然，从根本上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是不可否认，杰出人物对于历史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南斯拉夫的革命史、南共的发展史是和铁托的名字紧密相连的。时势造英雄，正是南斯拉夫的特定的历史条件造就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传奇式的人民领袖约瑟夫·布罗兹·铁托。

1892年5月25日，位于克罗地亚扎戈尔耶的库姆罗维茨村，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诞生了一个男婴，男婴的父亲叫弗朗茨·布罗兹，母亲叫玛丽娅·米齐卡。这已是他们的第7个孩子了。他就是未来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新南斯拉夫的缔造者、南共总书记、联邦总统约瑟夫·布罗兹·铁托。

由于家庭的贫穷，约瑟夫前边的6个哥哥姐姐，已经死掉了4个，因此，他就成了活着的孩子中的老三。他从小就养成了干活的习惯，小小的年纪，汲水、放牛、照料牲口、跟外公到山林里去烧木炭，什么都干。为了渡过难关，有时不得不去借债，小约瑟夫常常拿着父亲的借条，到村子里某些家庭去借债，这时，他常常要遭到别人的白眼，甚至无言地倾听某些人的无端咒骂，为了一家人生存下去，他不得不忍气吞声，但是他那从小养成的倔强性格却让他最难以承当这件事，他宁愿多干些粗活，也不愿意去乞求他人。

约瑟夫8岁那年，不幸得了白喉病，这可是要穷人命的病。那些岁月家里哪有钱去给孩子治病，他发了好几天的高烧，难受地闭着双眼，蜷缩着身子蹲在灶旁，面色枯黄，村里人都说恐怕这个孩子留不住了。母亲满面泪水，紧紧抱着他，痛苦地喃喃着：“不能，谁也不能把我的孩子带走……”

就这样，小约瑟夫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病好后，他开始去上学。有一天，学校老师问他：“约扎（铁托的乳名），长大了你想当什么？”

约瑟夫不假思索地回答：“当跑堂的。”

老师惊奇地问：“你干吗要当这个？”

“跑堂的穿着一身漂亮的黑衣服。我就想穿得漂亮。”

约瑟夫看到老师不满意的表情，又改口说：“好吧，那我当裁缝……”

“为什么要当裁缝？”

“自己是裁缝，我就可以给自己缝一身漂亮的衣服……”

看来，少年时代的铁托最大的愿望和理想就是当裁缝，穿新衣。

约瑟夫一天天长大了，15岁那年，他跟了村里一个在外

面当兵的人，毅然离开了穷乡僻壤的库姆罗维茨村，来到一个叫锡萨克的小城市。他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他更想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在锡萨克，约瑟夫真的当上了一家饭馆的跑堂。但没过多久，他就干烦了，到了一家锁厂当学徒。1910年，他18岁那年到了克罗地亚最大的城市萨格勒布，在一家私人机械工场做工。这一年，他第一次直接参加了政治活动——五一节游行，并参加了五金工人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当时的铁托还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是政治，他参加工会，只是觉得工会组织能给他带来好处，在他失业的时候可以领取失业救济费，而不致于饿着肚子。

20世纪初的巴尔干半岛存在着南斯拉夫人，但并不存在统一的南斯拉夫国。约瑟夫的故乡克罗地亚，当时还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1913年，约瑟夫年满21岁。按规定，他要到帝国军队服兵役。年底他加入了由克罗地亚人组成的部队——第25后备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年，奥匈帝国加紧实施入侵塞尔维亚的作战计划。由于准备仓促，虽然对塞尔维亚发动了三次攻势，都未能成功。由于南斯拉夫各民族被分割在不同的国家，在巴尔干半岛所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南斯拉夫人自相残杀战争。

在进攻贝尔格莱德的战役中，约瑟夫所在的第25后备团也在其中。不过，他倒没有加入与塞尔维亚的南斯拉夫人的相互肉搏之中。因东部吃紧，他所在的部队被调往喀尔巴阡山，去与俄国人作战。在开往前线之前，他因诅咒战争，并当着别人的面曾说过他盼着帝国在战争中失败，盼着帝国早日瓦解的话而被关押过数天。

在前线，约瑟夫目睹了战争的残酷。这使他更加痛恨战争，他甚至说如果自己的团要开往波兰的加利西亚，到了那里他就向俄国人投降。为此他被军士长捆了起来，还被投入佩特罗拉丁城堡的监狱关了好几天。

约瑟夫还没有来得及向俄国人投降，却已做了俄国人的俘虏。他被送到位于西伯利亚的彼尔姆城一个叫孔古尔的火车站，被指定为战俘营的领队，每天干着修筑铁路的重活。在那里，他开始与铁路工人和布尔什维克有了接触，经常出席他们的会议，还第一次阅读了列宁的文章和一些反战材料。约瑟夫觉得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主张是亲近的，因此他在战俘中宣传这些主张。他说：“我曾经是社会主义者，我曾属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显然，当我处于像伟大俄国革命这样的事件中间的时候，我完全被卷进去了。我双手赞成改变社会存在，改变社会制度的想法。特别是由于在这之前，我已经看到专制压迫的沙皇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我的思想和活动同俄国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活动是完全吻合的，尽管我是被俘的奥地利士兵。”

在列宁思想的影响下，他的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以后因他组织俘虏参加抗议俄国人对他们凌辱的示威而被关了14天禁闭。在集中营里，他几乎被鞭打致死，后来又被锁起来。1917年6月底，约瑟夫在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帮助下逃到了彼得格勒。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约瑟夫很快赶回孔古尔的俘虏营，在那里他参加了国际赤卫队，坚定地站在俄国无产阶级的一边。赤卫队里全是些捷克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战俘。在国际赤卫队里，这些战俘们读了多篇列宁的有关俄国革命的小册子。他和其他战俘一起，提出了加入俄

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俄国国籍的申请。

1919年4月，约瑟夫成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南斯拉夫支部的成员。9月他和一个俄罗斯姑娘佩拉吉娅·别洛乌索娃结婚，并决定一起返回自己的祖国。

当一次大战爆发约瑟夫离开家乡开赴战场时，巴尔干的南斯拉夫人还分别处于几个国家的统治之下。当他回到故土时，巴尔干的南斯拉夫人已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国家统一了，然而人民并没有得到任何实惠，仍然遭受着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哪里有剥削和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工人罢工，农民暴动，这些抗议斗争席卷了南斯拉夫社会的各个阶层。

这时，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影响日益增长，它构成了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巨大威胁，统治阶级时刻准备铲除共产党。

约瑟夫正是在国家处于这样的形势下回到故乡的。他首先与党的组织取得联系，接着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领导工人示威游行，并且在工会办的报纸上写文章，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迫害。文章说：“同志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别无他法。没有人会来关心我们。所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仅仅是一纸空文而已。同志们，我们大家一定要全部加入战斗的工会组织，然后开展一场有力的斗争，来反对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

在南共被反动当局宣布为非法的时代，约瑟夫从事反对当局的政治活动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他曾几次被工厂作为“危险的共产党”而解雇，又几次被警方逮捕，关进监狱，他也曾设法从监狱逃跑过。

1928年8月2日，南共中央局任命约瑟夫为南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省委书记。8月4日，他再次被捕。1928年

11月7日，在萨格勒布法院，由5名法官组成的法庭开始对约瑟夫等人进行审讯。公诉人起诉后，首席法官托米奇问约瑟夫是否知罪，他说：“尽管我承认公诉人对我的指控，我不认为有罪，因为我认为这个法庭无权审理，只有党的法庭才有权。我承认，我是非法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党员，承认我散布共产主义思想和宣传共产主义，并一再指出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是多么不公正，这一切我都是在各种会议和同人的谈话中这么做的。我说不清所有这些会议都是在哪里举行的。1921年，共产党被解散，从合法变为非法，自那时以来，我就一直这么做。”

当托米奇又问他：“你上过什么学校？”

他说：“我上过4年小学和2年平民中学，然后去学手艺，后来参加了战争，被俄国俘获，成了俘虏。我于1919年回国，在别洛瓦尔当了4年机械工人，后来到克拉列维察造船厂，到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干活，但是由于参加工人运动，总是被解雇。我是共产党人，因此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我宣传：如果资产阶级继续掠夺人民，那就要用武力来夺取政权。只有用武力来粉碎武力。”

就是这样，约瑟夫在法庭继续宣传共产主义，为了表示自己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他还说：“我认为，自然规律强于一个阶级为了压迫另一个阶级而制定的法律。为了自己的理想，我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11月14日法庭宣布判决，约瑟夫·布罗兹被判处5年苦役。次日，萨格勒布一家右派报纸《新闻报》对这次审讯的结束有一段报道：“……这次共产党人审判案昨天结束了。在结束时，布罗兹的声音再次在法庭上占据优势。在判决宣布后，他站起来，面对着那些已经站起身来准备退场的人数

众多的旁听者大声喊了3次：‘共产党万岁！’‘共产国际万岁！’在法庭上当然会有不少他的同志。可是，他的同志们并没有跟着他喊，尽管他们在内心里是跟着他喊的。

“就这样，这位不屈的共产党员喊了口号之后，便消失在监狱的高墙后面，犹如一位遇难的船只的船长发出口号，与他的船只一起消失一样。”

这悲壮一幕的描写真实反映了铁托不愧是南斯拉夫的一名真正共产党员，时势也必将造就出铁托这样的一位人民领袖和英雄。

在服刑期间，铁托过着非人般的生活。旧木板上铺着一些稻草，既没有床单，也没有枕头，夏天一条薄毯子，冬天换一条厚毯子。每天还要糊一定数量的纸袋，或整理鹅毛。

然而，约瑟夫却仍然没有停息与反动当局的斗争，他还建立了狱中党的组织——地方委员会。委员会有3人组成，他是成员之一。他们组织犯人开展绝食斗争，要求政治犯住在一起，要求狱方停止对犯人的非人道做法等，狱方被迫做了让步。他们还组织犯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活动，委员会的想法是把监狱变成一所大学校。

学习的条件极差。一是没有课本和教材，二是没有教员。有限的学习材料，包括书籍，是靠与监外的党组织以及同情者的联系中带进监内的。没有教员，则是采取能者为师，轮流授课的方式来克服的。约瑟夫·布罗兹本人经常当教员。有一次轮到他讲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为了把课讲好，他颇费了一番功夫备课，受到同志们的欢迎和赞扬。

在狱中，他还充分利用学习的机会和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学习语言，先学了世界语，接着又学了英语。而更多的时间，就是和其他犯人共同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切，对他

出狱后从事革命领导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功底。

1934年3月，约瑟夫刑满释放。当时由于反动当局的迫害，南共中央已被迫迁往国外多年。党中央远离国内斗争实际，不了解国内的真实情况，不能很好地指导国内的斗争，加上党内派别斗争愈演愈烈，给党组织带来极大混乱，致使国内的党组织和党员对此甚为不满。

萨格勒布省委是南斯拉夫国内最强大的党组织，他们早就决定与中央建立正常的渠道，向中央真实地反映党员对中央的意见与要求。约瑟夫作为该省的省委委员，这一重任落到了他的头上。

这时，约瑟夫改名叫铁托。他为什么选用了铁托这个名字呢？据他自己说：“我用这个名字大概在1934—1936年间，确切时间记不清了。用这个名字没有任何特殊原因。在我的老家扎戈尔耶经常听到有这个名字，可能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采用的。”的确，铁托这个名字在约瑟夫的故乡多次被采用。铁托·勃莱卓伐茨基就是100年前扎戈尔耶的著名作家。克罗地亚的伟大作家山道尔·热拉斯基的父亲也叫铁托。七八月间，铁托前往维也纳，向党中央汇报了国内的情况及普通党员对党中央设在国外的意见。

1935年2月，铁托接受党的安排，前往苏联，他被分配到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工作，主管南斯拉夫事务。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他用了另一个名字：瓦尔特。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铁托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见到斯大林，不用说，斯大林的形象给铁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铁托一直力主把党的领导中枢由国外迁回国内，他认为，党中央委员会如果还像过去那样，设在外国某个地方，远离国内的实际斗争，那就不可能领导本国劳动人民取得斗争的

胜利。铁托特别反对党的领导长期流亡国外，用别人的头脑来代替自己的头脑。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而是一味生搬硬套别国的经验，或者消极地等待共产国际指示，认为这对党的事业发展是十分有害的。他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支持。1936年底，作为党的组织书记铁托回国工作。

铁托回国后，立即投入整顿和健全党组织的艰苦斗争。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整党步骤：首先，要把各级党的组织健全起来，形成自上而下的指挥得力的组织系统。第二，克服地方主义情绪，树立全南斯拉夫一盘棋的思想。第三，清算党内的宗派主义，加强党的团结。第四，党必须不依赖外援而在经济上保持独立。第五，对党员进行教育。

前三步工作铁托是通过三个方面进行的。一是从组织上尽量给予保证。他所挑选的各省领导班子的核心，是反对各自为政倾向、保证全南斯拉夫统一的。在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尤其要如此。二是进行教育，通过学习来铲除人们头脑中的各自为政倾向。三是通过斗争实践来矫正人们的观念，使大家明白，在南斯拉夫各族之中，所谓的地域独立既不符合地区的利益，也不符合全南斯拉夫人的利益。

当然，铁托清醒地认识到，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它是党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斗争任务。这一斗争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革，时而缓和，时而激烈。

为了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一方面，铁托恢复了停刊多年的《无产者报》的出版，并亲自撰写文章，结合时局特点，有针对性地向党员及党外积极分子进行形势教育。另一方面，下大力气组织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外，秘密地发送各地供党员阅读，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铁托明确向共产国际申明，不再接受津贴，而改由党自身在国内筹集所需经费。在共产国际时，铁托就公开谈过，南共不再需要津贴，党将自行筹款，也即在国内可以得到金钱上的支持。在铁托看来，这么做是重要的。因为使一个运动士气低落莫过于它从外界得到钱。这样的援助只会毁坏干部，而更不用说这种做法只会使他们从属于给钱的一方。因此，南共从铁托负责领导之日起，就停止接受国外津贴，党的经费主要来自本国工农群众的捐助。这样，铁托成为不再依赖外国津贴的第一任党的书记，他铲除了滋长党内宗派斗争和腐败的温床。对此，铁托后来回忆说：“我们决定停止接受国外的援助，最后把党的领导机构搬回国内。我们把它带回到了党员中间，带回到了工人和青年中间，带回到了他们的斗争和希望中间，我认为这个步骤是正当的。这不仅表明我们反对国外的官僚主义领导，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方法，而且也使南共面对生活中的真正问题，面对它自己的人民和它自己的工人阶段……”

所有这些努力都收到了显著的成效。1938年5月，铁托在利斯卡山组织了由国内干部组成的南共领导机构。铁托建立起来的领导核心，已经成为与以往党的领导机关截然不同的战斗集体，有了一种集中统一的意志，而这种意志一旦形成便立即变为现实行动的指挥中枢。在以后的民族解放战争和苏南冲突中，这一点可以说表现的尤为突出。

1939年1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肯定了铁托的工作，并且同意铁托新组织的南共临时领导机构正式成为南共中央委员会，由铁托领导。铁托的魅力和卓越的组织才能，赢得了南共党员对他的信任和爱戴，他们发自内心地拥护铁托的领导。1940年10月，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第五次代表会议

上，铁托当之无愧地成为党的总书记。

铁托后来回忆说：“我没有夺取党的领导权的野心，我从来没有过。但是，我的确希望党是强大的、坚定的、革命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要成为领袖，但我的确希望要有一个能够工作的人成为领袖。对我来说，重要的是集体应当是强大的，领导应当是强大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集体。”他自己是问心无愧的。他自己觉得无愧于对党的忠诚。他对自己的未来，对未来的工作怀着一种炽热的天职感。他已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奉献了出来，如果有最坏的情况出现，他甚至决心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殉伟大的事业。

鉴于德、意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意图越来越明显，党的第五次代表会议后不久，铁托立即着手组建南共军事委员会，并自任“书记”。他还派了一些南共党员打入王国军队，和一些高级军官建立了联系。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已预见到希特勒早晚有一天会向南斯拉夫发起攻击，后来发生的事实应验了铁托的预见。

1941年4月6日，正是星期天，德、意法西斯以23个师的兵力不宣而战侵入南斯拉夫。南政府事先没有采取任何防卫措施，而且首相女儿的婚礼正好安排在这天。6日早晨，法西斯德国对贝尔格莱德进行了野蛮空袭，整个城市淹没在浓烟和火海之中，死难者达二万人。

法西斯军队在数量和装备上远远超过南斯拉夫的军队。因此，战争只进行了12天，南斯拉夫王国即土崩瓦解。国王和政府以及各个资产阶级政党的200多名上层官员带着家眷和金银财宝逃往国外。1941年4月18日，南军投降，侵略者占领了南斯拉夫。

接着南斯拉夫领土立即被瓜分：德国占领了斯洛文尼亚

北部和塞尔维亚；意大利占领了卢布尔雅那和斯洛文尼亚南部、克罗地亚沿海地区，并对黑山、科索沃和马其顿西部实行军事管制；保加利亚占领了马其顿大部 and 塞尔维亚南部边境地区；匈牙利占领了伏伊伏丁那部分地区。

在德、意、保、匈军队占领南斯拉夫的同时，他们还在克罗地亚建立了所谓“克罗地亚独立国”，由法西斯分子安特·帕维里奇执政。后来，又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划入了“克罗地亚独立国”。德国人还在塞尔维亚找到了原政府陆军部长、南方军队司令米兰·内迪奇充当代理人。留在国内的旧南斯拉夫政府军上校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组织了新法西斯的武装军队——“切特尼克”。

南斯拉夫领土被瓜分，各族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这关键时刻，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挺身而出，于1941年4月15日发表了告人民书，宣布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决心进行反侵略者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两个月之后，以铁托任总司令的南斯拉夫解放军游击队正式成立，从此开始了长达4年之久的解放战争。

在战争中，南斯拉夫对付的敌人拥有最现代化的重武器，有飞机坦克，有医疗设施和足够的粮草。而南斯拉夫游击队吃的是野菜、草根和马肉，虽然仅能勉强维持生命，但却抗击着越来越猖狂地向他们发动进攻的敌人。在战争中，有170万南斯拉夫人献出了生命（占全国人口的11%），12000名党员就牺牲了9000人，350万人无家可归，物质损失达450亿美元以上。虽然法西斯以强大的兵力残酷地围剿解放军，甚至悬赏10万马克收买铁托的人头，但他们还是失败了。南斯拉夫在铁托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打出了一个人民的共和国。铁托和他的战友们为南斯拉夫的解放写下

了不朽的篇章。

少年时代的铁托最大的心愿就是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职业，穿上一身漂亮衣服。但进入社会之后，铁托却成长为一位举世闻名的伟人！这位历经沧桑的非凡人物不仅获得了南斯拉夫人民对他的信任和拥护，也获得了世界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在他生前，曾有人问他，倘若能再获得一次生命，是否将另有打算时，他答道：“我想，我将走同样的道路。也许我会把一些事情做得更好些。我只能说，我遗憾未能取得更高的成就。”当被问及他乐意人们纪念他的哪些方面时，他答道：“那就不是我的事了。历史将会决定哪些是我生活中的积极方面，而人民将由此怀念我。历史也将指出哪些是不好的。就我而言，我一生尽力为人民和国家造福，只要我还能够，我将一直这样做下去。”

第二章

苏南并肩抗击法西斯

● 并肩作战，相互配合

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铁托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决定下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世界局势，同时除了国内条件外，也为在南斯拉夫顺利地开始反法西斯的武装斗争创造了更良好的国际条件。南共领导机构认为，苏联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为南斯拉夫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实现南共提出的革命目标开辟了前景，这具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伟大意义。在南斯拉夫准备武装斗争的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一事件对提高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战斗士气和自信心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人民群众相信苏联的力量，并期待着能很快地取得胜利。而对于南斯拉夫工人运动和南共来说，进行反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同时也是保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声援。除此之外，德国和意大利必须从南斯拉夫调出一部分作战部队去参加对苏进攻，从军事角度看也为发动武装斗争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根据这样的估计，会上发表了一份激动人心的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书，指出苏联进行的正义斗争同时也是南斯拉夫

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南斯拉夫人民必须阻止侵略者把南斯拉夫变成法西斯的供应基地。会议号召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不要“在苏维埃俄国的英雄人民挥洒宝贵鲜血的时候袖手旁观”，而要“为这一残酷斗争作好准备”，“把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最后的决战”，和苏联人民一起共同抗击法西斯。

南共一些省和地区的领导机构在听到苏联遭到进攻的消息后，也纷纷发表了各自的告人民书。这一切充分体现了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的同情和信任。同时也体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党中央的高度统一。

6月22日会议以后，南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重点是直接准备开展武装斗争。6月27日成立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任命铁托为总司令。1941年底，铁托建立了第一支正规军队——第一无产者旅。总共8万多名战士，但在南斯拉夫战场上却牵制意大利、德国、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约51万兵力，还有15万伪军。

正是由于南斯拉夫人民的坚决抵抗，严重打乱了占领者的战略部署，希特勒不得不修改作战计划，向后推迟了5个星期，使德军在临至冬季才进攻莫斯科，为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几个星期对希特勒来说是无可挽回的损失，而对盟国来说则赢得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对此，英国首相丘吉尔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谁也无法准确估计，重大战役推迟5个星期给盟军带来了多大的好处，尤其难以估计这种推迟对严冬到来以前德俄交战会有什么后果。完全有理由说，莫斯科因此而得救。”

到1942年，南斯拉夫战场的意义更大了。南斯拉夫的解放力量越战越强，队伍已经壮大到38个旅和36个游击队，共有20万人。这些力量牵制了6个德国师、5个保加利亚师

(其中有些是从其他战场或其他被占领国调来的)、德国和意大利的许多独立大队、3个匈牙利师中的一些部队和各种伪军部队，共约70万装备精良的敌军。

1942年10月15日莫斯科电台报道说：“欧洲战争的绝大部分重担由俄国人承担，而很大一部分是由小小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员承担的。轴心国不得不抽调几十个师驻扎在南斯拉夫，尽管东方战场上很需要兵力。在斯拉夫人当中，俄国人和南斯拉夫人为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最大的牺牲。数月来，他们忍受了沾满血迹的法西斯分子的打击。俄国人和南斯拉夫人互相帮助，并肩作战，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斗争……今天，苏联各族人民同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站在一起，保卫人类的进步事业……”

由此可见，为了共同反对法西斯，苏南两国并肩作战，双方都作出了巨大牺牲。特别是南斯拉夫战场的胜利对苏联尤为重要。

1944年10月，苏联军队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进入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一起打响了解放塞尔维亚和伏伊伏丁那的最后战役。经过激战，到10月20日，解放了贝尔格莱德。1945年3月1日，南人民解放军改名为南斯拉夫人民军，并于3月20日开始了解放全国的最后战役。到了4月中旬，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全部获得解放。5月中旬卖身投敌的米哈伊洛维奇指挥的切特尼克部队已溃不成军，他也被活捉。解放南全国领土的战斗到5月15日最后结束。至此，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1945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建立，并宣布这一天为“共和国国庆日”。

● 苏联为铁托授勋

南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 1942 年给占领军及其帮凶的有生力量以沉重打击，使他们的武器装备遭到严重损失。这些胜利是对同盟国反对法西斯势力的共同斗争的重要贡献。正如 1942 年 10 月 14 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所说：“在那些忠诚的爱国者勇敢地踏上反对侵略者的武装斗争道路的国家里，特别是在南斯拉夫，如同在暂被希特勒分子占领的苏维埃国土上的人民复仇者——游击队战士反对占领者的伟大运动一样，使敌人遭受十分重大的损失。”

斯大林也对此有过很高的评价。

1944 年 3 月 7 日，斯大林说：“兄弟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他们的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反对德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激起苏联各族人民的深切同情，成为激励欧洲一切被奴役人民的榜样……”

1944 年 9 月 5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通过了关于授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铁托元帅以一级苏斯洛夫勋章的命令。命令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和秘书戈尔金签署：“授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统帅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元帅一级苏斯洛夫勋章，以表彰他在领导军队和指挥反对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共同敌人——希特勒德国的战斗中取得的卓越成绩。”

1945 年 10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又授予铁托“胜利勋章”。授勋令中说：“授予南斯拉夫元帅约瑟夫·布罗兹·铁托以‘胜利勋章’，以表彰他在指挥大规模战役中的特殊功绩，这些战役有助于盟国战胜希特勒德国。”

在授勋时，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萨契科夫对铁托说：“元帅先生，遵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我荣幸地向您转交苏联最高军事奖赏——‘胜利勋章’。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您这个奖章，是为了表彰您在指挥大战役中的非凡胜利，这些战役有助于盟国对希特勒德国的胜利。在转交这一最高奖章时，我高兴地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

“在所有斯拉夫人民和非斯拉夫人民当中，南斯拉夫在反希特勒同盟队伍中占有英勇战士的光荣地位。大家知道，正是南斯拉夫挑起了反抗德国和意大利占领的极其沉重的担子，并在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中作出了重大牺牲。”

● 希特勒的眼中钉

在南斯拉夫战场上，由于铁托领导的游击队顽强抗争，希特勒军队到处受挫。在一次德国最高统帅部会议之后，希特勒对其部下希姆莱将军说：“我们的军队对维护我们在南斯拉夫的利益无所作为。现在我可以断定，在那里必须寻找另一种解决办法——消灭铁托其人。”

希特勒感到特别恼火的是，铁托在为建立新南斯拉夫而斗争。希特勒曾以为南斯拉夫已永远从地图上被抹掉，现在铁托又把各民族联合起来。希特勒现在承认这些民族是唯一可与德意志民族较量的交战一方。希特勒发狂地问他的将军们：“在欧洲堡垒里，哪里有像这里这样的形势？”然后自语道：“没有。”

1943年底，希特勒再次下令立即干掉铁托，为此采取了五花八门的破坏性警察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希特勒在战争初期曾对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员国军队各个击破，这时不得不承认败于它们手下。可是希特勒就是不甘心让铁托庆祝自己的最后胜利。

1944年4月底，希特勒通过东南线司令冯·韦希斯元帅事先策划好一个联合战役，其目的是“消灭南斯拉夫人民族解放斗争的心脏和头脑，即以铁托为首的最高司令部和南共中央”。

十多天以后，希特勒口吐白沫地命令伦杜利茨将军：“活捉他，把他押到我这里来！我倒要看看他是什么模样！”接着又补充说，如果抓住他，活着送到德国最高统帅部来，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期间希特勒谈论的话题都是如何消灭南斯拉夫最高司令部和铁托。希特勒在自己的最高统帅部办公室里摆着一个铁托的石膏模型，一看到这个石膏模型，他就想什么时候能活捉到铁托，足见他对铁托是多么的恨之入骨。

希特勒法西斯的核心人物希姆莱也曾在1944年向他的下属军官讲过铁托，他说：“我在这里举出顽强不屈的另一个例子，就是铁托元帅的例子。我必须确实说，他是一个老共产党人，这个约瑟夫·布罗兹先生，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不幸的是他是我们的对手。他确实应该获得元帅的称号，我们捉到他就把他干掉，你们可以确信这一点。他是我们的敌人。可是我希望我们德国有一打的铁托。他们是领导人物，有如此大的决心和坚强意志，虽然永远被围困，但从来不屈服。这个人一无所有，他时常被包围，但每次都能设法逃脱，他从来不曾投降过。我们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他是怎样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地区钻到我们肚皮下来的，那只是因为他坚持不懈地战斗。他们成师成军地被我们打得稀烂，但这个人每次都把他们又组织起来。要知道，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

点，仅仅因为他是个不妥协的、坚持不懈的军人，一个坚定不屈的指挥员。”

曾有人胆怯地问希特勒：“要是抓到铁托并送到最高统帅部来，如何处置他？”希特勒沉思了片刻后回答说：“我们将行最隆重的军礼枪决他。”

希特勒和他的部下将铁托视作巴尔干地区的头号敌人、最大威胁，随时随刻都想消灭他，他们满以为消灭了以铁托为首的领导核心，就可以大大削弱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就可以“打蛇头，而不是老斩尾巴，因为尾巴斩掉了还会不断地长出新的来……”

然而，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铁托和他领导的人民武装不仅没有被消灭掉，反而越战越勇。终于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希特勒军队，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在战争年代，铁托的名字曾让敌人胆战心惊，也曾引起过世人种种的猜测。

意大利报纸《晚邮报》的战地记者维奥奇尼奥·利利曾写道：

“铁托这个通俗的名字说明他是一个平民，但他却轻而易举地支配着贫苦的、愤怒的民众。有人猜测，‘铁托’(TITO)是‘秘密国际恐怖组织’这几个字的头一个字母拼成的，或者是四名游击队指挥官名字的头一个字母拼成的，也有人说，铁托这个名字是因他下命令而叫起来的，即你(TI)干这个(TO)，结果人们就叫他‘TITO’(铁托)。连与丘吉尔和铁托的私交甚深的朋友、战争期间被派到铁托那里的英国军事使团团团长、英国保守党议员菲茨罗伊·麦克莱恩在1948年发生情报局冲突之后发表《铁托》一书中也认为，铁托这个名

字是上述下命令的方式而得来的。”

在美国和英国流传着铁托是何许人的种种传说。有些人认为，他原是克罗地亚大学生，有些人说他是塞尔维亚的著名共产党人，另一些人则说他是波罗地海国家的男爵，弹一手好钢琴，还有一些人说他是苏联红军空投的军官。

一直到1942年11月铁托才被介绍给美国民众，可是却把他当作匈牙利共产党人（1942年11月20日《纽约时报》）。一年多以后，1943年11月18日《纽约时报》第一次发表了他的全名：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并把铁托称为“将军”。这时人们仍然不知道铁托究竟是谁。在此前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铁托”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人物。

第三章

共同战斗中的不谐之音

● 初生芥蒂

在苏南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法西斯的斗争中，铁托不愿意盲从斯大林，他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因而常常与斯大林的意图背道而驰，这就惹恼了斯大林。因此，在共同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之中，两国之间也出现了一些不谐之音，这些分歧最初反映在南斯拉夫组建无产者旅的问题上。

1941年12月22日，铁托组建了第一无产者旅，其后6个月内相继建立了另外4个无产者旅，每旅兵员都在1000人左右。1942年初，铁托在军事公报中发布的军事条令中宣布，必须实行铁的纪律，严厉制裁不服从命令的现象。官兵之间应为“同志式的关系”，但在执行任务时必须遵守纪律。每旅都设有司令员和政委及其副手组成的指挥部。有突击营、警卫连、炮兵、医疗队和摩托化连队。他们有自己的红色军旗，中央是游击队的五角星，右上角是镰刀和锤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铁托的部队达80万人以上，组成4个军团，无产者旅便是这支部队的核心。

铁托公开宣布了这些无产者旅的共产主义性质，使斯大林

大为恼火,1942年3月5日,斯大林让季米特洛夫给铁托拍了这样一封电报:“为什么你一定要搞个什么无产者旅?”对于这样的指责,铁托不理睬,继续我行我素,通过一切手段,例如报纸、传单、书籍、讲话、唱歌和朗诵诗等等向部队和老百姓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游击队的纪律从一开始就极其严格,决不允许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违反纪律者视情节轻重均予立即审判,甚至被枪决。这一光荣传统博得了广大老百姓对游击队的爱戴和信赖,从而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共产国际在1942年3月5日发来的电报中说,在看了南共中央送来的材料后得出一种印象:伦敦的人们有一定的理由怀疑“游击队运动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并且朝着使南斯拉夫苏维埃化的方向发展”。电报中还提出问题:为什么要建立特别的无产者旅呢?电报强调南共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联合一切反希特勒的人士。因此,电报建议南共中央委员会“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政策,并检查一下其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在南斯拉夫建立一个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所有敌人都包括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

铁托在给共产国际的回电中断定,他们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铁托强调指出,南斯拉夫政府的追随者从一开始就反对武装解放斗争,他们的策略是反对南共为发展起义所作的努力,这就把他们自己提到了同占领者合作的地位;无产者旅是在切特尼克袭击游击队之后成立的。

作为在伦敦流亡的王国政府代表,米哈伊洛维奇觉得不需要在他看来和土匪差不多的铁托作什么妥协。他本来就没有想真正去抵抗德国人。因此当1941年9月份,希特勒命令他的军队对平民实行报复,每死一名德国兵,必须杀死100名南斯拉夫人质这件事发生后,米哈伊洛维奇就以不打算为了

伏击德国军队而冒塞尔维亚无辜居民被大批屠杀的危险为借口而不去和敌人战斗，同时极力散布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游击队”同占领者和卖国贼勾结在一起，南共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不和，拒绝他们提出的在米哈伊洛维奇领导下联合一切抵抗力量的建议。

与此同时，流亡在伦敦的南王国政府为了把起义的领导力量共产党孤立起来，保证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对国内事态的发展起主导影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流亡政府一方面在致切特尼克首脑的指示中告诫他们不要采取武装行动，另一方面在英国的帮助和支持下在自己的宣传活动中把起义的所有成绩都归功于切特尼克分子。

流亡政府还利用电台和其他新闻工具扩大切特尼克在国内的影响。特别是用在英国和美国的电台和其他新闻工具扩大切特尼克在国内的影响，这些宣传工具报道了切特尼克同占领者斗争的消息，还编造了米哈伊洛维奇是欧洲最大的抵抗运动领袖的神话。从而从盟国骗取了武器、现金和其他所需物资的援助和道义上的支持。流亡政府甚至通过英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施加压力，让苏联政府通过共产国际迫使南共接受米哈伊洛维奇的领导。

这时铁托领导的游击队在无任何援助的情况下孤军奋战，物资缺乏、武器简陋，条件极为艰苦。最初，铁托曾打算联合米哈伊洛维奇的武装部队共同作战。1941年9月，他和米哈伊洛维奇在拉夫纳山会晤，商定在局部地区范围内互相配合，以及在有限规模上进行一些联合行动。10月，进行了第二次会晤，但都无实际成果。由于最终政治目标不一致，到10月底，这种合作实际上已经破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铁托决定建立自己的正规军

队——无产者旅，为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的解放战争奠定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共产国际以后才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切特尼克运动是反对起义的。他们依靠西方盟国，力图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和恢复南斯拉夫王国，并把起义看作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大危险。共产国际还同意有必要揭露同占领者合作的切特尼克分子及其首脑的卖国嘴脸，但是共产国际对南共中央多次要求苏联援助人民解放运动和开展揭露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卖国嘴脸的运动等事却一再重复说，苏联对人民解放运动的援助要取决于苏联政府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关系；公开反对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就会给以苏联为一方和以英国与美国为另一方的共同战斗和关系造成新的困难”，南共不应该“仅仅从本国的角度出发，而应该从英、苏、美同盟的国际角度出发”来考虑自己的斗争。

苏联政府极力回避一切可能恶化与西方国家的同盟关系的事情，同时对公开支持和援助人民解放运动持克制态度，但它最后也拒绝了承认米哈伊洛维奇是南斯拉夫抵抗运动唯一领袖的要求，理由是它不愿干涉南斯拉夫的内政。

1942年底，南共游击队已从8万人发展到20万人，在人民解放运动争取得到国际承认方面也取得了初步成绩。但是，铁托并没有奢望盟国政府能很快采取行动来反对不择手段地镇压人民解放运动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南共在争取人民解放运动得到国际承认方面所处的条件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在这方面只能通过共产国际做一些事。南共中央除了在国内开展揭露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卖国行径的宣传活动外，还继续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并通过它寻求苏联政府的支持，以便让世界公众了解南斯拉夫的事实真相。

当设在苏联由南共中央领导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首先向全世界宣布了关于切特尼克分子卖国的消息后，立即引起了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强烈反响，它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抗议。共产国际重又警告南共中央委员会要注意苏联政府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同盟关系，指出攻击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将引起同西方盟国政府的不和。因此，苏联政府对人民解放运动的支持局限于通过外交途径向南斯拉夫流亡政府进行交涉。

苏联的立场和态度，使铁托很是不满，然而为了大局，铁托最终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 冲突的发展

南斯拉夫人民在抗击法西斯的最初阶段，就决定摒弃逃亡在国外的王国政府，建立新的人民政权。当时苏联为了搞好同英美国家的关系，在外交上只承认流亡在伦敦的南王国政府，并且在政治和物资上支持留在国内的旧王国政府的军官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部队。1941年秋天，莫斯科决定把米哈伊洛维奇说成是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领袖。在他对塞尔维亚西部解放区发动进攻后，也不愿谴责他；对于他同德国人勾结，反对南人民解放军，同样不愿予以谴责。共产国际还就此劝告南共：“不要忘记，一个反法西斯战争正在进行，建立新的政府机关是一个错误。”1942年9月，苏联为了加强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关系，竟把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为此，铁托曾向苏联提出了抗议。

1942年秋天，南共认为建立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南人解委员会），即建立新南斯拉夫的临时政府的条

件成熟了，于是于11月26日在比哈奇召开了人民解放反法西斯第一次会议。铁托于11月12日打了一份电报给莫斯科，先报告了建立人民解放军师的建制事宜，接着报告了在南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上宣布成立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的打算。

然而，莫斯科很快就作了回答，不同意建立临时政府、废除君主政体和宣告成立共和国，而规定全国委员会只应成为反法西斯性质的一般政治机构。莫斯科明确指示：“在现阶段，你们不要提出废除君主政体的问题。不要提出建立共和国的口号。你们所理解的南斯拉夫政体问题，将在粉碎德意联盟之后和国家从占领者手中获得解放之后再予解决。”

最初南共贯彻执行了这项指示。莫斯科的干涉使得君主政体未予废除，临时革命政府未予宣布成立。但是铁托在1942年11月29日的另一份长达三页纸的电报里，对莫斯科所持的立场提出了意见。他提供了有关南人解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经过和各项决议的全部必要的材料，他说：“我必须向你们报告的是，正是资产阶级的活动家们，同样还有全体人民，把伦敦的南斯拉夫政府斥为卖国政府。尽管我们不把南人解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看成是某种政府，它还是要处置国家生活的一切问题并照料前线的事，解放区和新解放区几乎各地都建立的人民解放委员会将在这方面协助它工作。我们这里除了这些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军事当局之外，不存在别的政权……”

1943年秋天，随着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发展壮大，铁托不管苏联赞成与否，于11月29日在亚伊策召开了人民解放反法西斯第二次会议。

除马其顿外，全国各地的游击队员及其支持者都委派或

推选了代表团前来与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重申游击战争旨在解放南斯拉夫的全部国土，并宣告一个全国性的临时政府的成立（即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宣布自己为南斯拉夫的合法政府，以代替国王和王国政府，他们原先代表南斯拉夫人民的合法权利已告无效。这些决定均纳入一项决议，全体与会者一致通过。人民委员会被确定为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的执行机构后，开始行使政府权力，其成员迅即选出，铁托当选为主席兼国防部长，并被授予元帅衔。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和对会议的评价，英国著名作家菲利斯·奥蒂在他的《铁托传》中写道：

“从政治策略上来说，这次会议是绝妙的一着，甚至超过比哈奇会议。为的是在战后与南斯拉夫政府讨价还价之前，先确定和加强铁托的地位。回顾起来，这可以看作是这场政治革命中的一个决定性阶段的开端。这一着占了先。铁托当时并不知道，1943年8月魁北克召开的盟国会议（旨在为次年攻占诺曼底的‘太上皇行动’制定协同作战计划）已经达成协议，将以有限的空投和海运以及少量的突击兵力援助‘巴尔干游击队’（即南共游击队），但他知道英国对他的活动已经改变了态度。他期望盟国有可能在巴尔干半岛登陆，愿意与他们联合行动，但不愿意让他们取而代之。他深知王国政府和米哈伊洛维奇的政策一直是按兵不动，坐待战争后期参加盟军作战，从而得以重新上台。他不打算在国际领域的斗智中输掉，以至丧失他的运动已在南斯拉夫赢得的地位。

“铁托获悉盟国领导人准备举行会议，当即电请季米特洛夫通告苏联政府，游击队运动既不承认流亡的南斯拉夫政府，也不承认国王。‘我们不允许他们到南斯拉夫来，因为那就意味着内战’。他声称现时代人民的唯一合法政权是民族解放委

员会。这是亚伊策会议预定要作出的基本决定。关于正在拟定的各项决议的详细内容，他事先既未通知季米特洛夫，也并未请求俄国人许可，虽然他还是谨慎地就有关组织问题征求了意见。他想让西方盟国，也让俄国人面对着一桩‘既成事实’。这并不难，因为苏联和西方当时都全神贯注于与亚伊策几乎同时召开的德黑兰会议的准备工作。

“反法西斯会议的第二次会议是铁托一生事业中最得意的时刻之一。会上洋溢着成就斐然和胜利在望之感，既未受到盟国干预也未出现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意见。由于亚伊策当时是正式属于克罗地亚这个卫星国的一个地区，会议使人有一种对德国人成功的进行挑战的感觉。铁托带着一批人员在該城以两个月的时间为这次会议作准备。他的司令部设在一个木房子里，附近就筑有地下室，以防备德国人发觉会议的准备工作而增加空袭时用作防空掩蔽部。他此时 51 岁，两年来不断奔波，备受艰苦，加以长期食物不足，使他异常消瘦。由于日晒雨淋，饱经风霜，时而又在防空洞或临时掩蔽所内长时间办公，他面色蜡黄，脸皮紧绷在颧骨上。但他精力仍然极其充沛，工作起来几乎比任何下属人员更能持久，小睡片刻便又精神焕发，这种本领他一直保持到老年时期。在他的追随者眼里，他已经成为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而构成这种传说是为了激励人们去战斗，以此作为团结和统一的象征；哪里有游击队组织，哪里就会在行军歌曲或叙述英雄事迹的民谣里听到对他的颂扬。这也是基于事实和真正的成就：他是无可争议的领袖，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的人物……”

“在亚伊策镇剧院的舞台上，铁托向挤得水泄不通的狂热听众发表了讲话；这不仅是讲给他们听的，讲给被占领的南斯拉夫地区的全体人民听的，而且也是为了引起聚集在德黑

兰的盟国领导人以及流亡的王国政府的注意。其主要目的是重申游击战争旨在解放南斯拉夫的全部领土，并宣告一个全国性的临时政府的成立……

“铁托当选为主席兼国防部长，并被授予元帅衔。他于是具备了他认为与其他国家首脑和军事领袖进行对等所必需的地位。但他仍然得使这些决定为盟国领导人所接受。”

11月30日，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结束，当时盟国领导人在德黑兰正开始举行会谈。铁托在这一天向莫斯科发出电报，详述了这次会议作出的各项决定。这遭到莫斯科极其强烈的反对。苏联在写给南斯拉夫的信中指出：“不要把这个委员会看作一种政府，而要看作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力量。不要使它反对在伦敦的南斯拉夫政府。不要在目前情况下提出废除君主政体的问题。”斯大林甚至大发雷霆，他说“这是在苏联和德黑兰决议的背后捅了一刀”，并禁止设在苏联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广播反法西斯会议各项决议的详细内容。南斯拉夫驻莫斯科代表、负责“自由南斯拉夫”电台的维利科·弗拉霍维奇受到了训斥。因为斯大林害怕因此惹恼盟国，妨害他同他们进行谈判。

南斯拉夫临时政府建立的消息传出后，英美政府先是感到吃惊，但他们考虑到战后的南斯拉夫铁托力量将占优势，同时他们深信铁托所采取的行动一定是得到斯大林同意的。他们正忙于为诺曼底登陆进行准备，美国还在专心致志地为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作出战略部署。由于英美两国都急于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西方盟国也想在赢得主要胜利前避免在次要区域和苏联发生利害冲突，他们承认了铁托新政府，也不反对铁托所提出的各项决定。他们希望这将有助于推行其政策，即说服铁托同意与王国政府合作。英美的这种态度，反

过来影响了苏联。苏联政府鉴于南斯拉夫此举获得英美政府的谅解，于是在事过两周之后，发表了一个声明，肯定了亚伊策决议的积极意义，声明说：

“苏联政府认为，已经得到英国和美国谅解的在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事件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将有助于南斯拉夫人民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取得进一步的胜利。这些事件证明了南斯拉夫的新的领导人在团结南斯拉夫人民的一切力量的事业中取得了卓越成就。”

尽管如此，苏、英、美政府仍然只承认南流亡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这种情况表明，在建立南斯拉夫新政府的问题上，苏联并没有在道义上给予支持，其态度与英、美相仿。南斯拉夫人民对此深感困惑不解。铁托在战后回忆说：“不，他们没有帮助我们多少忙，（莫斯科）那里根本就反对我们这么做。后来，我去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告诉我，斯大林大为生气。斯大林说，怎么可以这么做？他怎么竟敢这么做，而不问一问？我们没有打算问他们，因为要是他们说‘不行’，我们作为严守纪律的共产党人必须不采取这些措施。在比哈奇的时候，我曾问过他们，他们说‘不行’，当时我们就没有办法。因此，后来我们决定不问了；他们会生气，但是我们就这么办，而且我们办得很好。可见，这是在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方面我们同他们发生的一般政治性质的第一次比较重大的冲突。”

● 铁托对援助一再失望

1942年初，游击队的处境极为艰难，武器弹药和医药用品十分匮乏，当时，铁托对得到苏联援助满怀希望。他给莫

斯科发出详尽的报告。电报的抬头是发给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让他转呈苏联领导人，而铁托自己签名则用他在共产国际的名字瓦尔特。这些电报通常都是他亲笔用俄文写成，他用铅笔起草，然后反复修改。纸张则是从放在他背包里的普通笔记本上撕下来的。铁托向季米特洛夫提供的详尽情报有：游击队的活动，包括对战斗情况的定期全面汇报；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各种决定；德国和意大利部队的调动，切特尼克的活动及其暴行和通敌活动。

铁托在电文中曾向苏联多次提出援助的要求，他在电文中指出：“我们需要武器弹药。这才是创建民族解放阵线最好的办法。我们国家有大量的人民，他们都渴望对侵略者战斗，但他们没有武器。”铁托强调苏联送来的任何东西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有重大意义。苏联当时的处境也很艰苦，但还是表示：“尽力设法以武器支援你们。”

12月底，铁托指定了一个可以用降落伞空投的地点。1942年2月初，他得到答复：“最近有可能派人到你处。盼告飞机降落场地详情……”2月17日铁托复电：“我们急需医药用品，特别是预防伤寒的血清……盼送来军火、自动武器、皮靴和士兵军服材料……请在门的内哥罗（黑山）杜尔米托尔山麓扎勃利亚克为我们空投。此地已下雪，机场不宜降落，除非飞机带有滑雪装置……你们不论送来什么东西，都将是极大的道义上和特质上的支援。”

就在当天，铁托又作为附言发了第二份电报补充说：“地点是在完全解放了的地区内，十分安全……请火速送来相当数量的各种自动武器、机关枪、信号器材、火箭、轻机枪和弹药。”铁托还补充了纬度，提供了辨认的标志，并说他们将从2月23日起期待苏联飞机的到来。

着陆场地准备就绪，铁托派了一个 52 岁的共产党员莫沙·皮雅杰前往督促安排。皮雅杰和他的战友们在飞机着陆地修建了一个小雪屋（看起来像是北极探险队的住处）以供人们在其中掩蔽。

20 多天过去了，皮雅杰没有等来苏联飞机。3 月 19 日，铁托又向莫斯科发电：“由于缺乏弹药，我们的处境极其艰难。务请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送来武器和军事物资。盼告能否送到任何东西及日期。”皮雅杰和他的战友在冰天雪地里等了整整 37 个昼夜，但始终没有等来一架苏联飞机。

后来，皮雅杰向铁托汇报说：“我于 2 月 22 日晚到达扎勃利亚克。这是飞机预定到达的前一天，因此我有时间检查所有准备工作。云贾多尔村附近的辽阔高原积雪 6 英尺深，我们在 2 月 23 日和其后的 37 个夜晚就在那里等候飞机。我们经常到扎勃利亚克村 4 英里外的一片荒凉的大雪覆着的高原上等飞机。每天都是天黑前往，拂晓返回，徒步而行。”

莫斯科终于回电了：“为了支援你们武器，已经竭尽一切努力，但技术困难极大。你们别指望我们能在短期内克服它们了，切记尽力设法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并最大限度地节约使用现有的军事物资吧。”铁托对苏联的援助失望了。然而，南共发现，就在苏联强调援助南共游击队“技术上有困难”的同时，却建议给米哈伊洛维奇以军事援助，这事自然会使南共感到不愉快。

1942 年底，敌人发动了一场猛烈程度是以前各次攻势所无法比拟的第四次攻势，企图最后消灭人民解放军主力。在这次攻势中，除德军和意大利军队外，同游击队作战的还有卖国贼——切特尼克和乌斯塔什。乌斯塔什又译“乌斯塔沙”，是宣扬极端沙文主义、带有法西斯性质的反动民族主义运动，

其代表人物为安特·帕韦利奇，其纲领是把克罗地亚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斯雷姆组成一个独立国，消灭塞尔维亚居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乌斯塔什投靠德、意法西斯，和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一样，与南共领导的人民武装为敌，并在德国支持下宣布成立“克罗地亚独立国”。

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铁托于1943年1月31日再次向莫斯科求助：“我得再次问你们，难道你们不可能向我们提供任何援助？饥饿和死亡威胁着数十万难民。难道在我们进行了长达20个月的英勇的、几乎是超人的斗争之后，你们就找不到一种方式来援助我们？”

在那些日子里，铁托和他的司令部在离奈雷特瓦河不远的一座小磨坊里，制定突破敌人包围和拯救伤员的计划。他疲惫不堪、筋疲力尽，正在考虑反突击，这时一名报务员拿着莫斯科来的一份电报突然闯了进来。铁托高兴地跳了起来，接过电报刚读了头几行，兴奋就烟消云散了，脸上露出了原来的焦虑不安的表情。他接着一声不响，把电报递给了其他人。原来电报中没有提到援助问题，只提到“表示歉意”和“向您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向在向万恶的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全体同志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铁托对苏联的援助彻底地失望了。

后来，铁托明白了援助迟迟不来是出于政治原因。他曾和皮雅杰说过：“妨碍我们取得援助的主要障碍是南斯拉夫政府，而不是我们的政策。”苏联强调的是，不应让南斯拉夫的革命的发展妨碍三大同盟国的合作。苏联认为南共领导的游击队的“斗争具有过多的革命性质，实质上应当具有反法西斯性质”。斯大林曾斥责铁托：“难道除了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同情者外，你们就不能联合其他爱国者共同进行反对侵略

者的斗争吗？……我们认真地要求你们密切留意你们的策略和行动。”

斯大林还警告铁托不要暴露他在南斯拉夫建立共产党统治的意图，以免“吓坏”英国人。并说“游击队员没有必要在军帽上佩戴红星”。斯大林还劝告铁托与南王国政府的政治家们，甚至与国王一道工作。

铁托坚定地拒绝了斯大林的警告和指示，并回答斯大林说：“如果你们不能给我们援助，至少也请不要故意跟我们为难。”铁托决定不再征求斯大林的意见，1943年11月在亚伊策举行的人民解放反法西斯第二次会议上宣告成立全国性的临时政府后，斯大林极为不悦。当斯大林十分生气地说南斯拉夫共产党给他背后捅了一刀时，铁托立即回答，这不是背后捅一刀，而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更了解本国的情况，如果希望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流血牺牲进行的斗争产生某种成果，那就必然会作出所有这些决定。

1943年秋天，南斯拉夫游击队已发展到30万人，解放了南斯拉夫一半的国土。这时，英、美、苏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举行会议，会上承认了在铁托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是南斯拉夫抗击德国人的基本力量。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阶段，英、美政府是全力援助在英国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及其在国内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当他们看到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力量日益壮大，就转向援助铁托。早在1943年开始，英国政府就派出观察员到解放区，1944年丘吉尔还派自己的儿子伦道夫和一些将军到南共游击队总部去表示支持他们的抗德战争。英美方面开始给予南共游击队的军事援助是少量的，直到1944年下半年才给予比较大量的援助。而苏联只是在得知英美已经支援南共游击队的消息之后，才于1944年开始给

予援助。这对南斯拉夫同志来说，不能不感到是件遗憾的事情。

● 铁托第一次会见斯大林

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在战争期间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他和他的参谋人员并不认为南斯拉夫的游击战争具有多大的重要性，他们甚至把铁托看作是一个巴尔干农民，用莫洛托夫的话说：“对于一个巴尔干农民你还能指望什么别的！”他们不相信铁托，一贯低估铁托所作的全部汇报。

1944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了铁托和斯大林的会晤，这是铁托有生以来第一次和斯大林面对面的深入的会谈。1935年7月铁托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曾经远远地见过坐在主席台上的斯大林，斯大林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一个不知疲倦、精力极其充沛的人。那时他作为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的干部还没有机会去直接接触这位世界著名的伟人，而现在他作为南斯拉夫的最高统帅来到莫斯科会晤他早已久仰的斯大林，心情颇有些激动。他要和斯大林会谈的内容很多：主要是关于两国军队共同作战的紧急问题，如两国的联合部队解放南斯拉夫的行军方向、路线、协同问题；关于苏联军队进入到南斯拉夫哪些地区驻扎多长时间的问题等等。

铁托向斯大林提出一个请求，请求他派一个坦克师协助南斯拉夫的部队解放贝尔格莱德。因为希特勒的军队拥有最现代化的武器，而他自己的部队既没有重炮也没有坦克。没有这些，仅靠勇气和斗志去和武装齐全的法西斯军队作战，只

能带来自己部队的重大伤亡。斯大林对此也是十分理解的，他痛快地答应了铁托的请求，并且慷慨地将一个坦克师变成了一个坦克军，同时还给了两个空军师。他很是自豪地对铁托说：“瓦尔特，我给你的不是一个坦克师，而是整整一个坦克军！”铁托听了很有些感动。

这次会谈，两国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或取得了谅解并为此签署了联合公报。塔斯社于1944年9月28日公布了这一公报。公报说：

几天前，苏军司令部，为了便于对匈牙利的德国人和匈牙利部队展开进攻，请求南斯拉夫人民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以及南斯拉夫游击队同意苏军暂时进入同匈牙利接壤的南斯拉夫领土。苏军司令部此时宣布，一俟完成作战任务，苏联军队即撤出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人民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同意苏军司令部的请求。苏军司令部接受南斯拉夫方面所提的条件，南斯拉夫人民委员会的行政机构应在红军部队驻扎地区进行工作。

尽管签署了联合公报，但是这第一次的会谈气氛并不热烈和融洽，甚至出现了紧张和压抑，令铁托很不愉快。例如，铁托发现斯大林不能容忍他所不同意的意见，并且常常粗暴地训斥他身边的人。在所有苏联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他偶尔向莫洛托夫征询一下意见，但也从不听他讲完就继续发表自己的见解。

铁托看不惯斯大林这样的工作作风，他甚至担心自己可能要和他发生争吵，因为他想起过去有好几件事都顶撞过斯

大林，特别是战时他发给斯大林的一个电报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们不能支援我们，至少不要妨碍我们。”斯大林可能至今都会耿耿于怀。果然，当铁托在同斯大林的第一天会谈后去看季米特洛夫时，季证实了这一点，他告诉铁托：“瓦尔特，瓦尔特，主人对你的那个电报大生其气……他气的直跺脚。”

铁托可不会因为斯大林生气而俯首称臣，他不能听任别人对他的国家一点儿不了解却随便发号施令。因此，他同斯大林在讨论一切问题时多多少少总是有些矛盾，谈话总是出现一些不愉快的场面。以下这件事更令他终身难忘。

在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对铁托说：

“瓦尔特，要当心，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是强大的！”

铁托平静地回答说：

“斯大林同志，我不同意您的意见。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是非常弱小的。”

斯大林没有作声，不满意地皱了皱眉头。他开始问资产阶级的那些政客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铁托回答说，某某是个无赖，一个卖国贼，他和德国人一起干。

斯大林又问起另一个。铁托的回答同前面一样。这下斯大林发火了，他大声叫嚷着：

“瓦尔特，对于你来说，他们都是无赖！”

铁托仍然不紧不慢地回答说：“一点也不错，斯大林同志，任何背叛他的国家的人都是无赖。”

斯大林又皱起了眉头。这时谈判桌上其他人，马林科夫、日丹诺夫、莫洛托夫、贝利亚狠狠地瞪了铁托一眼。他们实在没有想到，一个小小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竟敢如此大胆顶撞伟大的斯大林！

斯大林还是不甘心，他力图劝说铁托同意让国王彼得复

位。他认真地对铁托说：“瓦尔特，你是否考虑让彼得国王回去的事？让他复位是十分必要的。”

铁托听罢，立刻一股热血冲到头顶。他强压怒火，十分气愤地反驳说：“这绝对不可能，人民会造反，因为这个国王是卖国的化身。在人民进行斗争时丢下他的人民，人民痛恨他们的腐败和实行的恐怖统治。”

斯大林一下愣住了，多年来他早已养成了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的习惯，还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敢在他面前接二连三地顶撞他，他想冲着铁托发火，但是还是忍住了，半天没有说话。此时谁也不敢再说一句话，谈判桌上的空气似乎凝结住了。

最后，斯大林简短地说了一句话：“你不需要永远恢复他的王位。暂时把他接回去，然后在适当的时刻悄悄地用一把刀子插到他的背上去。”

就这样结束了这次不愉快的会谈。它使铁托联想起两个月前和丘吉尔的一次谈话，

那是7月份在那不勒斯，铁托也是首次拜访英国首相丘吉尔，丘吉尔竭力劝说铁托把国王接回去，恢复他的王位，甚至许诺为此英国将给予铁托更多的军事援助，然而铁托还是婉言拒绝了。

为什么现在斯大林也和丘吉尔一样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呢？铁托百思不得其解。以后发生的事实，才使铁托恍然大悟。原来，斯大林和丘吉尔对战后东欧势力范围的划分早就心照不宣、不谋而合了。

第四章

战后初期的苏南关系：控制与反控制

● 在三巨头眼中的南斯拉夫

铁托离开莫斯科不久，斯大林于10月9日在克里姆林宫与盟国领导人举行了另一次会议。参加会谈的英美方是丘吉尔以及罗斯福总统的代表艾夫里尔·哈里曼。这次会谈讨论了东欧的前途，实际是安排战后盟国在欧洲如何划分势力范围。斯大林当即同意丘吉尔将南斯拉夫对半分的建议。事后，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

当时的时机适于商谈问题。我便对斯大林说：“让我们来解巴尔干的问题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对这两个国家也是感兴趣的；我们希望在那里派遣使团和代表。请不要误会，就英国和俄国而论，怎样做才能使你们在罗马尼亚占90%的势力，我们在希腊有90%的发言权，而在南斯拉夫，则由你们和我们平分秋色呢？”趁翻译译这番话时，我在一小张纸上写下了：

罗马尼亚——俄国占90%，其他国家占10%

希腊——英国（在美国认可下）占90%，俄国占10%

南斯拉夫——50%对50%

匈牙利——50%对50%

保加利亚——俄国占75%，其他国家占25%

我把这张纸条递给斯大林，他已经听了翻译过去的意思。他沉默了一会儿。随后，他拿起自己的蓝铅笔，签上名字，把纸条退了回来。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比我在这里写这一情景所花的时间还要短……

这一个对半平分的协议(实际上从未得到贯彻)，事先斯大林从未和铁托讨论过，事后也未通知铁托，还是丘吉尔在会后不久通过麦克莱恩将军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铁托。铁托在获悉这一瓜分之后说：“不过，我们的人民根据‘不要越俎代庖’这个成语说了，我们要百分之百留给自己，至于他们，一点也不给。”

1945年2月初，在雅尔塔，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妥协，不问其他国家人民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盟国三强首脑在雅尔塔起草并签署了关于解放了的欧洲的宣言。这一宣言是三强对于战后解决欧洲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共同政策和共同行动。关于南斯拉夫，文件中写了这么一番话：“我们一致同意建议铁托元帅和舒巴希奇博士(伦敦流亡政府)把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立即付诸实施，并在这一协议基础上组成新政府。我们还建议，新政府一旦组成，即发表声明如下：一、南斯拉夫及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予以扩大，把南斯拉夫最后一届议会中未因同敌人勾结而信誉扫地的议员包括进去，并承认由此而组成的机构为临时议会。二、人民解放委员会通过的立法文件将交制宪会予以补充批准。”

1945年2月4日，在克里米亚疗养地“利瓦季亚”宫举行的晚宴上，斯大林强调：“我愿意与美国和英国一起来维护小国人民的权利，但是我决不同意各大强国的任何行动听凭

小国来评判。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及与它们相似的小国在决定它们的命运的时候，不能与大国一起坐在圆桌旁。”

据罗斯福的官方译员查尔斯·波伦记载，斯大林当时声称，他认为，三大强国“承担了战争的最大的重担，把小国从德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应当具有保卫世界和平的特殊权利”。斯大林接着说：“认为阿尔巴尼亚应当与打赢了这场战争并有代表出席这一宴会的三大强国具有相同的一票，那是可笑的……”罗斯福表示赞同：“我愿指出，各大强国承担了最大的责任，应当由它们来决定和平……”

丘吉尔以他所特有的讽刺口吻，最后打了一比喻：“鹰应当允许小鸟吱吱叫，不去管它叫些什么，怎么叫。”

对于以上的谈话，当时铁托并不知道，但是铁托的立场早已十分坚定：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向世界宣告，除他们自己以外，谁都不能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根据自己的信念来作出决定：南斯拉夫不承认任何利益范围，利益范围到它的边界为止。

● 的里雅斯特归属谁？

的里雅斯特位于亚得里亚海北部，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交界处，是多瑙河地区许多国家通向亚得里亚海的一个主要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里雅斯特为奥匈帝国所控制。1915年，意大利以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为条件，同英法举行秘密谈判，提出在战争胜利之后，意大利要求取得奥匈帝国控制下的一部分土地，特别是包括的里雅斯特的亚得里亚海岸港湾。英法表示同意，签订了“伦敦

密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南斯拉夫国家，的里雅斯特归属了南斯拉夫。“伦敦密约”宣布无效。意大利对此十分不满，1918年又出兵占领了这个地区，同时还占领了南斯拉夫的萨拉，1919年又出兵占领了的里雅斯特东南的阜姆（前奥匈帝国的出海口），这样，意大利谋求亚得里亚海湾的计划如愿以偿。但南斯拉夫从未承认这一占领的合法性，它决心收回自己的领土。因此，长期以来两国争执不休。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中，英、美也很觊觎这个地方，一来这个地区战略位置重要，二来怕南斯拉夫得到这个地区将会有利于苏联。丘吉尔于1945年2月27日写信给杜鲁门说：“在我看来，占有的里雅斯特似乎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铁托的游击队占领该地区以前到达那里，占有它就可以在法律上构成有力的根据。”

1945年5月，英、美准备派军队去强占这个地区，但南斯拉夫军队却先英美两天占领了该地，英美十分恼怒，立即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一方面向铁托发出照会，要他的部队撤离该地，并准备派5个装甲师开赴的里雅斯特附近，把地中海的许多船只开往亚得里亚海，几个空军大队也待命起飞；另一方面，杜鲁门于5月20日致电斯大林，希望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施加影响，让南主动让出这块地方。

斯大林不愿得罪盟友，更担心触发一场新的战争，于是，采取了折中态度，认为：铁托军队留在那个地方是对的，但不要和英美闹僵，盟军最高司令部也可以在这一地区建立管制，并且建议由英国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和铁托相互协商确定分界线。1945年7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谈再次讨论的里雅斯特的归属问题，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擅自接受了法国外长提出的南、意分界线的建议，即把的里雅斯特分为甲、

乙两区，英、美管辖甲区，南斯拉夫管辖乙区。这是关系到南斯拉夫的主权和独立问题，而苏联在接受这一方案以前并未和南共商量，甚至在前一天晚上卡德尔和莫洛托夫会谈时，莫洛托夫也没有把已经决定将在第二天采取的步骤向卡德尔作丝毫暗示。对此铁托很是不快。

由于在的里雅斯特的归属问题上，南斯拉夫对英、美、苏的大国主义极为不满，所以1945年5月18日铁托就的里雅斯特问题发表了演说：“据说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也一直是这样认识的，可是我们要谋求一个正义的结局，我们要求每一个人都应成为他家里的主人，我们不愿意为别人付出代价，我们不愿意卷入到任何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中去。”

斯大林对铁托的演说极为不满，虽然卡德尔一再解释，铁托的演说是针对西方而非针对苏联，但斯大林对此解释仍不满意，他认为铁托没有把苏联的政策和帝国主义政策明显区别开来。在斯大林看来，铁托是在警告他，是不听他的指挥。于是指使苏驻南大使馆转告南斯拉夫：这种情况不可容忍。并于1945年6月5日，苏联大使向南外交部提交一份正式声明，声明警告铁托，如果他再次放肆对苏联政府进行这类攻击的话，那就不客气地要在报上公开批评，其责任由南斯拉夫承担。不仅如此，以后在苏南公开冲突后的往返信件中，苏方还把这段讲话作为铁托反苏立场的表现。

西方认为，这是铁托“第一次触怒斯大林的事件”。

● 如此“经济合作”

1946年8月，南斯拉夫和苏联的贸易谈判代表在莫斯科

签订了南斯拉夫和苏联的经济合作协定。苏联建议建立合营公司，南斯拉夫同意先建立两个合营公司，一个是航空运输方面的尤斯塔公司，一个是负责河运的尤斯帕德公司。南斯拉夫指望通过这些合营公司发展自己的工业，早日摆脱农业国的落后面貌。但是使南斯拉夫人感到伤心的是，关于建立空运和河运合营公司的最初的谈判便十分不平等，以后的事实更令他们难以接受。

参加合营公司谈判的南斯拉夫代表弗拉特科·维莱比特回忆说：“……早在1945年夏天就开始谈论建立（苏南）合营公司的好处，目的在于发展我们的经济。1946年初，我接到通知说，苏联要派一个代表团来，任务是同我们缔结有关建立多瑙河航运和民航合营公司的条约。我被指定同该代表团谈判。为了对谈判有所准备，我要求我们驻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的代表机构向我提供俄国人同这两个国家缔结的条约的副本。

“幸运的是，我在俄国代表团抵达之前就得到了条约文本，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加以研究。当我看完了以后，我感到震惊。不平等是如此明显，毫不掩饰，俄国人的霸权是如此横暴，我简直不知道开动脑子了。在我看来，这样的条约从政治上来说是愚蠢的，从法律上来说，是完全荒唐的。我振作起精神，试图把俄国人这样的态度看成是必要的……不过……我感到十分不安。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俄国代表团会向我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提议缔结类似的条约。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俄国代表团到达了，代表团团长、一个叫别列津（如果我没有记错他的名字的话）的将军向我作了自我介绍，商定开始谈判的日子……

“……我本来以为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要商定作为未来的合营公司建立的基础的总原则。没想到，别列津将军在第一次会议上（也即在第一分钟）就把一份条约草案交给我，草案是从莫斯科带来的。

“我要求推迟会议，以便研究这些文件。当我会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了条约草案后，我非常惊愕……我觉得，不论如何，我们决不能接受这样的条约，这样的条约是所谓的‘吃亏有份、沾光无缘’的典型样本（即只有一方获利，另一方一无所得）。

“我向铁托作了汇报，他命令我设法改善条约内所包含的条件。在两国代表团下一次会议上，我很委婉地告诉俄国人，这样一种形式的条约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最好是把条约置于另外的基础之上，我没敢用政治上的论据来阐明我的论点，我只是援引了国际法上的十分无力的论据。我竭力把这个政治性很强的问题转到法律领域内。我认为，在这方面我没有成功，但是我又有何办法？我不敢对他们说，这些条约是制造不平等关系的工具，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我知道，这是将要签订的一系列更为重要的同类条约中的头两个条约。我们的经济委员会指望通过这些条约，也即通过这些合营公司来解决我们的经济建设计划问题，这就使我的处境更加为难。

“别列津对于国际法的知识比我还少，因此他不懂得巧妙地来批驳我的无力的论据，但是，他坚决拒绝同我就建立合营公司的另外某个新基础进行谈判。他向我表明，我们要么接受条约，要么就中断谈判……”

尽管苏联提出的条款很苛刻，但是为了让苏联帮助自己的国家实现工业化，1947年2月初，南斯拉夫还是和苏联签

订了两个合营公司条约。

尤斯塔航空公司和尤斯帕德多瑙河航运公司开始经营以后，南斯拉夫发现，这两个合营公司不是什么苏联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提供援助，而是对南斯拉夫的纯粹损害。苏联想在南斯拉夫获得控制和垄断，想通过这种方式剥夺南斯拉夫经济上的独立和主权。

例如，尤斯塔公司占有南斯拉夫和国外的全部航线，从而使本国的南斯拉夫空运公司一条国外航线都没有。尤斯塔公司还飞国内赢利最多的航线，从而使南斯拉夫本国的公司处于从属地位，靠尤斯塔公司让出来的一点业务勉强支撑着。这样一来，苏联通过合营公司就实现了完全的垄断。

这家公司的全部盈利是按投入的资本平分的，不纳任何税，这样苏联从这一方面也获利颇多。对于投入的实物资本的估价办法，使得苏联人能够攫取大量超额利润。苏联人把他们投入的实物股份估得很高，而把南斯拉夫的估得很低。南斯拉夫的财产是按照货币比较坚挺、稳定的 1938 年的价格估的，而苏联的财产是按照物价腾贵的 1946—1947 年间的价格估的。苏联在这里实际上使南斯拉夫蒙受了巨大损失，使它自己得以按照股份获取收益。这样一来，苏联人靠少得多的股份，即借助于价格而不合理地抬高了股份，就能获取比南斯拉夫还多，即比他们的股份的实际价值所允许的还多的收益。

另外，南斯拉夫在贝尔格莱德近郊为尤斯塔公司兴建了一座机场，被估价为 31500 万第纳尔，而预先计算的兴建费用为此数的 20 倍。在对机场估价时，苏联只向南斯拉夫承认普通地皮的价格，而不承认机场的价格，也即不承认南斯拉夫方面在这块地皮上所兴建的设施的价值。

更令人气愤的是，尤斯塔公司的总经理，一位苏联公民，

竟然随心所欲地解释条约，把直接属于南斯拉夫政权机关的职能攫为己有。根据协议，尤斯塔公司只享有从商业的角度使用机场的权利，他却违反协议，把机场上的几乎所有设施，把全部联络和导航设备占为尤斯塔公司所有。这样一来，他就攫取了南斯拉夫全部航空事业的控制权，使该公司有可能对南斯拉夫的民航事业完全发号施令，甚至攫取了完全属于南斯拉夫当局的权利。

尤斯塔公司的苏联驾驶员为所欲为，甚至敢于确定他们运载哪些旅客，哪些不运载，即使在旅客预订了机票和买了机票时，他们也这样干。1947年夏末就发生了一起同苏联驾驶员这样的行径有关的公开的丑闻，不得不由苏联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加以处置。

当时的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结束在黑山的休假，经由铁托格勒机场返回贝尔格莱德。机票全卖完了，但是买了机票的旅客却未能都上飞机，因为苏联驾驶员让一些没有买机票的人上了飞机。于是发生了争吵，泰波见状后进行了干涉，他问飞机驾驶员：“怎么能有些人不买票就乘飞机？”这位戴着大尉军衔的苏联飞行员漫不经心地回答：“是我叫这么办的！”泰波指出这么做是不对的，没想到这个苏联飞行员竟冲着穿着南斯拉夫人民军将军制服的泰波大叫大嚷：“你是反动分子，你是酒鬼……”

泰波大怒，他真想对准这个驾驶员的脸狠狠给他一拳，但他克制住了。后来，他叫来了国家保安处的人，命令他们，只要驾驶员的那些没有机票的朋友不下飞机，就不让飞机起飞。过了一个小时，驾驶员终于让了步，飞机开始飞向贝尔格莱德。一到贝尔格莱德，泰波就召见苏联武官，向他谈了整个

事件的经过。苏联武官当即表示要撤回这个驾驶员，但是并没有执行。以后泰波把这件事告诉了铁托，铁托勃然大怒，要泰波立即要求把这个驾驶员撤回去。这场风波反映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它加剧了南斯拉夫对南苏关系的忧虑。

尤斯帕德多瑙河航运合营公司和尤斯塔航空公司的命运一样，苏联实际上通过这家公司剥夺了南斯拉夫航运业以往在多瑙河上一贯占有的位置和重要性。在多瑙河流经的各个国家中，南斯拉夫航运业的吨位最高。

根据建立尤斯帕德公司的条约的第五条，苏联作为缔约一方，承担义务，以支付属于它的股份资本的名义向尤斯帕德提供：建设阿达—齐甘利亚造船厂的设备和材料，多瑙河码头的设备以及建造阿达—齐甘利亚造船厂的费用，总额为12500万第纳尔；自协定签署之日起5年内，提供价值6750万第纳尔的造船修船用的装备和材料；公司的营业所必需的现金750万第纳尔。

而第六条规定，南斯拉夫以支付属于它的股份资本的名义交给公司：价值16475万第纳尔的船只；诺维萨德的修造厂以及对阿达—齐甘利亚造船厂的投资，价值2775万第纳尔。

苏联通过这一方式获得了南斯拉夫多瑙河河运公司与尤斯帕德公司1947年签订的合作协定。双方规定合理地利用双方的船队，南斯拉夫多瑙河河运公司和尤斯帕德公司彼此顺便牵引空载和满载的货轮，每吨1000公里支付70第纳尔的运费，而尤斯帕德公司同苏联国营轮船公司签订的价格则为50第纳尔，也即每吨1000公里低20第纳尔。尤斯帕德公司在同南斯拉夫多瑙河河运公司签订协定时隐瞒了这一情节。

1947年2月开始，南斯拉夫多瑙河河运公司把货款交尤斯帕德公司牵引，而尤斯帕德则把自己的货轮交给苏联国营

轮船公司牵引，甚至有的时候尤斯帕德公司的货轮得等上好几个星期才等到苏联国营轮船公司的船，来把它们拖进南斯拉夫的码头。这一年，仅牵引货轮一项南斯拉夫多瑙河航运公司就向尤斯帕德公司支付了 120 万第纳尔。

1948 年初，尤斯帕德公司的货轮在运载南斯拉夫的商品前往苏联后，总是迟迟不能卸货，甚至有些货轮得花三个月时间来等待卸货和返回南斯拉夫。苏方对此解释是卸货场地不足，然而，苏联国营轮船公司的货轮却总是予以及时卸货。

1947—1948 年的冬天，多瑙河及其支流没有封冻，也没有妨碍航运的其他情况。南斯拉夫多瑙河航运公司拥有的船只全部出动，然而，尤斯帕德公司却把船只拖进了越冬港湾，致使南斯拉夫少出口了 4 万吨左右商品，少进口了 3 万吨左右货物。

到 1947 年底，南斯拉夫向尤斯帕德公司投放的实物和现金占总额的 76.2%，达 305 股（船只、造船厂和现金），而苏联在同一时期内提供的实物和现金仅占自己的投资的 9.83%，只有 39 股。另外，根据条约苏联应当在 5 年内提供 6750 万第纳尔的造船修船用装备和材料，而在公司存在的两年内，苏联总共提供了 340 万第纳尔。由此可见，尽管尤斯帕德公司的条约对于苏联方面已经极其有利，他们对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仍然没有信守。

由于没有投入必要的装备和材料，公司不得不利用南斯拉夫在多瑙河上所获得的资金，总额为 1500 万第纳尔的外汇，这对于缺少外汇的南斯拉夫来说，不啻是沉重的负担，巨大的损失。

协议规定，苏联将提供兴建一座造船厂的各种机器设备，以发展南斯拉夫的造船业，然而，他们根本就没有提供，却

提供了卡车、布匹、玻璃之类南斯拉夫并不急需的物资，这给南斯拉夫造成了多方面的损失，给南斯拉夫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损害。

从表面上来看，尤斯帕德公司和尤斯塔公司的组织结构是建立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例如，在尤斯帕德公司里，每一国的投资为两亿第纳尔，分成每一股为 50 万第纳尔的股份。每一股在股东大会上构成一票，股东大会是公司的主要机构，大会从每一方各选四人组成公司管理委员会，主持公司的领导工作。但是，每一个公司的总经理都只能由苏联人担任。他的副手是南斯拉夫人，他完全从属于总经理。总经理独立地履行公司管理委员会的全部执行职能，这就使得他可以不受管理委员会和大会的任何监督，为所欲为地从事活动。尤斯塔公司在两年内，没有举行过一次年会，尤斯帕德公司只召开过一次大会，他们根本不做经营结算表，因此很难检查经理的工作。公司的总经理把自己置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之上，实际他们只是在为苏联的利益工作。

请看下面一个事例。尤斯帕德公司的苏联经理通过确定各国货物的运费，对南斯拉夫大加歧视。这位经理规定，苏联的货物，每一个净吨公里收 0.19 第纳尔，多瑙河流域其他国家的货物，收 0.28 第纳尔，而南斯拉夫的货物则收 0.40 第纳尔。南斯拉夫用自己的船只运送货物，却必须多支付 52% 的运费，仅此一项 1948 年南斯拉夫就损失了 3800 万第纳尔。另外，尤斯帕德公司所拥有的船只全部是南斯拉夫的，理应首先满足南斯拉夫的需要，但是，1948 年公司的业务中只有 40% 是为南斯拉夫经济服务的，60% 的业务却在为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效劳。

当初，南斯拉夫对和苏联合营公司寄予厚望，盼望它能

帮助南斯拉夫实现经济腾飞，也曾有人担心建立这样的公司受苏联的控制和垄断。1946年春天铁托访问莫斯科就苏南两国商品交换协定和贸易协定问题和斯大林进行谈判。谈判中，斯大林谈及有关合营公司问题时，对铁托说：“我们的人向我们报告说，你们搞经济的同志认为，你们不同意组织合营公司。”铁托回答说：“不是，这不是我的意见，也不是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的意见。我们认为，有可能建立公司，当然，是指有助于我国实现工业化的那种公司……”

以后的种种事实表明，南斯拉夫和苏联建立合营公司的目的不仅没能实现，反而成了阻碍南斯拉夫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苏联通过建立合营公司获得对南斯拉夫的控制和垄断，剥夺了南斯拉夫经济上的独立和主权，这对南斯拉夫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尤斯塔公司和尤斯帕德公司的员工多次向苏方提出抗议，苏方却诬陷说：这是资产阶级分子、反动分子和外国间谍在肇事。

苏联为了控制南斯拉夫经济的主要部门，又提出了建立石油、有色金属、煤炭、黑色冶金等合营公司的建议，甚至建议建立苏南合营银行，竭力使它们成为苏联的分公司或分支机构，从而可以完全主宰南斯拉夫的经济并按照自己的意志使南斯拉夫的经济从属于自己的需要。这就使南斯拉夫的经济完全失去了独立性。他们看重的是南斯拉夫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不是帮助南斯拉夫发展自己的工业，苏联谈判代表亚特罗夫在谈判中甚至赤裸裸地说：“你们要重工业干什么。你们要的一切，我们乌拉尔都有。”南斯拉夫深深懂得：如果继续充当发达国家的原料基地，南斯拉夫就不可能发展自己的工业，而不发展自己的工业，要在南斯拉夫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就没有基础。苏联的企图在南斯拉夫最终没能得逞。

第五章

粗暴的干涉，巨大的压力

● 斯大林和铁托同床异梦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停息了。世界面临新的形势。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巨大变化，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解放斗争汇成一股洪流。这个巨大变化，引起了政治力量的新划分，出现了相互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

在欧亚许多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从1945年到1949年，先后建立了11个人民民主国家：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越南、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上苏联和蒙古，形成强大的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越出一国的范围，在欧亚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重大的成就。

同欣欣向荣的和平民主阵营相对立的是帝国主义阵营。由于德、意、日法西斯被打败，英、法在战争中严重削弱，唯独美国远离欧洲战场，参战较晚，却在战争中发了横财。据统计，在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由1937年的42%上升到1948年的53.9%，超过其他资本主

义国家的总和；出口额由战前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额的14.2%，急剧增长为1947年的32.5%；黄金储备也由战前的50.5%猛增到1948年的74.5%。美军已驻扎在世界各地，充当了镇压各国人民革命的“世界宪兵”。

1947年3月，美国抛出了杜鲁门主义。其主要内容是，美国趁英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控制已经力不从心，不得不退出这块地盘的时机，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宣布：“我们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去填补真空，这是美国的责任。”并且说，这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的回答”。为此，美国以“援助”为名，拨款4亿美元给希腊和土耳其，帮助该国政府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这个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政策，充分暴露了美国在反共的幌子下，要取代英、法而夺取世界霸权的野心。

相隔不到3个月，美国又抛出了一下“马歇尔计划”，当时担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于1947年6月5日，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篇讲演中说：“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状态，……否则就不可能有稳定的政治与保障的和平。”他还宣称：“任何图谋阻挠别国复兴的政府，都不能指望得到我们的援助。”这就是所谓“欧洲复兴方案”。

1948年，美国国会根据这个计划，通过了“援外法案”，其主要内容是：美国拨款“援助”西欧各国经济，但受援国政府必须废除关税制度，把本国生产的战略物资供给美国，保障美国资本投资的权利，放弃“国有化”计划，把进步力量排出政府，减少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等等。显然，这又是美国打出“援助”的旗号，妄图奴役欧洲的计划。

由于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经济一蹶不振，它们急于接受马歇尔的这个所谓“欧洲复兴方案”。这样，美国就可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站稳西欧阵地，

对西欧进行控制；另一方面又可向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渗透，以建立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涉及到东欧一些国家。有些国家内部的反共势力，乘机加紧活动，妄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这种情况在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都曾发生。最突出的是匈牙利，当时担任共和国总统的小农党头目菲伦茨·纳吉就派人与美国政府联系，请求将“杜鲁门主义”应用于匈牙利，在得到美国支持后，他们就阴谋进行武装暴动，匈牙利党和人民及时粉碎了这个阴谋。

西欧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依仗“杜鲁门主义”的撑腰，相继把共产党人从联合政府中撵了出去。如1947年5月5日，法国社会党拉马迪政府将法共一脚踢出政府；同年5月31日，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加斯贝利政府把意共赶出内阁。

“马歇尔计划”抛出后，东欧国家的一些政府，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等国也都有过要参加表示。6月5日，马歇尔发表演说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马上表示要对美国的提议予以详细研究。6月24日捷政府决定设立一个关于马歇尔计划问题的小组。7月初，又命令捷驻法大使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定于7月12日在巴黎举行的欧洲国家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1947年7月9日，由哥特瓦尔德率领的捷政府代表团，准备启程前往莫斯科，临行前8小时得知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政府已撤销了参加巴黎会议的打算，哥特瓦尔德心情很紧张，当天晚上，苏联领导人在接见捷政府代表团时指出：“马歇尔计划是直接打击苏联的，捷政府参加马歇尔计划，这是对苏联的敌对行为。”哥特瓦尔德回旅馆后，立即电告布拉格，赶快撤销出席巴黎会议的决定。

鉴于以上形势，苏联党和政府当即采取三项措施：

第一，在经济上，苏联立即与东欧各国广泛签订一系列贸易协定，进一步援助东欧国家，西方称为“莫洛托夫计划”，以便使东欧各国摆脱战后恢复时期的困难。

第二，在军事上，加强常规部队的建设，并加速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以便对付美国的核讹诈。

第三，在政治上，帮助东欧各国政权建设，派出大批苏联专家，并决定成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使东欧各国党和西欧的大党，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抑制东欧一些国家的离苏倾向，对抗美国的挑战。

1946年6月，铁托去莫斯科，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曾问铁托是否还认为建立一个具有情报性质的新的国际的必要，因为早在1945年，铁托曾向斯大林提出过建立一种协商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斯大林很赞赏这个意见。这次旧话重提，铁托自然作了肯定的回答。斯大林向铁托建议：

“最好是你们南斯拉夫人来发出倡议！”

当晚，在斯大林别墅，斯大林和铁托以及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共进晚餐时，斯大林又一次谈到关于建立情报局的问题，他说：

“不论采用什么方式，都谈不上恢复第三国际。但是应该建立另一个组织，某个情报性质的机构，它应该不定期开开会，交流交流经验，作出某些结论。”

铁托当即提出了建立情报局的几条原则：

1. 这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交流经验的机构。
2. 工作方式采取自愿协商、协调一致的原则，不应强加于人。
3. 它不是一个超国家的权力机构，它的意见仅供各党参考，没有任何约束力。

斯大林表示同意，他说：“当然，这个机构的决议对任何一个党都不会有约束力，如果它不同意这些决议的话。”

斯大林回过头来问季米特洛夫：“您有什么想法？谁来发出倡议？是您还是瓦尔特？或者由法国人？”

季米特洛夫十分信任铁托，他脱口而出：“可以由瓦尔特来发出倡议！”

但是铁托却提出：“最好由法国人来提！”

1947年夏，苏共中央写信给波兰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要波兰工人党出面发起召开欧洲一些党的会议，讨论加强欧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波兰工人党经过讨论，同意接受这一要求。

1947年9月22—27日，在波兰西南部的斯克利亚波伦巴温泉举行了有9个欧洲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情报局成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联共产党（布）代表日丹诺夫和马尔科夫；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卡德尔和吉拉斯；波兰工人党代表哥穆尔卡和明兹；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乔治乌—德治和安娜波克；保加利亚工人代表契尔文科夫和波特莫夫；匈牙利共产党代表法尔卡施和雷瓦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斯兰斯基和巴什托万斯基；法国共产党代表杜克洛和法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隆哥和雷阿勒。

会上，苏联共产党（布）代表日丹诺夫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会议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会议在听取了哥穆尔卡关于各国共产党必须彼此交换经验和协同行动的报告后，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指出：由9国党代表组成情报局，其任务为组织经验交流，在必要时，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配合各国党的活动。情报局总部设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也在贝尔格莱德出版。表面看来,似乎特别重视南斯拉夫在情报局中的特殊作用。会议结束之后,苏联《真理报》于1947年10月5日向全世界发布了情报局成立的消息。然而令铁托吃惊的是情报局一成立便违背了当时的初衷。在9国情报局的活动中,实际上是苏联共产党主持和控制着一切。

莫斯科通过领导《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这一刊物的联共(布)代表帕维尔·尤金,把一切,甚至是最细微的事情都控制在自己手中。有关报纸的整个工作都由苏联人——尤金、他的两名助手和编辑部主任帕什科夫负责。其他党的代表只是执行命令。

报纸上刊登的文章常常不经作者同意随意改动,因此文章的作者常常抱怨,在他们的文章里写进了他们根本没有说过、也没有写过的事情。在抱怨的人中有法共代表安然,波共代表芬克尔施坦。有一次,芬克尔施坦对任意更改波兰某位领导人的文章的做法提出了抗议,事后苏联人就故意刁难他,给他制造了种种不愉快的事:不给他收音机,禁止他使用汽车,等等。

每一期报纸在正式印刷前,都必须把几份清样送往莫斯科,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只有在两个人同意之后,才能正式印刷发行。有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事:莫斯科已表示同意开印,报纸也印好了,事后却又补充通知停印。鉴于这一干涉来晚了,报纸已经印好了,于是就下令把全部报纸,不论法文的、英文的、俄文的报纸统统烧掉。报纸全部运到了编辑部,在情报局大楼锅炉房并在苏联人的监督下整整烧了一天一夜。还不放心,又在工作人员中进行了调查,看是否有人偷着拿走报纸。如此兴师动众销毁这张报纸的原因是发现希腊共产党总书记扎哈里阿泽斯的一篇文章不合斯大林的

胃口，尤金就下令在一夜间将印好的报纸全部销毁。

此外，编辑部里的苏联代表的所作所为也十分令其他党的代表反感。他们占据了最好的房间和家具，把差的留给“兄弟党”的代表。甚至展开了一场抢家具的名副其实的竞赛，人人都设法多弄点，而不管是否相称，是否好看。桌子、地毯、电话，什么都拿，而“兄弟党”代表的房间却一无所有。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是桩桩小事，但它折射出了苏联某些党员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

苏联人还常常利用情报局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的方便条件收集南斯拉夫的情报，使情报局成了名副其实的苏联人的“情报局”，在以后的反南活动中，情报局的恶劣作用更是显而易见。

● “南—保联邦”的风波

巴尔干半岛，包括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希腊等国。巴尔干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之间，是国际交通枢纽，历来是列强互相争夺的重要地区。列强在争夺巴尔干地区时，往往利用那里的民族矛盾。巴尔干人民在反对列强控制的斗争中，深感实现各民族联合的重要性。比如，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个国家，都是斯拉夫人，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两国不断地在马其顿问题上发生争吵。因此，早就有人主张建立南斯拉夫人联邦，作为解决办法。斯大林也曾赞同过这种主张。1944年11月，南斯拉夫提出了建立南保联邦的倡议，并派卡德尔去索非亚同保加利亚领导人商谈。南斯拉夫建议，把保加利亚所拥有的马其顿人并入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保加利亚作为新联邦的第七个共和国，加入联邦。

保加利亚虽然同意两个马其顿合并，但坚持保加利亚作为联邦的一方，南斯拉夫为另一方，以平起平坐的地位组成联邦。南斯拉夫则认为，它所拥有的六个共和国中，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黑山）在保加利亚以前便是独立国家，不同意保、南作为两个平等组成部分建立联邦。由于意见分歧，此事就搁置下来。

1947年8月，铁托同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举行会谈，会谈中两国缔结了一项协定，取消了边境旅行障碍，并为以后的关税同盟作了安排，就此建立联邦问题又重新被提出来。1948年1月，季米特洛夫访问罗马尼亚，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巴尔干问题发表谈话说：“联邦或邦联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还不成熟。它没有列入目前的议事日程，因此，这个问题还不是我们在会上讨论的题目。当这个问题成熟的时候（成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等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将和希腊一起解决它。正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将决定他们采取什么形式，是联邦呢，还是邦联，正是他们将决定什么时候或如何去成立它。我可以说，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目前已作的一切，已大大有助于将来这项问题的解决。我也可以强调地说，当建立这个联邦或邦联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将不会去向帝国主义者，不会理睬他们的反对，将会在我们本身的利益的原则下，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本身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必要的国际合作是息息相关的。”

苏联领导人对季米特洛夫的讲话极为不满，《真理报》为此发表声明，用强烈的口气说：“正如著名的9国共产党声明

所说的那样，这些国家所需要的既不是一个靠不住和臆想出来的联邦或邦联，也不是关税同盟，而是通过动员和组织国内的人民民主力量来加强和捍卫本国的独立和主权。”这就是说，保、南的行动违反了情报局的声明。事实并非如此，这只不过是苏联反对南斯拉夫的一个借口。

由于南斯拉夫在二次大战中，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祖国，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解放后，又比较早地实行土地改革，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开始实行国家工业化计划和农业初步合作化的措施，先于东欧其他国家，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东欧一些国家中，曾把南斯拉夫看作是学习的榜样，铁托也被推崇为“东欧第一流的共产主义领袖”。但是，苏联担心东欧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效法南斯拉夫，同时担心南斯拉夫国家和它的领袖铁托过于出人头地，按西方人的说法，苏联不愿看到“巴尔干的斯大林”的出现。尤其在东西方冷战开始之际，斯大林决不允许这种倾向抬头。他必须牢牢控制东欧和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巴尔干国家，以免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对于南斯拉夫过于独立的外交活动非常不满，并对季米特洛夫的讲话持如此强烈的反对态度。

接着，斯大林立即紧急召集南、保两国代表去莫斯科磋商。保加利亚组成了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三人代表团。苏联希望铁托本人参加磋商，但铁托已预料到凶多吉少，以工作繁忙、身体不适为由没有去，派了卡德尔、巴卡里奇以及已在苏联的吉拉斯为代表。南、保两国代表在莫斯科受到了严厉的指责。

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南、保两国代表。他批评签订南保同盟条约，批评季米特洛夫1948年1

月提出的关于巴尔干和多瑙河国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希腊建立联邦或邦联的想法，认为这是在排斥苏联；还批评南斯拉夫应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为对付希腊对阿尔巴尼亚伊庇鲁斯地区的野心而同意派去两个师的做法。（希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南斯拉夫军队进驻阿尔巴尼亚，对希腊而言是极大的威胁。斯大林唯恐触犯英国，担心自己被指责为“幕后策划者”，有违背“君子协定”之嫌。莫洛托夫还曾为此事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说如果南阿不废除他们之间的驻军协定，苏联将公开提出警告。）为此，斯大林一连气批评了他们几个小时，斥责他们“胡说”，“目无苏联”，甚至不允许他们作任何解释。

斯大林特别严厉地批评南斯拉夫在外交政策上还没有养成同苏联磋商的习惯。为了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情况，要求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政府名义同苏联签订一项关于相互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的协定。2月11日午夜，卡德尔匆匆忙忙被召唤到莫洛托夫的办公室。看来签订协定的一切工作均已准备就绪。莫洛托夫递给卡德尔两页纸，苏南两国政府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的协定书已经写好了。

事后，卡德尔回忆说：“虽然南斯拉夫政府不反对在外交政策上进行磋商，但为什么一切要以这种方式进行呢？截止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完全符合协定的规定，为什么还要签订这么一个协定呢？这种屈辱使人感到厌恶和困窘，它只能使我想起了大国对弱小国家的专断。我思索怎么办？到底签不签字。最后我决定签字。我这样做，是想不使已经紧张了的形势更加复杂化。因为处于手足无措的状态，我竟把自己的名字签在莫洛托夫应签的地方。因此协定的原文必须重新再写，签订的整个程序推迟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我签署了这

个协定，马上便和我的同志们离开了莫斯科。”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反对南保建立联邦或关税同盟的同时，斯大林又突然提出来要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立即结成联邦。并且以最后通牒的口气通知了两国代表团。南斯拉夫的代表当即感觉到，在斯大林这一突然提出的要求的背后隐藏着别的东西，即苏联有可能利用保加利亚制约南斯拉夫。因此他们拒绝了这一要求，借口说，这些问题是重大问题，只能由南共中央来解决。卡德尔等三人代表团决定立即启程回国，向党中央汇报会谈情况。

当卡德尔、吉拉斯和巴卡里奇三位南斯拉夫高级领导人启程离开莫斯科时，苏方竟无一位领导人前往送行。

接着，苏联开始从各个方面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矛头直指铁托。2月12日，巴黎《费加罗报》传出，“罗马尼亚共产党已下令从一切橱窗中清除铁托元帅的像”的消息。紧接着，在阿尔巴尼亚庆祝苏联建军节的宴会上，南公使约瑟夫·杰尔贾提议为斯大林和铁托祝酒时，苏临时代办加加里诺夫傲慢地说：“只有铁托赞成民主阵营之间的团结，我才为他干杯。”说罢扬长而去。

2月底，驻苏联的南斯拉夫贸易代表团接到苏联外贸部长的通知。通知说，南斯拉夫贸易代表团没有必要再留在莫斯科。这实际上意味着两国贸易关系即将中断。

以上种种迹象已使铁托深知局势的严重性，此时他心情沉重，思绪万千，他早已领教过斯大林的厉害。30年代苏联的肃反扩大化，使南斯拉夫许多优秀共产党员成了斯大林的牺牲品，他也差点成了斯大林的“刀下鬼”。战时和战后他又多次和斯大林意见相左，多次和他顶撞。铁托心中有数，斯大林对他决不会善罢甘休，更大的斗争还在等待着他。

铁托什么都不怕，他像海鸥一样勇敢地朝着更大的风浪冲了上去。

1948年3月1日铁托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卡德尔、吉拉斯和巴卡里奇汇报了莫斯科会谈情况，卡德尔气愤地对大家说，斯大林训起话来“简直把我们当作共青团员”。会议拒绝了斯大林关于立即成立南保联邦的建议。铁托说：“大战期间，我们曾为实现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仍然必须努力。但是，现在是提出建立联邦问题的适当时机吗？条件成熟了吗？现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去解决……俄国人正在图谋不轨，他们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民族问题。我们不是棋盘上的卒子。在我们未见到整个局势已明朗化以前，不能建立联邦。而且这件事在经济上还不成熟。”从此，关于建立联邦之事就此作罢。这对斯大林而言，又是沉重的一击。

会议重点讨论了南苏分歧和对策，铁托说目前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已经进入死胡同。他强调指出，这场争论是关于南斯拉夫独立的问题；苏联政府废除贸易协定的目的，是对南斯拉夫施加经济压力。但是，南斯拉夫的独立更为重要。大多数中央领导人支持铁托的意见，认为为了维护南斯拉夫的独立自主立场，应该坚决顶住苏联的压力。

会上只有中央委员、财政部长茹约维奇和中央委员、计委主任赫布兰一言不发，会后茹约维奇将会议的全部内容报告了苏联大使拉夫伦季耶夫。

苏联随即采取了新的措施，更大的压力接踵而来。

3月18日，苏联通知南斯拉夫，决定撤走全部军事顾问和教官。

3月19日，苏联又宣布从南斯拉夫撤走全部文职专家的

决定，理由是这些专家“被敌意所包围”。

3月20日，铁托写信给莫洛托夫，指出以上决定的危害性和提出的理由是毫无根据的，他要求苏联政府对其行动作出解释。铁托焦急地等待着复信，当时除党的领导核心外，没有人知道这一通信。局势愈来愈变得令人不安了。

● 收到斯大林的信铁托如五雷轰顶

1948年3月27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代表苏共中央给铁托复信，这一封信意味着强大政治思想压力的开始，其目的是迫使南斯拉夫共产党屈服。回信形式上是进行思想批评，实际上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提出了严重的政治指控。批评的靶子是对苏联的态度和南斯拉夫的国内状况。

内容包括指控南共领导制造所谓反苏气氛，散布关于苏共“蜕化”的反苏言论，贬低苏维埃制度并“诬蔑”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的体现者。信中严重警告南共，他们攻击苏联的手法类似“托洛茨基的手法”，并威胁说“托洛茨基的政治命运是颇有教益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攻击南斯拉夫共产党处于“半公开状态”，缺乏党内民主。说在南斯拉夫农村资本主义因素在增长，南共“正在被从伯恩斯坦、福尔马尔和布哈林那里抄来的关于资本主义因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理论所蒙蔽”。信中一再不满地表示苏联专家被所谓“敌意气氛”所包围，除了表示“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的不满”而提出的这些指控外，信中还指出，在南共党内感觉不到“阶级斗争”政策的精神，南共已溶化在人民阵线中，党的干部处于国家安全部长的监督之下，所以苏共中央不能“认为这样

的共产党组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

苏共中央的复信对铁托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铁托说：“第一封信是在萨格勒布的图什卡纳茨，由苏联大使拉夫伦季耶夫在大使馆参赞阿尔米亚尼诺夫的陪司下交给我的。他们两个人走进房间，我从外表看出，他们准备对付某种重大的事情。他们把信交给了我，我们都站着，因为我没有请他们坐下。我自己也站着。我看着信，一只手撑在桌子上。我看了头几行，就觉得我遭了雷击似的。而拉夫伦季耶夫和另外那个人只是盯着我，看我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而我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我尽我所能，尽量克制住自己。而他们一直盯着我的眼睛。当我匆匆把几页都看完了，拉夫伦季耶夫克制不住了，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得到答复？’我说：‘我们要研究这封信。’我挥了一下手，表示会见结束，他们走出去了。”

苏联外交官一走，铁托就打电话给最亲密的助手，叫他们前来开会商讨对策，接着他就坐下来，取出纸来，立即一口气写了 33 页复信。铁托写道：“……在我们看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一点上，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关系应当是尽量好和友好，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我们的意见也是一致的。但是这样的关系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得到巩固，我们是存在分歧的。我们认为哪些因素是我们的关系和友谊牢不可破所必不可少的？第一，绝对尊重民族独立和国家独立的原则……第二，相互间绝对信任……”

铁托后来叙述说：“我觉得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事情，我深为痛苦。下决心坚决抵抗斯大林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很好地估量一下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要考虑到最坏的情况。但是，尽管成功的希望看来很小，没有别的出路，我们不得不下决心抵抗……”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还背着南共把 1948 年 3 月 27 日信件的副本发给情报局所有其他成员国。这说明，苏联在争论一开始，就已向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利用苏联在这些国家中的威望，迫使它们在这场争论中站到苏联这一边，而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结果，南共中央在答复斯大林的指控之前，就收到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信，他们在这些信中表示赞同苏共中央的立场及其 3 月 27 日的信，也即赞成谴责南共。就这种种指责和诽谤，铁托决定召开南共中央全会。

1948 年 4 月 12—13 日，南共召开了中央全会讨论苏共中央的复信。南共认为，在对南共政策批评的背后，隐藏着苏共和南共在看待一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性质问题上的分歧。会议通过了铁托对苏共中央信件答复的基本思想。在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复信中，南共领导批驳了无端的指责并阐明了自己对某些原则问题的看法。

复信中强调指出，“我们当中的人不管多么热爱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但无论如何不会减少对也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自己国家的热爱”。同时还强调，“在南斯拉夫社会改造中有许多特点，可以被其他国家在革命发展中有益地利用，而且已经在利用”。鉴于冲突的实质是对待各国和各党之间平等问题的不同态度，铁托特别强调指出，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和加强相互关系，就必须尊重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及相互信任；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公民应该懂得，他们是在独立的兄弟国家中，不要干涉它的内部事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革命经验不仅应当看成是十月革命经验的继续和补充，而且也应看成是革命实践中新认识的反映。南共中央主张加强同苏联的合作。铁托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对内政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学说为基础的。信中驳斥了关于共产党“溶化”在人民阵线中、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正在加强等错误论断。指出这一“严重的误解”只有通过两党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全面解释才能消除，因此建议苏共中央派来一名或几名中央委员到南斯拉夫实地考察，以便就地切实弄清所有的问题。

1948年5月4日，苏共中央又给南共中央发出了一封信，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名，这封信以更激烈的方式叙述了并扩大了原先对南共的指控。这封信的行文方式，是一份字斟句酌的起诉书，目的显然在于掩饰已经产生的分歧的实际根源，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对南共展开一场广泛施加压力的运动。

信中大力强调苏联和南斯拉夫对外政策中的分歧，说南共领导人对苏联的“诬蔑宣传”的出发点是“铁托同志的反苏立场”，指责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把苏联的政策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混为一谈。复信还指出“极端的狂妄自大”可能会“毁灭”不准备接受“批评”的“南斯拉夫领导人”。斯大林警告说，南共中央的立场将对两国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因为“苏联只能向朋友提供援助”。信中否定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解放战争和革命中的功绩，认为这些功绩决不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功绩大，甚至比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功绩还小。同时还认为，南斯拉夫军队没有对南斯拉夫的解放作出比较重大的贡献，南斯拉夫革命的胜利“并不是因为南斯拉夫共产党有某种特别的素质”，而主要是因为苏联红军的帮助。

这封信最后公开威胁说，如果南共中央坚持自己的立场，这将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不良影响。信中还拒绝了南斯拉夫方面提出的请苏共中央派代表到南斯拉夫来弄清争议问

题的建议，而提议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争端。最使南斯拉夫感到惊愕和伤心的是，斯大林肆无忌惮地攻击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斗争。他说：“我们认为，南共中央政治局不准备体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自觉地改正错误的基础，在于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过分骄傲自大。他们在取得成绩之后，头脑发昏，他们自高自大，显得什么都不在话下。他们不仅变得骄傲自大，而且还宣扬骄傲自大，不懂得骄傲自大可能断送南斯拉夫领导人。列宁说：‘从前所有一切革命党之所以陷于灭亡，就是因为他们自高自大，而看不见自己力量之所在，害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学会克服弱点。’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并非谦虚的和仍然被并不很大的成就冲昏了头脑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已经忘记了列宁的这个教导。”

斯大林指责铁托和卡德尔：“铁托和卡德尔同志在来信中谈到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功绩和成就，谈到联共（布）党以前承认这些功绩和成就，而现在却对此保持沉默。当然，情况不是这样。谁都不能否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功绩和成就，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应当说，例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共产党的功绩和成就决不比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功绩和成就小。但是，这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表现得谦虚，对于自己的成就没有大吹大擂，而不同于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后者的过分的自吹自擂刺破了每个人的耳膜，还应当指出，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对革命所作的功绩不是少于而是多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目前取得的成就不如南斯拉夫共产党，这不能用南斯拉夫共产党具有某些特殊的品质来解释，而主要是因为南斯拉夫游击队司令部被德国伞兵击垮

之后，正当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运动经历严重危机的时候，苏联军队援救了南斯拉夫人民，粉碎了德国占领者，解放了贝尔格莱德，从而为共产党掌握政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令人遗憾的是，苏联军队没有，也不可能向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提供这样的援助。要是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认为这一点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的话，对于自己的功绩，他们就会少吹嘘一点，就会表现得适当一些，谦虚一些……”

南共中央在1948年5月9日的全体会议上讨论了苏共中央的信件，不同意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争议，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感到是如此不平等，所以我们不能同意现在在共产党情报局面前解决这件事”。但是他们深知，情报局多数成员党早已接受了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批评，毫无疑问，它们在情报局会议上仍将这样做。

斯大林想在情报局会议上公开地把南斯拉夫革出教门。因此，当5月19日苏联党的负责干部麦谢托夫将斯大林邀请铁托出席情报局会议的邀请信面交铁托后，铁托对麦谢托夫说：“不，我不去。我们是被告，邀请我们上被告席，而我们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为了把事实告诉全体党员，南共中央作出决定，向党员宣读南共给苏共中央的全部信件和苏共中央的全部信件。对于斯大林的指责，铁托的回答是：“事情是不公正的，我们不能让步！他们所一口咬定的，是些弥天大谎，任何进步运动乞灵于谎言，就不再是进步的了。苏联人如果以为用这样的办法就会使我们折服，那他们就错了……如果我们同意，如果我们承认，对于苏联人对我们提出的一切指责，责任在于我们，他们肯定会赞扬我们严守纪律，甚至会给我们嘉奖，但是，不行。首先要的是真理。”他还说：“我们必须争取使我

们同苏联的关系平等，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要求保持这样的关系，这不仅适用于我们同他们之间和关系，对全世界，对所有国家，也都是普遍适用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同意充当别国的卫星国，或者屈服于人。这并不意味着不热爱苏联，不热爱苏联人民。这仅仅意味着，愿意同他们保持平等关系，尽管苏联是一个大国。”

南共中央意识到面临的困难和危险，决定面向全体党员，以便在他们的支持下，在捍卫民族的根本利益以及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利益中、在捍卫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独立和平等原则中坚持到底。在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直到区和县委员会）通报了同苏共中央来往信件的内容以及南共中央不派代表参加情报局会议的决定后，这种立场立即得到了南共各共和国、省和地方领导机构的赞同。1948年5月20日举行的南共中央会议一致通过决定：南斯拉夫共产党不派代表团出席将要召开的情报局会议。另外，鉴于茹约维奇和赫布兰作为中央委员和政府部长把党的机密泄露给外国，造成严重后果，会议决定把他们两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依法逮捕。

两天之后，莫斯科又送来了一封信，信中无疑地批评南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出席共产党情报局会议，说这样的态度是“转向民族主义立场”。并声称在即将举行的情报局会议上不是讨论苏共和南共的关系，而是“讨论南共的状况问题”，南共中央代表应向会议作关于自己的工作和行为的报告。信中还警告说，即使南共代表不出席，会议也将召开，你们不出席会议，说明“你们在情报局里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为自己辩护，从而默认你们错了，害怕在兄弟的共产党面前露面”，这就等于承认南共中央走上了分裂和背叛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和“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事业”的道路。

5月29日南共中央致情报局一份声明，声明南共愿意参加情报局的行动，但强调它不能派代表出席情报局的这次会议，因为它不能接受会议的议程，因为苏共中央和南共中央之间的“分歧”问题一开始就被歪曲了。也就是说，情报局成员党的领导不问南共中央对发生的争论有什么解释，不作任何调查，就接受了苏共中央的指控，在已经发表的声明中片面地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而不顾南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第一封信的复信中所提出的论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争端只会加深分歧而不会消除分歧。与此相反，消除分歧的唯一正确途径，是南共中央代表和苏共中央代表通过直接会晤来讨论争执问题。南共要求从将要召开的情报局会议议程上取消对“南共状况”的讨论。然而，在苏共中央的坚持下，情报局没有接受这一要求。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是，当苏联得知茹约维奇和赫布兰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被逮捕的消息后，提出要派代表参加对茹、赫的审判。南政府立即发表声明说：这是南斯拉夫的内政，外人无权干涉。

这些事过去多年以后，曾有一名外国记者问铁托：

“本来按照斯大林的命令，你会被干掉，这是否是真的？”

铁托说：“关于这一点，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不愿去布加勒斯特，这是真的。”

1972年5月，铁托在同贝尔格莱德电视台台长的谈话中，更加坦率地谈及不去布加勒斯特的决定：

“我知道，去意味着什么。不错，我这条命早就够本了，我可以去并牺牲在那里，如果这么做有用处的话。但是，我知道，不会有用处，悲剧会在那时才开始。”

原南共政治局委员米洛万·吉拉斯在他著的《铁托内幕

故事》一书中也曾对这段历史有过生动的描述：“在1948年6月危机期间，当时我们正在克拉尼宫的花园里起草拒绝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我们将受到一次‘意识形态审讯’）的答复时，铁托突然愤怒地说：‘如果要把我们打死的话，我们也宁愿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

● 南共被开除出情报局

1948年6月20日至30日，情报局第三次会议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除南斯拉夫外其它8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情况。6月28日，在南共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并公布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决议引用了斯大林给南共中央信件中的评价和指控。决议把南斯拉夫共产党说成是“富农党”，其领导人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对苏联和苏共执行敌对的政策”，在对内政策中放弃了工人阶级的立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完全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走上了民粹主义的“富农党”的道路。指责南共偏爱富农分子，在农业政策方面犯了错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抹煞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

决议责备南斯拉夫共产党，说它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把马克思主义的党“溶化”在非党的人民阵线中，从而重犯了俄国孟什维克的错误；破坏了党内民主，把南共变成了一个宗派-官僚型的组织。决议指出，南共领导

由于对自己的党采取这种“取消主义的”的政策和发布蛊惑人心的“左”倾的命令和宣言，从而“走上了背叛劳动者国际团结事业的道路，转向民族主义的立场”。决议还说：“这种民族主义的路线只能导致南斯拉夫蜕化成为一个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丧失它的独立，并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南共领导人被说成是“野心勃勃、骄傲自满和目空一切”，他们实行冒险的和蛊惑人心的政策，走上了完全不承认错误的反党道路。

决议指责南共中央没有接受“向情报局提出自己工作报告”的要求，并由此得出结论：南共中央“把自己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置于兄弟共产党大家庭之外”。决议在进行上述指控后，还煽动南共中的所谓“健康力量”起来迫使南共领导“公开地、诚实地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否则就“撤换他们，并选出一个新的国际主义的党的领导机构”。在决议讨论过程中，苏共代表日丹诺夫甚至声称：“我们已经掌握情报。铁托是帝国主义的一名间谍。”在一片危言耸听的指责声中，情报局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了情报局。

从1948年3月18日到5月22日，南共和苏共之间就双方分歧交换了七封信件，再到6月28日情报局作出决议，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可以看出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首先，关于苏联专家在南斯拉夫的活动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间为共同繁荣经济，加强国防，互派专家进行国际主义的帮助，是完全必要的。特别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建设上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派专家到兄弟国家去协助工作，也是很受欢迎的。但是，经验表明，“援助他人”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往往不尊重受援国的独立自主和民族特点，容易滋长骄傲情绪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这些问题如果采取

正确的态度，得当的措施，是不难解决的。然而，苏南冲突，恰恰是苏共领导没有本着友好协商精神，不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和民族感情的恶性发展的结果。

例如：南斯拉夫解放后不久，苏联向南斯拉夫派出了一些民用和军事专家帮助南斯拉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苏联专家不考虑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总是盲目地照搬苏联的经验行事。苏联专家甚至向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检察长建议，依照苏联的做法，于1945年在南斯拉夫设立秘密法庭，专事审判共产党员。这一建议遭到检察长的坚决反对，因为在南斯拉夫如果设置这样的法庭，人民会对此表示愤慨，党员必然会群起而攻之。

另外，苏联专家坚持要按照苏联军队的规章制度来训练南斯拉夫军队，不尊重南军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积累起来的建设经验。苏联军事专家的工资比南斯拉夫将军的工资高出三四倍，这对刚解放的南斯拉夫国家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因此，南要求苏方军事专家尊重本民族的特点和适当削减军事专家的人数是合情合理的。苏方则指责南在苏军军事顾问的周围造成一种“敌对气氛”，并以此为借口，撤走全部军事专家。

往返信件中还谈到关于文职专家索取情报的问题。比如，苏联的商务代表列别捷夫向南一部长助理塞赞提奇提出索取情报的要求，塞赞提奇告诉列别捷夫，依据南政府的规定，他无权向任何人提供重要的经济情报，苏联方面又向南共中央和政府那里去要这类情报。在当时，国际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形势下，南斯拉夫政府这样的做法，是符合本民族利益，同时也是符合包括苏联在内的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对敌要求的，是无可非议的。然而，苏方不仅坚持苏联专家可

以直接索取经济情报，而且无理指责南对苏文职专家“不信任”，并以此为由，撤走全部文职专家。

更有甚者，在南斯拉夫人民军第四军军部工作的苏联军事教官索尔达托夫将军向他雇佣的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的人员声色俱厉地说：“南斯拉夫是一个只能依靠苏联才可以生存的小国。解放南斯拉夫的是我们俄国人而不是任何别的人。我们有权要你们做我们所需要你们做和想叫你们做的一切。”这一切完全是大国主义的霸道做法。

其次，关于南共党内生活和党与人民阵线的关系问题。苏共在信件中，对南共进行了一系列指责。如说南共党内没有或几乎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最突出的是党的负责人事的书记也是国家保安部长。按这种说法推论，南共全体党的干部都受着国家保安部的监视，国家保安部实际上控制着党。又说南共党内部民主气氛是不浓的，理由是：中央委员的大部分成员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指派的等等。

对此，南共一一作了回答。说明负责组织部门的书记兼任国家保安部长，并不妨碍党的领导工作，因为南共是通过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工作的，国家保安部长不过是南共中央委员之一，他本身要接受党中央的领导，怎么能说由保安部长控制党呢？同时又指出，在南共中央委员中，19名是由选举产生的，7名新委员是被指定的，他们是来自候补委员和党内最优秀的领导人，如此等等。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南共党内事务，诸如什么时候开代表大会，大会决议是否要在报上发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如何以及人事安排等等，如果两党的关系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话，苏共有什么理由对南共进行干预和指责呢？

第三，关于南斯拉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苏共在

信中为南共罗织的另一罪状是：“南共党内没有贯彻阶级斗争政策的精神，城乡资本主义在迅猛增长，而党的领导并未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相反，“在掩盖阶级斗争和调合阶级斗争的精神状态下”，使党解除武装。批判南共党“从伯恩施坦、福尔马尔和布哈林那儿借到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理论”。并且指责南共在社会主义改造上，“低估了苏共的经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危险，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允许的”。就是说，别的国家在夺取政权后，一定要按照苏联的“模式”办事，不然的话，就被指责为“腐朽的机会主义理论”。这种要求别国照搬苏联的做法，不仅违背马列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而且也表现了苏共在对待兄弟党的问题上“以我划线，唯我正确”的傲慢态度。

从往返的信件中所论及的这三个主要问题，可以看出，导致苏南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苏共以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傲慢态度对待南共党和南斯拉夫国家所造成的。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完全是错误的。

1948年6月28日，也就是情报局会议闭会的一天，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则简讯，报道南共已被情报局开除。下午3点钟，布拉格电台全文广播了情报局的决议，把苏南冲突公布于世，全世界为之震惊。正在布里俄尼岛别墅度假的铁托，听到广播后，愤怒地拔出手枪向芦苇丛中哇哇叫的青蛙打了一发子弹。后来铁托曾说，当时好像中了雷击，但并没有丧失信心。那一天，当南斯拉夫的公民阅读《战斗报》知道了这件事后，他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当头一棒。

当南共和铁托接到这个远远超过情报局职责范围、粗暴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错误决议时，深深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

前途担忧，他们感到棘手，但不甘屈服于压力。6月29日，铁托主持了中央全会，通过严肃认真的讨论，分析了当时形势，通过了《关于共产党情报局对南共情况的声明》，这一声明连同情报局决议一起刊登在南斯拉夫《战斗报》上。把事实真相摆在群众面前，让党内外人民群众自己去比较，去判断是非。

声明义正词严地逐条驳斥了情报局对南共的指控。声明指出，情报局决议中的批评是“以不准确和不真实的论断为依据的”，关于南共活动不公开的说法“表明对南共在一定时期的工作形式不了解”，因此，关于党“溶化”在人民阵线中的论断产生的根源在于“不了解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的实质和工人阶级在阵线中实现领导作用的方式”。声明还指出，南共丝毫没有危害共产主义阵线的团结，因为这种团结不能以承认捏造的错误和污蔑为基础，恰恰相反，是情报局破坏了自己的“每个党在接受决议方面的自愿”原则。声明认为，这种指责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和整个南斯拉夫作出了历史上不公正的论断。最后声明还表示了要在国内更加顽强地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决心。铁托后来回忆说：“当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世界都攻击我们。我们被革出教门。在边界上对我们进行威胁，以武力相威胁。但是，我们决心抵抗，决心进行斗争，我们全都作好了准备：维护独立，维护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自由道路。而斯大林已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要抵抗，那么是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把他们击败的……”

● 把最坏词汇扣在铁托头上

以铁托为首的南共和全体南斯拉夫人民，坚决顶住了苏

联的压力。斯大林无法理解，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会如此一致地和坚决地支持以铁托为首的南共中央委员会。有一次，他甚至公开承认：“我不喜欢这种顽固的态度。”为了向南共施加更大的压力，情报局又一次针对南斯拉夫问题召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更加危言耸听的决议。

1949年11月下旬，情报局第四次会议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8个党的22名代表，南共继续被排除在外。这次会议公然称南共为“铁托匪帮”，并说，从情报局1948年召开的上一次会议到今天，“铁托匪帮”终于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向法西斯主义的过渡，这个“贝尔格莱德受雇佣的间谍和凶手匪帮公开地同帝国主义反动派达成协议，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效劳……”会议作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凶手和间谍手中》的决议，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攻击了南共。决议说：

铁托匪帮转向法西斯主义不是偶然的，这是按照这个匪帮的主子——英美帝国主义者的命令完成的，据现在的情况表明，这个匪帮早就充当了他们的雇佣者。

南斯拉夫叛徒为了满足帝国主义的愿望，提出了在人民民主国家建立由反动分子、民族主义分子、教权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组成的政治集团的任务，以便依靠他们，在这些国家实现反革命政变，使它们脱离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们从属于帝国主义势力。

铁托匪帮把贝尔格莱德变成了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和反共宣传的中心……铁托—兰科维奇匪帮变成帝国主义的直接代理机构和战争贩子帮凶，其顶峰表现为南斯拉

夫政府在联合国组织内公开投靠帝国主义集团。在联合国组织内，卡德尔之流、吉拉斯之流和贝勃勒之流在国际政治最重要的一些问题上同美国反动派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在内政方面，铁托-兰科维奇叛徒集团的活动的的主要结果是，南斯拉夫的人民民主制度实际上被消灭了……南斯拉夫的统治者蛊惑人心地和无耻地欺骗人民，说什么他们正在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事实上，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明白，既然铁托匪帮中断了同苏联、同整个社会主义和民主阵营的关系，从而使南斯拉夫失去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支柱，在这样的条件下谈不上什么在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残害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毫不动摇的战士的残酷程度，只有希特勒法西斯分子或者希腊的加尔达里斯和西班牙的佛朗哥的刽子手们的兽行才能与之相比……铁托匪帮对南共健康力量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的结果是，南共的领导权无可辩驳地落到间谍和凶手的手中……

铁托匪帮的法西斯意识形态，法西斯的对内政策以及背叛性的对外政策，是完全从属于外国帝国主义集团的。在铁托—兰科维奇法西斯间谍匪帮与爱好自己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真正利益之间造成了一道鸿沟……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铁托匪帮已完全转向法西斯主义，它已投靠国际帝国主义阵营，有鉴于这些事实，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认为：

1. 铁托、兰科维奇、卡德尔、吉拉斯、皮雅杰、戈什尼亚克、马斯拉里奇、贝勃勒、姆拉佐维奇、伏克曼

诺维奇、科查、波波维奇、基德里奇、奈会科维奇、兹拉蒂奇、韦莱比特、科利舍夫斯基等人组成的间谍集团，是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敌人，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敌人。

2. 这个间谍集团所表达的不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意志，而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意志，为此，这个集团出卖了国家的利益，取消了南斯拉夫政治上的独立性和经济上的自主性。

3. ‘南斯拉夫共产党’在目前的组成下，由于已落入人民公敌、凶手和间谍手中，已经没有任何权力称为共产党，只是执行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集团的任务的一个机构而已。

为此，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认为，同铁托匪帮——受雇佣的间谍和凶手作斗争，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义务。向正在为使南斯拉夫回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而斗争的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提供全面的援助，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义务……情报局表示坚信，将在南斯拉夫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找到确保战胜铁托—兰科维奇资产阶级复辟间谍集团的力量，南斯拉夫的劳动人民将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懂得重新恢复人民民主的历史性成果……

如果说 1948 年情报局的决议还有兄弟党之间的批评的话，那么 1949 年情报局的决议则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完全当成了敌人。这两个决议公布以后，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南斯拉夫的国际处境急转直下。

第六章

铁骨铮铮，顽强抗争

● 黑云压城

从1948年秋天起，南斯拉夫受到邻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用国家政策的一切手段施加的压力。在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反对南斯拉夫的宣传中心，这些中心得到了苏联的物质资助、公开的政治支持和道义支持。

有的国家的做法甚至更粗暴。例如在阿尔巴尼亚，焚毁铁托的照片、到处袭击南斯拉夫人、从医院赶走南斯拉夫病人、停止供应南斯拉夫儿童的食品等等恶性事件屡屡发生。

情报局决议发表时，由于各种原因（留学、进修、在使馆或领事馆及其他代表机构中工作）而逗留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公民，也受到强大的思想政治上的压力和精神上的压力，要他们表态支持对南共的指责，但绝大多数南斯拉夫公民拒绝这样做，并回到了祖国。

例如，战后，南斯拉夫派了将近3000名青少年到捷克斯洛伐克各地工厂进修。情报局决议发表后，捷克斯洛伐克当局要他们表态反对祖国。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这样做，他们要求回家，要求回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不同意。儿

个被收买的南斯拉夫籍教员也开始做这些青少年的工作，有一个教员对青少年们说，他们一回到南斯拉夫就会被捕。他向他们表示，如果他们拒绝回南斯拉夫的话，他将用飞机把他们带到莫斯科去，甚至威胁他们说：“谁想去南斯拉夫，我把他的牙齿都打掉……去吧，去吧，我一个月以内也要去南斯拉夫。我要喝那些回去的人的血。”青少年们仍然不屈服。9月中旬，他们开始罢工，以示抗议，当捷克斯洛伐克当局逮捕了将近180名学员，并且逮捕了一些支持他们的南斯拉夫教员后，学员们在宿舍里开始绝食。警察把住有南斯拉夫学员的宿舍全部包围、停电、停电话、停水。

捷克斯洛伐克当局最后还是向这些难于压服的年轻的南斯拉夫人让步了。9月底，2762名学员回到了南斯拉夫，这些英雄般凯旋的青年受到了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12月中，又有12名青年回到祖国，并给铁托写了一封致敬信。

1949年新年前夕的那个夜晚，铁托向他的战友宣读了这封信。这封信使他考虑到南斯拉夫人民不仅在同斯大林的这次冲突中，而且在以往多少世纪以来为生存而斗争的道义力量的意义。他对战友说：“寄希望于诽谤和谎言会迫使我们承认真理不是真理的那些人，让他们知道，他们错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爱，在我们身上是一股力量，它不允许我们不讲气节，不讲原则。我们这一本性承继于我们的祖辈，我们认为，不仅每一个共产党人，而且每一个正派人都应认为这是一种最积极的本性。我们必须这样来教育我们的党员和我们年轻的一代。我们相信，真理和正义这一次也将胜利。因为，不然的话，世界的前途将十分黑暗。”

铁托继续说：“为了使自己的良知得到慰藉而谈论什么‘只要目的正当，任何手段皆无伤’的那些人理应知道，这句

话在宗教裁判时期在耶稣会会员方面是特别出名的。凭借肮脏的手段，采取不诚实的方式是建设不了伟大的事业的。伟大的事业只能采取相应的方式，凭借相应的手段来建设。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一点，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对不起我们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为争取正义事业的胜利所献出的鲜血。今天用这样一些不老实的手段来反对我们的那些人，有朝一日必定会停止这样做的，因为不然的话，这会对全世界的进步运动产生致命的后果。这是指在形形色色的报纸上或者以形形色色的方式散布反对我国的想入非非的谎言并把我们搞臭的那些人。”

1948年7月以后，苏联情报机关在南斯拉夫境内外大肆活动，企图尽可能多地拉拢政府各部、军队和其他机关身居要职的南斯拉夫人。许多南斯拉夫人对于同苏联发生冲突感到不安，苏联情报机关利用了这一点，想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些人拖进罗网，甚至不择手段。斯大林仍然寄希望于，在外界施加相应的压力的情况下，由南斯拉夫内部的“健康力量”充当主角，来推翻南斯拉夫政府。

例如，1948年年底，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领事馆大部分人员以及南通社记者一人宣布辞职，宣布拥护情报局决议。在贝尔格莱德外交部内，苏联情报机关也大肆活动，收买尽可能多的身居要职、知道密码和掌握最重要的文件的官员。仅东欧国家司就查明有21名苏联特务。他们中人人都供认了从苏联情报机关接受了什么样的任务。

与此同时，苏联还在背后策划让所谓的“健康力量”取代铁托。他们将亲苏派人物茹约维奇内定为南共书记，另一位人物赫布兰内定为政府总理。茹、赫二人被捕后，苏联还曾考虑过劫狱行动。

在苏联的影响下，1949年几个南斯拉夫的社会政治组织（妇女反法西斯阵线、工会联合会、人民青年联盟）被开除出它们参加的国际组织，有的由于受到歧视而退了出来。南斯拉夫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被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驱逐出境。1948—1950年，有145名南斯拉夫外交官被撵出东欧国家。1949年7、8月间，南斯拉夫受到强大的政治外交压力和军事威胁。苏联废除了同南斯拉夫的友好条约，甚至把整师的苏联坦克开到南斯拉夫的边境，其他东欧国家也纷纷效尤。南斯拉夫东北部边界集结了这些国家的部队。1948—1954年间发生了7877次边境事件，其中有142次武装冲突，有24名南斯拉夫边防人员丧生，12名公民被打死打伤。还多次发生侵犯南斯拉夫领土和领空的事件。同时有90个间谍中心进行反南活动，共向南斯拉夫派遣了713名情报局的间谍和破坏分子。

除此之外，苏联还对南斯拉夫施加了强大的经济压力。1948年底，苏联领导决定，苏南之间换货额比上一年减少7/8，从而开始了全面的经济封锁。塔斯社的官方公报说，苏联政府如此减少贸易额是“由于南斯拉夫对苏联奉行不友好的政策”。这样一来，苏联政府公开宣告了它出于政治原因而在经济上歧视南斯拉夫。

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按这一决定的精神办事，致使它们同南斯拉夫的换货总额从冲突前的67.08亿第纳尔下降到情报局决议公布后的21.22亿第纳尔。1949年下半年同南斯拉夫的换货完全中断。南斯拉夫和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之间分别签订的1947—1951年期间投资协定也遭到相似的命运。苏联于1948年年中停止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于1949年5月底停止履行协议规

定的义务，致使原定向南斯拉夫的投资 187.5 亿第纳尔的计划到 1950 年一共才投入 11.84 亿第纳尔，仅占 6.3%（其中苏联只完成了 0.6%）。

1949 年 9 月底到 10 月初，仅 6 天时间这些国家就都正式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的友好、互助和合作条约。为了给南斯拉夫的经济造成更大的损失，加强对南斯拉夫经济的压力，交通联络和其他联系也干脆中断了，减少了。罗马尼亚中断了铁路交通和邮政往来，而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把铁路、公路、邮政和电报往来减少到最低限度。阿尔巴尼亚除勉强保持邮政往来以外，中断了一切交通。南斯拉夫在多瑙河流经东欧国家的那一段河道的航运也变得困难了。罗马尼亚不让南斯拉夫的船只进入黑海。苏联政府则违反多瑙河公约，想把多瑙河变成一条“俄国的河流”。

情报局骇人听闻的压力使南斯拉夫的处境极端困难。由于拒绝参加情报局会议，南共实际上不再是这一组织的成员。1948 年，南斯拉夫只同 29 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在当时国际联系较窄的情况下，政治抵制使南斯拉夫面临着国际上几乎完全遭到孤立的危险。它单枪匹马地处理同邻国意大利、奥地利和希腊之间不友好的关系。

经济封锁在南斯拉夫的整个经济生活中引起严重的紊乱。投资协定的取消、同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贸易（占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的中断，致使南斯拉夫的外汇赤字急剧增加。1948 年，外贸赤字为 24 亿第纳尔，1949 年增加到 627 亿第纳尔。同时经济封锁还威胁到南斯拉夫五年计划规定的“基本建设任务”的完成。投资额的大大地减少迫使南斯拉夫不得不把五年计划压缩为“重点基本建设计划”。要保证为压缩后的计划提供资金，意味着在三年时间里南斯拉

夫不得不停止建设住宅、市政公用设施和其他设施，减少日用品的生产，这将使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1952年，铁托在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谈到情报局决议发表后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封锁问题时说，斯大林及其卫星国事先早就计算过封锁会给我们造成多大的物质损失，“只不过他们有一点错了，他们认为，这一打击足够沉重，会使我们屈膝”。

除了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经济封锁外，在这危急时刻南斯拉夫还遇到了其他困难。1950年和1952年发生的旱灾使国民收入减少，而1950年的朝鲜战争引起世界市场上价格大涨，使购买工业设备和原料发生困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施加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也给南斯拉夫带来困难。1948年3月20日美国、英国、法国发表三方宣言，违背和约的精神，采取了使的里雅斯特的整个自由区（甲区）归意大利的立场。

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压力使情况加倍困难：由于存在武装侵略的危险，南斯拉夫军队的大量部队不得不长期处于戒备状态，用于购买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弹药的短期贷款，利息高达42—44%。为了自力更生，南共党决定不惜作出最大的牺牲，努力发展本国的军事工业，1948年年中开始建立军工企业，到1951年，军事工业增长了5倍。南斯拉夫不得不增拨14.075亿美元用于国防，而这方面的外国援助总共才2.412亿美元，这就是说要拨出约20%的国民收入用于军事目的。由于经济封锁和增加国防开支而使南斯拉夫遭受的损失近20亿美元。南斯拉夫不得不将出口产品转向西方国家。然而，它们的出口产品在结构上、品种上和质量上都不符合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市场的需要。向西方国家寻求贷款、设计和设备不可能一下子办到，而且代价十分昂贵：只有在赔偿外国

财产国有化的损失和承认南斯拉夫王国的债务之后，才能得到贷款，归还期限最长为4—5年，利息甚至高到11%。为了渡过难关，铁托咬牙接受了某些苛刻的条件。

对于铁托的行动，苏联阵营再一次发动了进攻。他们不断地散布出种种谣言，破坏南斯拉夫对西方的实质接触。他们当时一句流行的话是：“铁托只有向帝国主义乞讨才能过日子，收买南斯拉夫只需1亿美元就够了。”铁托对这种污蔑的回答是：“对南斯拉夫，是谁也收买不了的。”不过，铁托在与西方的联系中，是在为渡过难关创造条件。比如从1949年到1959年10年当中，南斯拉夫获得价值约2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贷款、购置重工业设备的信贷，发展农业需要的肥料、种子和牲畜，小麦、面粉、医药用品，还有军事装备、军用飞机、舰只和商用船只。美国、英国等还派出了各类专家。

情报局处理南共问题还株连到情报局所属各党，特别是东欧各国党。在1949—1950年期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制造了数十起大案，审讯那里共产党的某些最高领导人，指控他们“卖身投靠”南斯拉夫，参加“美、英间谍机关”，有“民族主义”思想，东欧各国在党内开展了反对“铁托分子”，“铁托代理人”的斗争。

在阿尔巴尼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科奇·佐治受审讯并被枪决；1949年8月，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审讯了12名所谓替“铁托集团”效劳的“间谍”、“卖国贼”，军事法庭将3名被告处死，3名被判处无期徒刑，1名被判处3年徒刑；1949年9月，匈牙利的外交和内政部长拉伊克等8人，被指控为“铁托的帮凶”、“帝国主义的走狗”，结果拉伊克等3人被判处死刑，2名无期徒刑，1名9年徒刑，2名送交军事法庭；

1949年11月，保加利亚的副总理科斯托夫等11人受到指控，说他们与铁托、英美间谍机关有密切联系，从事大规模的政治与经济间谍工作，并同铁托达成协议要将保加利亚并入南斯拉夫，还说是他提议铁托担任南共总书记，结果科斯托夫被判死刑，5人被判无期徒刑，其他5人判处8-15年徒刑不等。

在捷克斯洛伐克，1952年11月，党的总书记斯兰斯基被指控为“托洛茨基-铁托分子”，受审讯后被枪决；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因为反对情报局对南共领导的批评，被指责为“铁托分子”、“右倾民族主义”，被解除总书记职务，开除出党后判处了3年监禁。在“清除民族主义分子”的口号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党内进行了三次大清洗。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参加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通过将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这一决议的8个国家18位代表中，一年以后，有6位代表以“铁托分子”的罪名被处决。

压力是巨大的，环境是恶劣的。南斯拉夫在那些日子里的确十分困难。当时一些西方国家认为，很难想象，南斯拉夫现政府能够继续执政下去。有的干脆断言：南斯拉夫完蛋了。西方一些大报纷纷发表评论，它们认为1948年6月28日情报局的决议是对铁托政府的最后通牒，意味着铁托政权的最终垮台。

例如《泰晤士报》6月29日写道：“……很难设想，现在治理着南斯拉夫的那些人还能继续掌权……”法新社报道了曼彻斯特《卫报》6月29日的评论：“曼彻斯特《卫报》今天上午发表社论，认为南斯拉夫政府很可能已经转入别人的手中。该报评论情报局公报说，它已公开号召南斯拉夫人民抛弃自己的领导人，改组政府。很可能这已经做了。据悉，托

尔布欣元帅（这位苏联红军元帅在关键时刻几次出现在布拉格和贝尔格莱德！）现在南斯拉夫，正在那里设法控制住局势，据认为，如果托尔布欣没有抵达贝尔格莱德的话，这样的公报是不会发表的。或许我们明天会听到，公报中所提到的铁托和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已经被捕，他们已经因背叛了人民的事业而受到审判。最后，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跳窗口。”

同一天，路透社报道说：“《纽约时报》驻华盛顿的一位记者说，华盛顿的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不会决裂，铁托元帅要么满足克里姆林宫的要求，要么被撤换。”就连流亡在外的国王彼得二世听此消息后也是满心欢喜。合众社6月29日早晨报道，彼得国王的秘书布拉纳·波波维奇说：“陛下感到高兴。不过，他认为目前还不能发表进一步的谈话，因为他还不了解这一事件的事实。”

帝国主义阵营幸灾乐祸，社会主义阵营许多党的领导人也在预言南斯拉夫铁托政权的迅速垮台。情报局头目尤金在离开贝尔格莱德时说：“你们连三个星期都坚持不了。你们不让步的话，西方帝国主义会把你们吞掉……。”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拉科西说：“小市民的民族主义在1941年使南斯拉夫陷入灾难，如果南共领导人继续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的话，将再一次使南斯拉夫陷入灾难……但是，他们不可能长期地抗拒下去……。”罗马尼亚外长安娜·波克则公开号召消灭南斯拉夫现国家领导和体制，她说：“消灭这一体制，对南共来说是一个生死问题。”她预言南斯拉夫将迅速垮台。

南斯拉夫政府还收到了一份又一份侮辱性的照会。例如，1949年8月29日由苏联副外长安德列·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签署的苏联政府的照会诽谤说，大家知道，“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阵营开小差了，投向了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的阵营”。维辛斯基接着用“外交”语言发表评论说，有各种各样的逃兵，有的出于胆小而开了小差，有的又自吹自擂，甚至随时准备跳上舞台，冲着他所逃离的阵营狂吠，恰如克雷洛夫的寓言里的情景：“请看小狗，它既然敢于冲着大象狂吠，它准是强大的！”维辛斯基在照会里最后说，苏联人“正是把南斯拉夫政府归于好夸口而又心怀恶意逃兵之列”。

后来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当时对铁托十分恼火，曾经狠狠地对赫鲁晓夫说：“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他就会倒台。”然而，“铁托是铁”，他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独立的立场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并没有因为各方的压力而“完蛋”。

●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南共党过去一直教育他们的党员要热爱斯大林，热爱苏联。并且相信斯大林也十分信任南共和铁托，党的领导人吉拉斯在一次讲话中诚挚地说：“我们一点也不怀疑，斯大林同志对我们党、对我们党中央特别是铁托同志的极大的爱护。”就是在情报局发表决议以后，甚至在南共五大期间也对苏联存在着幻想，以为南苏之间所牵涉的只是某种误会，某种争执，而不是冲突，认为这一定是一些心术不正的人背着斯大林搞的，斯大林是不知道的；认为他们之间总会求得某种妥协，找到某种折衷的办法，以利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以利于反帝斗争。

更有意思的是，情报局发表第一个决议以后，由于南政府未能及时向驻外代表通报事情的原委，南斯拉夫驻联合国

的代表竟不相信情报局会发表这样的决议。当世界各家通讯社开始转播6月18日情报局的决议时，这些外交代表还坚决予以驳斥。例如，6月29日合众社报道：“南斯拉夫联合国代表星期一晚上说，他不相信情报局会在布拉格发表声明指责南斯拉夫反马克思主义。合众社记者向他宣读了布拉格的声明，他说：‘必定是发生了某种混乱，实际上声明不可能是真的。’南斯拉夫代表认为这一事件是反南宣传。”

1948年7月2日，为庆祝南共五大召开，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第五区15000名人民阵线成员的群众大会，大会还通过了致斯大林的致敬电，《战斗报》7月3日发表了这封电报：

我们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我们从第五区人民阵线盛会上向你并通过你向苏联全国致以热烈的问候。

斯大林同志，我们深信，你将竭尽全力排除对我们全国，以我们党和我们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没有根据的指责。

我们对你，对苏联全国，对你们为全人类所做的一切的爱戴是无限的，诚如我们相信你将竭尽全力使真相不久就大白一样。

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万岁！

教导我们热爱苏联的铁托同志万岁！

我们的伟大友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万岁！

对斯大林的信任和崇拜在南共党员中十分普遍，五大结

束时，铁托也喊出了“斯大林同志万岁”的口号。但是最终事实无情地击碎了南共党员的幻想。1948年以后，铁托这样说道：

“毫无疑问，整个这场冲突，特别是决议（情报局决议）使我们的人受到极大的打击，尽管有许多怀疑，我们南斯拉夫人总的来说，对苏联，对斯大林是信任的……我亲眼目睹游击队员们口里呼喊着重斯大林的名字在战争中死去……我们年复一年地一再向我们的人民谈到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徒劳的……不必掩饰，现在也不必感到害臊，我们在1948年以前是怀着极大的信任和爱戴的心情看待苏联的。我们并不因这些幻想而感到害臊，相反，我们为此而感到自豪。这些幻想是积极的，表明我们是深信进步和社会主义的。而在1948年7月，当斯大林如此无情，如此残暴地践踏这些幻想，我们是极其痛苦的，但是我们没有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我们开始丧失对斯大林的信心……”

在南斯拉夫领导人中间，从一开始起就最坚决地抵制苏联的霸权主义的领导人就是铁托。但是当南斯拉夫人民对苏南冲突的真相并不完全了解，当人民对斯大林和他领导下的苏联仍然充满希望的时候，铁托对和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十分注意策略和方法，既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又要因势利导，掌握分寸，这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复杂的问题。他要用事实来教育人民，因此，在1948年7月以后，南斯拉夫最困难的日子里，他喊出“斯大林同志万岁”的口号决不是偶然的。1952年，曾有人问他，是哪些动机促使他在结束五大时欢呼苏联和斯大林。他曾这样回答：“当时不得不这么做。这不是曲意逢迎。这是为了我们的群众，不得不十分谨慎。斯大林的威信是不用怀疑的。如果我们走得过分快，我们就会脱离

群众。而我们走得慢了，俄国人就会践踏我们……”

作为革命家，铁托经历过许多艰难的时刻。最困难的是同斯大林的、也即同情报局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他同南斯拉夫全体共产党人一起经受了新的考验。

铁托直言不讳地说：“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是，他所相信的一切，他自己赖以成长的一切突然垮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现在应当猛醒，并考虑一下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什么。我得说，我是考虑了很多。我很难下决心。在这场血腥的斗争中，在我们为自己和苏联做了这一切之后，苏联对于我们来说是神圣的，但是一想到那几封傲慢无礼的信以及对我们的党和我们领导机构的指控，我的心都碎了。因为我们的人是呼喊斯大林的名字去死的。你知道，这不只是当头一棒，事情要深刻得多。我一再考虑，这会导向何处，从这一切可能产生什么情况。那时，我第一次说：在这件事情上是存在值得为之活着和奋斗的某种东西的，你可以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思想，仍然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权利和平等而奋斗……我极其热爱俄国人民。我在那里度过了6个年头，有过欢乐，也有过忧愁。后来，我是与革命生死与共。对于我来说，革命一生都伴随着我，直到今天。十月革命不是一场普通的革命，而俄国人民是杰出的人民。然而，我的许多同志也都曾在那里呆过，但是他们没有像我这样深刻地体会苏联人民的生活，对于冲突，他们有别的想法。他们来找我，问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说：‘没什么，现在才值得活着和奋斗。我们必须同这种现象作斗争，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并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促使他们现在这样来对付我们，那么，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必须彻底

忠于自己。’我没有说错。我们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只有个别人、软骨头屈膝了……”

● 空前团结的大会

在南共遭到苏共和情报局最猛烈攻击，而广大党员并不了解真相，仍将苏联看成是南斯拉夫最亲密的战友和朋友的时候，南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把正在发生的冲突问题摆到全体党员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面前，相信南斯拉夫人民是有鉴别是非的能力的。

1948年7月21日至28日，在贝尔格莱德“卫队之家”召开了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2344名代表，是从南斯拉夫共产党当时拥有的468175名党员和51612名预备党员中选出来的，其中除了106名代表外，都是经受过人民解放战争考验和锻炼的优秀党员。

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十分热烈的气氛中召开。铁托致开幕词。通过电台直播和报刊广泛报道会议情况，使广大人民及时了解代表大会的进程。铁托在会上作了长达9个小时的政治报告。报告中回忆了南共28年的战斗历程，指出情报局决议不仅是对南共党领导的攻击，而且也是对人民、对团结的攻击，这是号召一切破坏分子摧毁我们建造的一切，是号召挑起国内战争，是号召消灭我们的国家。他最后强调说：“同志们，在结束我的报告的时候，我要着重指出，在今天之前，南斯拉夫共产党体面地履行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我深信，在今后，它也将通过夺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体面地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

代表大会开了6天。在听取了报告之后，开始了热烈的讨论。代表们群情激愤，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会议常常开到深夜。所有代表反对情报局决议中提出的充满敌意的无端指责，反对否定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南斯拉夫军队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建立和作用、否定人民阵线（这是以共产党为首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的联盟）的经验和意义的种种指责和污蔑。没有任何人表示赞成情报局的决议。

请看下面这些代表的发言：

久罗·萨拉伊说：“铁托同志提醒我们，形形色色的暗藏的反党分子构成的巨大危险今天又威胁着我们党，他们响应情报局的号召，蠢蠢欲动，图谋危害党的团结和我国人民的团结。只有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我们的中央和铁托同志在我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意味着什么的那些人，只有想使我们党回到派别斗争道路上去的那些人，才能听从情报局；热爱我们党和珍视我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产党人，不会允许我们党走上崩溃和倒退的道路。”

伊万·雷根特说：“我们可以说，发生了视觉上的错觉，他们老远看见我们的旗帜是黑的，他们看见的不是红旗。让他们到这里来，让他们到近处来看，他们就会相信，这面旗帜是红色的，是火红的。我们党、我国人民使这面旗帜保持洁净，今后也将使它保持洁净……我们将努力工作，使所有的人比以前更加羡慕我们，我们将努力工作，以便将来当有人提到我们国家和我们党的时候，不是作为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的国家和党，而是作为正全力以赴地在我们南斯拉夫国家内建设一个幸福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国家和党……我们将继续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前进，让诽谤者们继续走他们的路吧，令人遗憾的是，这不仅于我们有害，而且于他们也有害。”

米哈·马林科说：“全世界迟早都会明白，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路线。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一点不仅要用口头上的简单的说明来证明，而且要用行动、不可争辩的事实、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来证明……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对于这一点，我们全党是意识到的。我们并不躺在战争中斗争成绩的桂冠上。以铁托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党和我国全体劳动群众以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在他的领导之下，我们确信，我们将成功。”

布拉若·约万诺维奇说：“情报局的指控使我们党受到沉重打击，但是并不能使我们党不知所措，也不能迫使我们党承认莫须有的东西，真理在我们这一边，真理最终还是真理，不论要做到这一点有多么困难。”

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说：“任何决议都无法从我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之上抹煞这一历史上震撼人心的光辉一页。而我们将继续我们已经开始的事业，在我们的道路上没有人能使我们感到困扰或停止不前。我们将使我们党的队伍和中央委员会的队伍更紧密地团结在铁托同志周围，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南斯拉夫，对于这一点，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都可以确信不疑。”

弗朗茨·莱斯科舍克说：“……我们建议我们的批评家们少采用帝国主义宣传机构的消息和方法，不是为了我国——在我国，这种诽谤只会巩固人民的团结——而是为了他们在我国的声誉，为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名誉和面子。南斯拉夫人民是神经坚强的人民。人们毫无道理地攻击我们，请看一看我们的人民是如何回答的，各地为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展开了竞赛。这是我们的最好的回答——尽早完成五年计划，尽早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

维茨科·克尔斯图洛维奇说：“情报局的决议、某些国家共产党的决议以及它们的党报指责、污蔑、诽谤和谴责南共中央和铁托同志干了一些闻所未闻的事情……他们要求我们党内所谓的健康力量强迫中央和铁托同志承认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倒向帝国主义……或者把以铁托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赶下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而正是这个以铁托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作为党的领导，在被占领的欧洲的各国共产党中是在伟大解放战争中唯一履行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义务的中央委员会。撤换和推翻 11 年来一直在奋斗，一直同自己的党和人民甘苦与共的这个中央委员会和铁托同志……今天把中央委员会和铁托同志从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赶下台，意味着使我们党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变得群龙无首。在中央委员会和铁托同志身上体现了我们党的力量和团结、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友爱和团结、我国各族人民英勇的过去、他们光荣的今天和幸福的明天。这两者是无法分离的，就如无法把脑袋同活着的、健康的身体分离一样。”

约热·波特奇说：“现在，当我们的党经历只有布尔什维克型的党才能经受的严重考验的时候，它是钢铁般坚强和不可动摇的，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好属于我们的党，这使我们感到十分自豪，但是我们也意识到现在需要我们作出更大的努力……我们的党员有历史性的任务：用行动、成就和社会主义建设来证明自己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每一个党员都应向党、向人民和向那些为了人民的幸福而献出了生命的人负责……”

莫沙·皮雅杰说：“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不得不证明，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除了对于魔鬼，我们得证明，它是白的。这次代表大会十分出色地反映了我们党是不可动

摇地团结的，它是坚强的，党员群众同中央委员会是紧密联系的，党员对领导、对我们党的力量和团结的主要建设者——铁托同志是深深地、不可动摇地信任的。这次代表大会在迄今的整个工作中，表明我们党懂得以健康的方式对情报局不真实的、诽谤性的指责作出反应。因此，这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不论是否提到对我们党闻所未闻的攻击，是否提到国际工人运动以及整个民主运动所遭受的巨大损失，都证明，我们党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等待它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新胜利，尽管还有巨大的困难有待于我们去克服。”

韦尔科·弗拉霍维奇说：“我国人民中间有一条谚语：‘下雪不仅为了给世界增添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只野兽显示踪迹。’夏日炎炎降临到我们党头上的这场雪，在无可辩驳的真实的阳光照耀下必然会像其他任何雪那样融化。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在这场雪上看出了各种踪迹，如果情报局研究一番这些踪迹，并且跟踪追击到窠穴，往里看一看，这不是一件坏事。我认为，如果这样的话，会给工人运动作出巨大贡献。至于我们，在情报局这场雪下遭殃的只会是机会主义者、形形色色的反党分子或许还有不熟悉暴风雪的个别好心的党员。当这场雪融化之后，我们党将变得更加明亮和清洁。”

这些代表的发言常常被雷鸣般的掌声和“铁托、铁托”的欢呼声打断。大会结束的最后一天，铁托代表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又一次走上主席台。他向代表们对他的信任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这次大会显示了党的历史上空前的团结，这是党“在自身的发展以及建设我们这个新的社会主义祖国方面，以更加有力的步伐向前进的”保证。他强调说：“同志们，我提醒你们，我们正处在困难的形势下，正处在一个困难时期。我们党正面临巨大的考验，只要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保持党的团结一致，保持冷静，我们的胜利是有保障的。”最后他高呼：“南斯拉夫共产党万岁！”

全体代表站了起来，高呼：“党——铁托！、中央——铁托！、铁托是英雄！”最后唱起了《国际歌》。当执行主席莫沙·皮雅杰宣布南共五大闭幕时，已经是凌晨1点50分。突然，代表们又齐声高唱：

铁托同志，我们向你宣誓，
我们决不离开你的道路，
铁托同志，共产党员的领袖，
党像泪水般纯洁无瑕。

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显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坚如磐石的团结和力量。

对于苏南冲突，南斯拉夫人民被笼罩在一片被欺骗的愤怒之中。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一句诗：“我所热爱的朋友，给我带来最大的灾祸”，代表了当时许多人的心情。南斯拉夫人民，无论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还是战后，对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它的领导人斯大林的感情，是很深的。德意法西斯占领了南斯拉夫不久，南共号召全国人民举行反法西斯武装起义的宣言中就有这样的话：“不能用我们的铁路运送战争物资供法西斯匪徒去攻击苏联……苏联的战争就是我们的战争。”南斯拉夫的游击队战士在敌机疯狂轰炸的时候说：“在我们头上多掉一颗炸弹，在苏联就少掉一颗！”有的战士被敌人抓住，在套上绞索前几秒钟还高呼：“共产党万岁！苏联万岁！”然而，就是这个最依赖的朋友，竟停止了与南斯拉夫的一切经济往来，并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人

民被惊呆了，这种震惊中包含着极其巨大的精神痛苦。

不过，跟着自己的党和领袖从反法西斯战争中走过来的英雄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不愧是英雄的人民，它们在苏南冲突最严重的关头，坚定地相信党，相信铁托，并给予他巨大的支持。南斯拉夫的伟大领袖铁托的正义声音鼓舞着南斯拉夫人民的这场抗争。铁托说：“一个小国，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人打它一记耳光，它决不应该沉默不言。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不管他是谁，威胁一个小国的人民，他们在不久以前的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战争中流过不少鲜血和献出了不少生命，他们绝不容许别人毫无根据地诽谤和侮辱他们。任何人，不论他是谁，都休想仅仅由于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于任何侮辱和诽谤不会沉默而是用真正的事实保卫自己，就以战争胁迫这个国家的人民。打我们的耳光，侮辱和诽谤我们，用最下流的言词诋毁我们，而我们对此却必须沉默不言，有谁有这种道义上的权利来要求我们这么做呢？当然没有人有这种权利。因此，我们是这样看待事情的：我们有权说，捏造就是捏造，谎言就是谎言。我们由于捍卫了真理，可以平静地展望未来，而不管已经发生过什么事情。你们知道，作为自由的人民，为了正义和真理，宁可光荣地在斗争中牺牲，而决不屈服，决不俯首听命，决不看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伟大原则被践踏而不反对。”

人民对铁托的信任正如南斯拉夫著名作家罗斯拉夫·克尔莱扎所写的：“铁托的名字今天成了我国各族人民用血肉书写历史以来各代人的戏剧性的象征……铁托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暴，在纲领和政治方面取得了光荣的胜利，他的名字如果用我们自己近一个世纪以来文化、历史和政治的标准来衡量，乃是几代人一切光荣的、有

历史意义的积极努力的综合。”

这场斗争鼓舞了南斯拉夫的许多作家、诗人，他们纷纷拿起了笔满怀豪情地热烈歌颂铁托、党、军队和共和国。诗人尤雪·卡什特兰在《铁托之歌》里用诗歌的语言表达了这个豪迈的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想法和心脏的跳动。

在这个国家里生活着一个人，
生活着同志和领袖
——约瑟夫·布罗兹·铁托。
热爱自由的人，
人人热爱他；
为真理而斗争的人，
人人熟悉他的名字。
在这个国家里生活着一个人，
他始终面带笑容，
因为他永远向前看，
他生活着，工作着，
他房间里的灯光，
常同曙光辉映。
所有幸福的人都知道他，
山间的牧民歌唱他，
无名的诗人赞颂他。
他是我们的同志，而同志就是一切，
他是战士，他是胜利者，
他是建设者，他是军人。
他出现在坑道，出现在舵位，
他出现在有人民生活的地方。

在这个国家里生活着一个人，
生活着同志和领袖，
有他在，就有欢乐，
因为只有自由的人才兴高采烈，
有他在，就有胜利，
因为只有真理才战胜一切。

● 铁托吐露肺腑之言

局势越来越紧张，为了压服、搞垮铁托，斯大林甚至以武力相威胁。但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决不屈服，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自己神圣的国家。1949年秋天南斯拉夫人民军举行了第一次大演习，铁托作为人民军的元帅亲自指挥和观摩了这次军事演习。

演习结束后，铁托向部队的指挥官们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首先高度赞扬了他们的优秀品质和杰出的军事才能，然后他讲了目前国家所处的严重局势和面对这一局势自己的想法。他十分坦诚地讲到：“现在这里没有记者，也没有外国人。对于公众，我已经讲了话了，但是我们一起度过的这几个小时以及你们的誓言，又促使我去思考，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这一切使我产生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愿望，向你们吐露内心的想法。同志们，请不要见怪，我一生中第一次想向你们谈谈我的一生，就像基督教徒觉得必要忏悔一样，由你们来判断，我是否可能选择不同于我们现在这条道路的别的道路……我不信教，我认为，我没有义务去考虑自己国家境外的任何人，不论他们是在布加勒斯特也罢，尽管情报局要求我这样做。对

于在我国国内，在我国人民中间的工作，我们只对我国人民负责。没有任何人比你们更有权听我谈谈事情的真相。你们跟我在一起开进了乌日策，渡过利姆河，越过波斯尼亚东部和克拉伊纳。在格尔梅奇山下和奈雷特瓦河上，我们遭受了切特尼克第一次背后的打击，我们目睹过伊格山悲壮的场面，巴尼亚和科尔敦的饥饿的儿童和妇女的队伍，斑疹伤寒猖獗，在苏捷斯卡河上，我们数以千计的战友们倒下……我知道，跟我一起开拓革命道路的你们最能理解我，你们会更加确信。我们不可能选择另一条路。”

铁托深情地向战友们叙述了自己走过的生活道路：从库姆罗韦茨和在萨克当学徒一直到在西伯利亚遇到布尔什维克，从事地下工作，服苦役，在共产国际工作，在战争前夕生命攸关的日子里致力于巩固党以及南斯拉夫人民进行了为期四年的史诗般的英勇斗争。他谈到解放后的艰难而又令人兴奋的日子，“当时，甚至斯大林也赞扬我国，后来又突然发生 180 度的大转弯，对我国发动了疯狂的敌对运动，甚至于竟然施加了军事压力”。

铁托愤愤不平地说：“同志们，我和我的许多同志竟被宣布为盖世太保的代理人和出卖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而原因仅仅在于我们忠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理想和国际主义原则，我们不同意别人向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不愿意听命于别人，不让拿走我们的财富，不接受我们的同志在自己国家里要顺从地听凭外国军事和经济专家指使以及为其他国家效劳。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还有什么比不公正地宣布他是叛徒，还有什么比今天全世界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开除我们党，宣布我国是被包围的国家更严重的事？我确信，我们有力量克服这一切，但是问题是能否料到什么时候真理将战胜。”

铁托在战友面前不怕承认，对他来说，今天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他略加思索，大声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敢不敢选择一条盲目屈从的道路？或者说，在经过多年的严峻的战争之后，过不久就面临一个更为严峻的时期，这是势所难免的事？

这个时候，铁托的声音更加洪亮，更加充满自信，更加坚定：“同志们，我本可以选择另一条路，选择对斯大林和情报局表示赞许的路。我如果那样做了的话，我本人会继续受到称赞和颂扬，对我个人来说就会一切如意，我也不会成为‘叛徒和出卖灵魂的人’而是会受到赞扬。但是，我不能选择这样的路。我那样做的话，就会给自己的一生抹黑。那时，我真的会觉得自己是出卖灵魂的人……或许我活不到真理战胜的那一天……但是，我确信，你们中间，年轻的战友中间，会有人能活到那一天，那个需要用武器来捍卫代价高昂的自由……”

他接着说：“同志们，如果我们活不到那一天的话，请你们保证做到：决不允许因出现任何情况而动摇，继续斗争下去，不惜作出牺牲。请你们相信，唯有真理终究是会战胜的。即使你们也活不到那一天，我们的后代会活到的，那时他们不会咒骂我们，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没有出卖国家的前途。”

军官们聚精会神地听最高统帅讲话。铁托讲完话，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突然，一片寂静。他们望着铁托，而铁托也望着他们。大家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就这样，在一片寂静中过去了一二分钟，突然在队列的后面响起了歌声：

铁托同志，歪戴起军帽，
你的无产者战士朝气蓬勃。

……

其余的人也都齐声高唱起这首歌。铁托满脸红光，微笑着望着这些忠心耿耿的战友们，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不由得使他热泪盈眶。他坚信：正是由于南共的团结和全党齐动员，由于人民的大力支持、团结一致和为了维护国家独立而决心作出最大的牺牲，南斯拉夫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 “只有自助，上帝才会来援助”

苏联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以后，1950年南斯拉夫又遇上大旱，好几个星期没有下一滴雨。土地都干裂了，庄稼都蔫了，草都发黄了，农民感到不安。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粮食短缺十分严重。当时，从总的经济形势上看，南斯拉夫还没有完全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出来，国内各种物资相当缺乏。南斯拉夫实行了粮食配给、工业品凭票购买等定量供应的制度，全党上下勒紧了裤带。

铁托有一次在电台发表的讲话最清楚地勾画了当时的种种困难：“我们的处境是困难的。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又轻松过呢？我们已经习惯于困难了。困难不可能使我们动摇，更谈不上压垮我们了。我们过去相信会取得胜利，当整个欧洲笼罩在法西斯的阴影下，当很大一部分人丧失了信心，开始认为恶势力的胜利是长久的时候，我们进行了斗争。我们今天也不动摇。”

但为了生存，南斯拉夫不得不向外国求援，这是铁托很不乐意做的一件事，他在同人民青年团主席米利扬·奈奥利契奇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我不喜欢接受别人的援助，我希望

尽早不接受援助。我更喜欢我们提供援助。”

要使南斯拉夫有朝一日不再被称为巴尔干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电气化，仅靠国外的援助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自强自立。因此，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首先得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这场维护独立的壮丽斗争中，劳动人民和青年大规模地从事志愿劳动，来兴建关键工程，这种做法是无法替代的。

铁托 1951 年 11 月对印度《新力量》周刊主编普拉巴克鲁·帕迪亚说：“有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投入公众的事业，一个国家就能尽早富裕起来。不只是有钱的人才有所创造，而是人的劳动是提高一个国家福利的主要依据……在这个问题上，需要顽强地、不断地致力于提高人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福利取决于自己，决不会是外界赋予的。从来没有哪一国人民的福利是外界赋予的，而都是靠了自身的努力才获得的。”他接着说：“有一句古老的带有宗教色彩的谚语：‘只有自助，上帝才会来援助。’要是你已经做到了自助，这个所谓的上帝是不难来援助的。”南共在接受外国援助时，始终坚持了民族独立自主。正如铁托所说：“无论在国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我们都没有作出任何让步。”

西方盟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对南斯拉夫援助问题上态度的改变证实了这一真理。

在整个南斯拉夫民族解放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人民加入了游击队的行列。游击队的人数从 1941 年的 8 万增加到 1944 年的 80 万。在历时 4 年的战争中，他们打退了敌人对解放区发动的 7 次大围攻，特别是 1943 年苏捷斯卡战役的胜利成为南斯拉夫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1943年5月中旬，德军指挥部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调兵遣将，发动了有13万人参加的第五次攻势，这就是著名的苏捷斯卡战役。由于南人民解放军没有足够的武器弹药和粮食，并且随军还有数千名伤员，战斗十分艰难。为了鼓舞斗志克服苦难，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部曾两次印刷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小册子。在铁托的亲自指挥下，人民解放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最高指挥部选择了苏捷斯卡河为突围方向，在战斗中铁托手臂负伤，解放军战士损失了大约1/3。但经过与4倍于己的敌精锐部队的浴血奋战，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包围，跨过苏捷斯卡河谷，来到波斯尼亚东北部，粉碎了敌人的第五次攻势，取得了战略大决战的伟大胜利。

苏捷斯卡战役的胜利说明南斯拉夫人民的武装力量已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盟国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

英国政府开始明显地改变了对待南斯拉夫局势的态度，最终放弃了原来的立场，即1941年底采取的使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一切力量都归米哈伊洛维奇指挥和完全受流亡政府领导的立场。1941年10月英国政府曾第一个派军事使团到切特尼克最高指挥部。1943年春英国开始向南共领导的游击队派出军事使团，接着，同年秋季英美军事小组也来到了游击队的最高指挥部。1944年2月苏联也派来了军事小组。

派到游击队和切特尼克部队的英国军事代表，有几次给驻开罗的英国情报局发回报告。报告说，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部队并没有有效地对敌人作战，相反，实际上在同敌人勾结，以便摧毁游击队。而铁托领导的游击队却是有效地抵抗敌人，并控制了大片国土。派到铁托那里去的英国军事使团团长、英国保守党议员麦克莱恩在会见首相丘吉尔时，向他汇报了从南斯拉夫战场发回的报告：“我还要向丘吉

尔先生强调指出我过去已提到的几点情况。我要强调说，游击队——不管我们帮助或是不帮助他们——将成为战后南斯拉夫的决定因素……”

基于此，1943年11月举行的英、美、苏的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一致同意“尽可能以最大限度的规模对南斯拉夫游击队提供物资和装备，并且派遣突击部队给予支持”。

1944年5月，丘吉尔在下院说：

“我们停止支援米哈依洛维奇……理由很简单。他不是在同敌人作战，而且，他的一些部属还去迎合敌人，由此引起同铁托元帅的军队的武装冲突……我们已经宣布，我们是铁托元帅的强有力的支持者。我们坚决地和铁托元帅站在一起，因为他正在同德军进行英勇而顽强的斗争。我们正在给铁托运送、以后还将运送尽量多的武器，同他建立最亲密的联系。”

他的这番话是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三年中承受了巨大的战争磨难和全部重担之后才说出的。

铁托对盟国援助的评价是：“就武器而言，在1943年年中以前我们只有自己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武器。我们没有从任何方面得到过武器。到了1943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盟国领导人才一致认为，应当向我军提供物质援助。1944年初，西方盟国的援助开始大量运来，主要是从意大利运来的。通过意大利，我们还开始得到苏联的武器。这便于我们武装越来越多的战士。而大家都知道，我们当时已经有30多万士兵。战争接近结束时，我们得到了比较大量的援助，因为以前不存在获得援助的条件。事件就是这样，这是历史真相。”

在最困难和最需要得到物资援助的大部分战争年代里，南斯拉夫人民却没有得到任何物资上的援助。但是，他们依

靠自己的力量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今天的经济封锁又算得了什么。面对经济封锁，铁托坚信这条古老的带有宗教色彩的谚语：“只有自助，上帝才会来援助。”

● 国际舞台上的重大胜利

尽管苏南冲突已经有了时日并且已公开于世，但苏联在联合国的任何场合都避而不谈苏南冲突。苏联认为，南斯拉夫属于苏联的管辖范围，它享有“天然”的权利，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内部的事情。但南斯拉夫却认为，苏南关系已经越出了意识形态上的意义，这是一个国家与国家关系的问题，因此，决定从国家关系基本准则的角度，要对苏联的威胁进行公开的揭露，以取得两个目的。第一，粉碎苏联的外交图谋；第二，将苏南矛盾公诸于世，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在1949年9月25日联大开会期间，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爱德华·卡德尔发言中公开了苏南冲突及其实质，他说：

“我认为应该首先强调指出，言行不一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这种情况在这个大厦中也有所反映。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大部分有争议的国际问题，在提到这里时，提到我们的面前时，已经面目全非了。

“一方面，最近数十年来，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沉痛教训以后，人类的民主意识有了很大的进步。譬如，今天已经很难公开地维护各国人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殖民主义制度、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列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弱小国家的权利等等，情况确实是这样。普通劳动者的舆论已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因素，而不管他们属于哪个阵营。

“另一方面，我们大家知道，这并不意味着那些遭到民主舆论谴责的行为已在实践中消失了。不，遭到谴责的行为仍在继续，但是，已用各种宣传的花招伪装了起来。譬如，形式上已把对别国人民的奴役斥为犯罪行为，但是，今天仍在用各种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广泛地进行这种奴役。形式上承认主权国家是平等的，但是，某些口头上捍卫‘平等和主权’的人在涉及他们同其他国家关系时，却很少考虑这种平等。譬如，所谓为了维护和平应该用战争进行威胁，这种非常危险的策略仍在十分广泛地运用。最后，正当大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时候，这种干涉却在实践中成为当前列强的国际政策的主要武器和新的战争危险的主要根源。但是，在舆论面前，所有这些事实都被千方百计地掩盖了起来，而在宣传中把它们说成完全另一个样子。

“某些人显然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尽可能把联合国变成进行这类宣传的讲坛。现在的问题在于：或者是我们在这里为谋求宣传效果而进行空谈和平的竞赛，或者是我们确实为争取和平做点事情。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认为联合国是和平与国际合作的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们首先就必须在这个大厦中为反对那种通过谋求宣传效果或进行民主空谈竞赛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倾向而斗争，换句话说，为反对言行不一的倾向和争取在这个大厦中讨论国际问题的实质而斗争。”

讲完这些道理之后，卡德尔把话锋转向了苏联：

“当我谈到言行不一问题时，不能不提到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反民主的做法。近来，世界舆论对这些议论纷纷。

“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说明，苏联政府并不总

是代表和平与民主的拥护者当前的愿望的。我们尊重苏联政府有利于和平与各国人民和平合作的积极的和进步的立场，我们曾经支持并将继续支持这种立场。但是，我们不能不同时指出，苏联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言行不一，尤其表现在苏联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不能在谈论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同时却采取像苏联政府今天对南斯拉夫这样的独立国家所采取的立场。不能在谈论爱好和平的同时，却进行像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所进行的这种威胁……

“像在历史上发生的类似事件一样，这里也把争端的思想上和物质上的真正实质掩盖了起来，同时，用前所未闻的诽谤和谎言形成围攻来进行威胁，这种围攻是很难在历史上找到先例的。为了想使我国屈服于别人的霸权主义倾向，千方百计地对我国施加压力。所施加的经济压力已经发展到东欧国家对南斯拉夫几乎完全实行经济封锁的程度。其次，还企图通过连篇累牍的不寻常的照会和公开的威胁来影响我国神经脆弱的人。此外，还示威性地调动军队和制造许多边界事件。只要指出一列事实就足够了：仅在1948年7月1日至今年9月1日这一时期内，就发生了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方面挑起的219起武装冲突事件，还侵犯了我国领空69次……”

卡德尔最后说：

“南斯拉夫人民维护自己的独立并为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而斗争，实际上就是在为争取人类进步的条件、为争取各国人民不受妨碍地发展自己创造力的权利而斗争。在这方面，他们不是从某种利己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出发的，他们并不缺乏同别国人民进行合作的愿望，他们也不荒谬地相信任何一个民族可以脱离其他民族而生活；他们这样做，是

由于他们认识到，人类的进步不能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人民从别人的各种霸权下解放出来。同时，这也是通向真正平等的国际合作和牢固的和平的唯一途径。”

南斯拉夫在联大会议上的发言，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对苏联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强横态度，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国际舆论上的遏制。为了扩大自己在国际行动中的影响，获得更大范围的支持，在当年的联合国大会竞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活动中，南斯拉夫决定参加竞选，南斯拉夫代表德迪耶尔和科萨诺维奇向各国代表作了大量工作，宣扬南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是支持民族独立的国家，以争取广泛的友谊和支持。

南斯拉夫的外交活动惹怒了苏联，它采取各种办法在联合国会议上打击南斯拉夫，到处扬言如果南斯拉夫当选，苏联就退出联合国，如果选东欧别的国家，苏联愿意在其他方面向西方作重大让步，并以推荐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竞选的办法来阻碍南斯拉夫竞选的成功。但是，在10月20日的非常任理事国的竞选中，南斯拉夫终于以39：19票的比分战胜捷克斯洛伐克而当选了。这是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也使南斯拉夫从被包围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困境中跳了出来，得到了相当多的国际社会和国家的支持，并对南斯拉夫人克服经济危机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条件。

南斯拉夫胜利了！南斯拉夫不再被孤立！当联合国大会上响起热烈的掌声的时候，德迪耶尔和科萨诺维奇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他们俩人长时间紧紧地拥抱，可怜科萨诺维奇体质太弱，拥抱中竟被折断了两根肋骨。

第七章

勇于探索，走自己的路

● 冲破苏联模式

南共被情报局开除以后，理所当然地对苏联的这种错误做法产生反感，这种反感引起了南共对苏联的一些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渐渐这种消极的批判发展成为对一些理论问题的重新学习和探讨。他们开始发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由于过于集中和过于依靠行政命令的管理，不利于调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反而有利于助长官僚主义。这种集权式管理经济的弊病在南斯拉夫经注实施中也有所暴露。因此，他们试图摸索一条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又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1年春天和夏天，铁托曾好多次会见外国记者。外国记者向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一位西方记者问他：是否存在南斯拉夫和情报局修好的可能？如果有朝一日同情报局的争端排除了，南斯拉夫是否又会奉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奉行的同一政策——完全倒向苏联的政策？铁托回答说：“同情报局修好是不可能的……至于说倒向苏联，我要说，如果同情报局的争端排除了，我们也会变得审慎得多。我们在以前的政策中犯了错误，表现为完全倒向苏联，而不是从一开始起，也即从战争结束起就奉行比较自主的政策。”

这对我们十分有害……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也犯了错误，因为我们照抄了苏联的做法。我们仿效苏联的榜样，而且是错误地仿效。现在我们明白了。”

铁托致力于开拓通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他设想建立起人、生产者和创造者将居首位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而不论他的民族属性如何。因为，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个人求得社会和民族解放的一个历史过程，应当导致使人成为自己生活的真正主宰，能够全面地发展自己的创造力，并在物质十分富足的情况下生活得更好、更愉快、更幸福。

铁托认为，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幸福的这种观点和设想的出发点恰恰是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在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的同时指出，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可能性在于劳动解放的过程，他断言，工人阶级是这一过程的历史主体。因此，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是这个阶级在创建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解放自己，同时也解放全人类。这些思想指导铁托和南共得出结论，认为工人自治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在同共产党情报局发生激烈冲突的那个时期，堪称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个勇敢的决定，南共深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诚如南共深深信任劳动者一样。

铁托 1951 年 5 月 15 日在贝尔格莱德同一批南斯拉夫记者谈话时强调指出：“同志们，对于未来，我并不抱过分的乐观，不过，我还是乐观的。如果不来干扰我们的话，你们会看到，我们将做出一番真正伟大的事业来。而这一切无需向魔鬼出卖灵魂。”

南共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再加上南共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以后有着一种发展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的自由，只要讨论出方案，就可以无阻力地在国内实

行。正是在这样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南共突破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干扰，突破了经济建设中的苏联模式，创立了一整套适合南斯拉夫情况的以社会主义自治为中心的南斯拉夫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经验。

● 实行“自治社会主义”

1952年11月2日至7日，在萨格勒布举行了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有2022名代表参加。大会总结了1948年以来同苏联作斗争的经验，全面批判了大国沙文主义的理论和政治实践，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照搬苏联经验的愿望表现了他们对苏联经验的“天真的尊敬”。代表大会把实行工人自治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发展中的转折点，并决定了党的新作用和改变了党的名称。党的作用是，不能再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号施令，但将继续决定总路线并作为指导力量；党要以说服的方法来为实现总路线而奋斗。共产主义者要通过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觉悟、观点和态度施加影响。与此相适应，按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榜样，大会把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代表南斯拉夫人民军向代表大会表示祝贺的科查·波波维奇强调指出，近四年来同强权主义的斗争避免了革命蜕化的危险性，也即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他在谈到军队在保卫国家方面的作用时说：“在这四年期间，苏联对南斯拉夫的侵略政策彻底失败了。但是我们不抱任何幻想，不认为危险已经过去。我们知道，我们在同谁打交道。潜在的侵略危险依然存在。因此我们仍将

不倦地加强我们的军队。”

铁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在报告中他谈到了当今世界上一些基本冲突的根源，特别谴责了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在大战结束时达成的划分利益范围的协议。他说，西方大国的代表“按照自己老的、司空见惯的解决世界问题的帝国主义方式”行事，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对于一切“认为苏联是无私的，相信苏联是小国人民的保护者这种说法的人来说，这不啻是第一次道义上的打击，使他们对苏联、对苏联政策的正确性第一次产生强烈的怀疑感”。

铁托在报告中说：“苏联早在战前、战争期间，特别是自德黑兰会议以来，就不仅放弃了保卫小国主权的政策，而且放弃了尊重小国主权、尊重小国人民意愿的政策。苏联为什么这么干？它这么干是因为它出卖了社会主义原则，走上了老的沙皇俄国的道路、大俄罗斯国家利益的道路……并竭力用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来掩饰这一点！”

接着铁托谈到苏南之间的冲突的由来：“苏联奉行这样的非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的原因何在？原因在于苏联的现实，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整个内部结构。苏联在内部发展中早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走上了迄今闻所未闻的官僚制度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官僚主义在苏联成了目标本身。它愈来愈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剥削者势力，这股势力不仅阻碍革命和革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逐步毁灭十月革命的成果……”

铁托特别谴责了苏联的“主导民族”说，这种论调对外就变成了苏联在世界上的主导作用论。“苏联的主导民族，也即俄罗斯民族的实践，导致了对外非俄罗斯民族来说是骇人听闻的后果。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主导民族论反映了主

导民族对该国其他民族事实上的民族压迫和经济上的掠夺。当然，非俄罗斯民族过去一直抵制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今天仍在抵制。

铁托接着谈到南斯拉夫和国际合作，谈到同世界上进步的国际运动的关系，谈到南斯拉夫的经济的发展，苏联及其卫星国实行经济封锁的后果。他在报告中对于南共为什么要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作了解释。

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还确立了南斯拉夫新的经济制度的各项原则：

1. 工厂和企业由直接生产者自行管理。

2. 新经济制度应当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之上，应当尽可能避免采用行政命令方式遏制这些规律。

3. 社会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控制应当坚决地在最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在社会计划基本比例（社会计划确保社会生产不致于出现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为国家的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总的方向）的范围内，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直接生产者的主动性。

4. 社会真正占有劳动和对剩余劳动实行社会主义的管理。

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南共联盟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改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方面，这场改革将能实现以下基本思想：直接生产者从国家手里接过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并把国家本身变为自己的行使社会力量的工具。但是，南共联盟也认识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情况加重了实现这个构想的困难。这里包括：

非常落后的物质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工人阶级的人数较少、非常年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有

联系；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已被打倒，但其残余仍然存在；党的干部包括领导干部过去形成的国家集中主义思想有着强大的惰性，国际关系中的“冷战”潮流没有减弱；经济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而国防费用已接近国民收入的1/4，作出了重大牺牲的居民的生活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农业生产仍落后于战前，而且农村的人口过多等等。

1953年，南斯拉夫放弃农业集体化政策，使农村党组织感到茫然和动摇。因为在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以后，好几年没有确定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政策。此外政治生活民主化为更自由地讨论各种社会发展问题和创作自由问题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唤起了反社会主义社会力量的复辟希望。他们指望批评斯大林主义、与苏联决裂和民主化进程，将使国家的发展走向资本主义并有可能实行资产阶级的政治多元化。南斯拉夫落后的物质状况和社会结构对人们的意识造成一种压力，而反社会主义力量企图利用党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来加强自己的思想影响和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

尽管存在以上种种客观困难和问题，但是1948年以后，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已经有了现实的社会前提。建立工人委员会发挥了生产者的劳动创造性和经营积极性，降低了生产费用，特别是减少了劳动力的浪费，因此，到了1952年，经济就开始迅速增长。这些令人鼓舞的经济成果加强了继续进行革命的社会改革的要求。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把这种社会改革不仅看成是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条件，而且看成是探索与斯大林相反的新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发展形式的一种模式。

自治所产生的新的社会意识，使党员重新确信社会主义的民主性质，因为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与情报局发生冲突以前，

全世界都把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南共联盟盟员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确认了共产主义思想，这种认识也扩散到广大阶层的人民群众中。在反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在重新确立全国政治领导的巨大权威和提倡具有解放性质的自治政治思想的有力影响下，南共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战略，作为新的民主的自治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得到了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原则上的一致支持。

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面目出现，以“老大哥”自居，动辄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而南斯拉夫敢于坚持独立自主，毅然抛弃照搬苏联模式，最早开创了另一种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探索，打破了苏联的一统天下。尽管其间充满艰辛、困难、问题甚至某些不成功，但是这种探索的精神难能可贵，直到今天仍然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第八章

不走回头路：苏南新型关系的确立

● 赫鲁晓夫致铁托的第一封信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以后，经过苏联党内的激烈斗争，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执政以后，决定改善苏南关系。1954年6月22日，赫鲁晓夫给铁托发出了自1948年中断关系以后的第一封信。这封信在某种意义上承认了1948年的错误并承认南斯拉夫具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表示愿意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并建议两党之间进行最高级接触以消除误解。铁托8月11日给赫鲁晓夫回了信，信中说你们说的一切都很好，但是为了能够建立起比较正常的关系，有鉴于痛苦的经验，光发表口头上的或者书面的声明还不够，还需要有事实。当时铁托对斯大林的继承者们还不很了解，还拿不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甚至担心这是不是赫鲁晓夫在耍手段而已。

这第一次书信往来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一切都是经过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进行，连中央委员也不是都知道，只是在党的最高领导确信这不是耍手段，而是某种更深刻的行动，是符合苏联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内部发生的变化以后，铁托才下决心把这一切向党的比较广泛的领导干部作了通报。

在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会明确表态后，1954年9月19日在策列的奥斯特罗日诺的群众大会上铁托第一次对赫鲁晓夫的来信公开地作出了反应，但是，他没有提到来信和复信。铁托说：“……当他们表示愿意实现正常化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赞成。我们并不是那种不忘旧怨的人，我们认为，沿着我们的边界生活着的这些国家的人民，我们跟他们并没有冲突，而是跟他们的领导人有冲突，我们与他们不建立起多少是正常的关系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们希望，已经发生的冲突有一天能消除，在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之间不再制造怨恨。一句话，我们已经越过了曾经存在的障碍。当然，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在有必要的地方，我们还会讲话的。但是，我们把这放在一边，我们认为正常化对于我们的生活以及与这些国家的人民的关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铁托指出，当然，这一正常化进展并不很快，但是近来情况表明，他们也认识到，正常化不能只停留在言词上，还需要用行动来表明。他说：“他们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在做。我们欢迎他们方面的这种努力，我们将乐意接受每一个显示诚意的姿态。当然，或许再不会是百分之百地表示欢迎，而总是抱有某种保留，但是，我们仍将从自己方面竭尽所能，使这一正常化得到正确的反映，并且于我们于他们都有益。”

到底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实现正常化？铁托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当然，与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的这一正常化不可能盲目地进行，彼此拥抱一下，亲吻一下，一切就算过去了。不行，这一正常化不能破坏，也不应当破坏我们今天的对外政策路线，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改变对西方国家的关系……我们将像迄今为止的那样与西方国家合作。这一正常化不能影响我们的内部发展，不能

影响我们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正常化必须排除一方对另一方内政的干涉。按照这个原则，我们伸出了手……”

铁托最后说，他公开地、明明白白地谈到这一切，不想把什么东西藏在幕后：“……我们始终是开诚布公的，今天我们公开地向全世界谈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让他们去考虑该怎么办。我们的良知是纯洁的。我们致力于一个伟大的目标，和平和各国人民合作的目标。”

这一年10月，铁托向法国《南方电讯报》记者勒内·莫里发表谈话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以苏联和东方国家为一方、以南斯拉夫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关系的正常化，是完全符合我们在平等基础上与一切愿意合作的国家合作的看法的。正常化是应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倡议进行的。我们接受了倡议，同时没有必要改变我们对外政策的方针或者在任何方面担心我们的独立……我们坚信，今天怀疑共处是当代发展国际关系必要前提的那些人，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改变看法的。”

1954年11月26日，南共联盟召开第四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把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列入了议程。在这次会议上，铁托说：“从今天将在这里宣读的这些信中，你们将看到，南共联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国家关系方面取得了胜利，而我可以说，在思想方面也取得了胜利。因为在我们这里这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胜利在于情况已经表明，他们过去所说的，过去对我们的诽谤是不对的，这是他们自己得出的看法。胜利还在于我们通过日常的实践做到了甚至使他们也对我们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兴趣。一句话，他们承认，我们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

铁托接着说：“同志们，无论如何，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我国要在各个方面保持自己目前的地位，这是通

过巨大的牺牲和巨大的努力才达到的，也就是说保持一个独立国的地位。这个国家有自己独立的对外政策，它在不受外来对它内部政策干涉的情况下，正在沿着自己的道路和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国家正是凭着自己独立国的立场在世界上赢得了崇高的声望。在涉及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的时候，它在一切方面是具有高度原则性的；这个国家不愿成为任何人的卫星国，这一点，西方人也相信了，现在涉及与苏联的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它也是把这个问题放在这样的基础上来考虑的。这些话已经告诉他们，过一会儿你们也会看到，他们在自己的信里认为我们是对的，他们承认了这一点。”

南共联盟第四次中央委员会决定改善南苏关系的重点应放在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上，因为1948年在情报局与南斯拉夫的冲突中，首先涉及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国家关系正常化应该建立在积极的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排除对国家内部发展的任何干预。关系正常化不能理解为一个集团内部调整关系和把南斯拉夫纳入“社会主义阵营”。会议认为，两党合作也是可能的，但必须与其他工人运动也建立这种合作。而且南共联盟不回到情报局中。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西方国家普遍关心的是，南斯拉夫是否有可能回到1948年以前的态度上去。因此，当美联社记者亚历克·辛格尔顿1953年8月10日在布里俄尼见到铁托时，就向铁托提出了这个问题。

铁托回答说：“不论苏联如何朝着改善关系和通过协议解决一切国际问题的方向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南斯拉夫再也不可能回到自己1948年以前所采取的立场上去了……南斯拉夫愿意同苏联以及同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保持正常的关系，

当然，我们认为，这种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良好的关系才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我们希望我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在各方面保持独立的态度，我们特别希望保持在国际问题方面有充分的自由这样一种权利。”

这位记者接着问：“一旦苏联变得比较友好，南斯拉夫是否会回到情报局？”

铁托坚定地回答：“不会！”

当铁托从西方报纸上读到南斯拉夫“又回到他们原来那一伙中间去了”这样的论调后，他又一次明确地回答说：“应当一劳永逸地把问题说清楚，幻想我们有朝一日会放弃社会主义，转而加入某个资本主义阵营，这一切想法都破产了……东方的人也好，西方的人也好，都应当明白，我们在对外政策上是不会背离我们自1948年起为自己开拓的道路的，也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道路……人人都应明白，我们不会充当任何人的政策的尾巴……今天，东方也应明白。我们再也不想回到1948年以前我们曾经处过的那种地位，我们对他们说，‘不行’。鉴于我们当时就说过‘不行’，我们现在再同意重新处于这样的境地，这是愚蠢的。这根本不可能。”

● 难忘的 72 天

1954年下半年开始，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停止了反南宣传，停止出版南斯拉夫政治流亡者的报纸，并解散了他们的组织。国际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缓和趋势。铁托认为这是一个向世界人民阐述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大好时机，他开始了长达72天的亚洲、非洲之行，访问了印度、缅甸和埃及3

个友好国家。

1954年11月30日，铁托乘坐“海鸥”号游艇，首先前往印度访问。在印度他受到了印度人民极其热烈的欢迎。印度共和国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在议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我们感到荣幸的是能够欢迎铁托总统这一位英雄的南斯拉夫人民的领导人，他今天正在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斗争，为所有的人享有政治自由、为所有的国家在经济上得到发展以及为世界上的和平和合作而斗争。”

拉达克里希南继续说：“总统先生，您阐述了与这些伟大的理想相关联的贵国的梦想，这些伟大的理想不仅使欧洲和美洲，而且也使东方，从埃及到日本，激动不已……在世界目前的关系中，南斯拉夫占据重要位置……这些共同的目标把我们两国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在这里把您看作是一个遥远的国家的代表来接待，这个国家关于各国人民享有政治自由，关于经济上公正待遇和世界和平的理想，也是我们所具有的。”

铁托在欢迎仪式上也发表了演说，他对800多名议员说，南斯拉夫人主张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一律平等，反对任何方面对其他国家人民的内政进行干预。他认为，当前存在四个主要消极因素，构成人类今天担心的所有那些罪恶的原因。第一，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不平等；第二，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生活，而进行干预的往往是或者几乎是那些最发达的大国；第三，世界被划分为利益范围和集团；第四，殖民主义。国际关系的实践不消除这四个因素，人类就休想摆脱对自己命运的担心。

他还第一次公开向印度的议员们谈到了南苏关系正常化

的问题，他指出，关系正常化的倡议是苏联提出来的，苏联现在负责的领导人后又声明，他们 1948 年的行动是错的，他们错误地谴责了南斯拉夫。这样一些声明以及有朝一日将世界知晓的其他一些声明，促使我们接受了正常化，更由于这是符合南斯拉夫的愿望的，南斯拉夫愿意与一切愿意合作并尊重平等原则的国家合作。苏联领导人说他们尊重平等关系和不干涉南斯拉夫内政，这大大推动了正常化……与其他东方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同样也得到改善并恢复关系正常化。因此，在与这些国家接壤的边界上有时具有威胁性质的紧张局势现在和缓了，情况变得正常了，这对于南斯拉夫以及对于这些邻国来说，都大大减轻了负担，而对于全世界来说，这是对巩固和平的一个贡献。

铁托接着说：“我确信，苏联方面对南斯拉夫的这一改变不只是已经得到确认的一些事实的结果，即在斯大林去世之前，苏联有一些人蓄意制造谎言，丑化南斯拉夫；这一改变同样还是苏联今天的领导人奉行的内外政策改变的结果，说来奇怪的是，他们自己不想承认这一点，而在我看来，承认了这一点只会有好处。”

在印度，铁托足足访问了一个月时间，不论在任何地方或任何场合，铁托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12 月 22 日，在新德里的海达拉巴德公园举行的招待会上，铁托就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对印度人民社会党主席阿查里亚·德夫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按照刻板的方式来建立内部制度，这是明明白白的事。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要求有不同的道路通向社会主义……我们南斯拉夫人有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从 1948 年起，它就不是按照苏联制度的发

展方针,而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根据我国存在的特殊条件发展的。”他在解释这一制度时说:“主要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和更美好的生活。而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可以是不同的。”

1955年1月,铁托从印度启程去缅甸访问,缅甸人民同样热烈地欢迎铁托的来访,仰光大学校长吴努还授予铁托为名誉法学博士,这是这所大学存在60年间向第一个外国人授予的第一个这一类称号。接着,铁托乘“海鸥”号游艇访问了埃及,和埃及总统纳赛尔就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问题,以及就两国直接关心的问题,友好和全面地交换了意见。

1955年2月11日,铁托结束了72天的长途旅行,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在贝尔格莱德,他受到了大约30万市民的热烈欢迎。

亚非之行使铁托深受鼓舞,爱好和平是世界的主流,这使他坚定了要为改善国际局势和维护和平而进行顽强斗争的立场,同时也更坚定了继续执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决心。他对他的人民说:“正是由于我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具有我们这样的内部制度,在遥远的亚非国家,我们才受到热烈欢迎……我们不必感到害臊,我们谈论了我们的困难、我们走过的艰难道路、我们的过去和现在以及我们的成就,他们对我们也同样坦率亲切相待。”

尽管国际形势出现了缓和,尽管赫鲁晓夫主动和南斯拉夫握手言和,但是,铁托决心不加入任何一个集团,他说:“但愿任何人都不要寄希望于我们参加任何一个集团……我们对任何人都公开地说: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愿意成为你们的朋友,如果你们成为我们的朋友的话,我们不想靠损害一方来获得另一方的友谊。我们愿同所有的国家,既同西方国家,也同东方国家友好。”

铁托竭力反对集团。在他看来，世界理应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应当成为各国彼此相争的原因。意识形态分歧不能成为把世界划分为集团的原因。”他始终认为，只要存在集团，对人类的威胁总是严重的。当某些外国记者就此向铁托提出挑衅性的问题：“那好，那你们站在哪里呢？你们是中立派吗？”铁托回答说：“不，我们不是中立派。我们十分积极，我们完全公开地说：不要陷入新的危险……靠手中的武器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没有任何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值得各国人民今天为它去流血，或者为它发动一场局部战争。没有任何这样的问题！”

● 迈出和解的第一步

赫鲁晓夫决意改善苏南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为此两国领导人必须会晤。但是，问题是在哪里会晤？是在莫斯科？贝尔格莱德？还是在某个第三个地方？铁托肯定不愿去莫斯科，他已对自己最亲近的战友说：“这肯定是一次有益的会晤。只不过，我不愿去那里。让他们到这里来。是他们造成这样的关系，现在就让他们来吧！”

确实，该是苏联首先显示诚意的时候了。赫鲁晓夫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怎样去同铁托接触才是最好的方式，当这个问题提出来时，有些人认为，我们请南斯拉夫人到我们这儿来谈判。我说这根本不能考虑。第一，我不相信他们会接受邀请。这会显得他们恭恭敬敬地来乞求我们。第二，是我们主动断绝了同他们的关系，是我们在他们攻击我们之前就公开攻击了他们。因此应该由我们采取主动来结束分裂。第

三，我们是大国，大党，在共产主义世界享有崇高的权威和威望。万一南斯拉夫领导人到我们领土上来会见我们而又不能达成一项协议的话，他们要冒很大的风险。”克里姆林宫里的其他苏联领导人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

于是5月初，“苏联代表团将前往贝尔格莱德”的消息像一阵风传遍了全世界。1955年5月15日铁托在普拉庆祝伊斯特拉和斯洛文尼亚沿海地区解放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第一次对此事公开表态：“……我可以这样说，我和我们大家对于苏联负责人士这样大胆的决定，对于他们决心来同我们会晤只能表示欢迎……我们在为这一会晤作准备的过程中就向他们表明了全世界早就知道，我国人民也知道并坚持的立场，那就是我们希望在平等的基础上会谈。我们希望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进行会谈，我们希望今后跟现在一样，在我们各个方面的活动中完全保持独立，我们希望谁也不来干涉我们的内政，我们内部制度问题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人，不论他来自东方，还是来自西方，来干涉我们的内部问题……”

铁托的这番话意味深长，他想让莫斯科知道，将要举行的最高级会晤应基于何种出发点和条件；同时也想让西方知道，南斯拉夫决不搞什么幕后的名堂，也决不会由此而改变南斯拉夫的现行政策。铁托再一次明确表示，南斯拉夫不想加入任何一个集团，南斯拉夫反对集团政策，它只赞成各国人民和各国之间实现平等合作和积极共处，不论它们的政治和内部制度的区别如何，他说：“最近将在贝尔格莱德进行的会谈将在这一基础上、在我国和苏联及东方国家间合作的基础上、在尊重主权和独立的基础上进行……我认为，这将是朝着缓和世界目前紧张局势的方向作出的最重大的贡献之

一……今天，我们终于到达了人们再次愿意坐下来会谈的阶段，我认为，这是巨大的成功。”

会晤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55年5月26日，双引擎的UJ-12型飞机载着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和国家代表团于下午5点整在贝尔格莱德机场降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有布尔加宁、米高扬、葛罗米柯、谢皮洛夫和库米金。赫鲁晓夫的情绪始终很好，很自信。飞机起飞前，他曾微笑着对前来送行的苏联其他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人说：“我相信，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顺利解决的。”

飞机在贝尔格莱德机场大楼前停下后，首先露面的是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瓦利科夫和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多布里沃耶·维边奇。随后，在机舱口出现了赫鲁晓夫，在他后面是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铁托走上前去，并伸手握住了赫鲁晓夫的手。铁托祝他们在南斯拉夫逗留愉快。苏联代表团成员接着同南斯拉夫最高领导人互相致意。军乐队奏起了两国国歌，接着是检阅仪仗队。赫鲁晓夫身穿一套浅灰色服装，表情严肃，站在他后面的是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在他右边的是身穿浅色元帅服的铁托，而在左边是身穿黑色礼服的南斯拉夫领导人，他们个个也都表情严肃。

赫鲁晓夫走到扩音器前，从口袋里拿出一份写好的讲话稿念了起来：“亲爱的铁托同志！亲爱的南斯拉夫政府成员同志们和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同志们……苏联代表团来到贵国，是为了同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一起确定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的道路……”

“众所周知，在那几年里，在苏南两国人民之间，在我们两国和两党之间发展了最好的关系。然而，后来这种良好的

关系遭到了破坏。我们真心诚意地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并且要坚决消除这个时期中的一切芥蒂。从我们方面来说，毫无疑问，我们把今天已被揭露的人民公敌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等人在南苏两国关系中所起的挑衅者的作用列入其中。我们透彻地研究了当时对南斯拉夫领导人提出的严重指责和污蔑赖以为依据的材料。事实说明，这些材料是人民公敌，钻进我们党内的帝国主义可鄙的代理人伪造的。

“我们深信，我们的关系恶化的时期已经早已成为过去。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愿意做一切必要的工作，来排除妨碍我们两国关系彻底正常化、妨碍我们两国人民关系加强的一切障碍。作为列宁创建的苏联共产党的代表，我们认为，在我们两党之间恢复相互的信任是可取的……如果我们未能尽一切可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来重建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的相互谅解，我们就没有履行对我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职责。”

显然，赫鲁晓夫的这个机场演讲太让铁托失望了，赫鲁晓夫将苏南关系恶化的原因轻描淡写地推到贝利亚一个人身上，这怎能令南斯拉夫的领导人信服呢？赫鲁晓夫念完讲稿后，铁托没有致任何答词，而是立即用汽车把客人们送往临时下榻处：德迪迪的故宫。

赫鲁晓夫对于铁托在机场对他的冷淡很是不愉快，他后来回忆说：“我们登上南斯拉夫国土时，受到了对一个来访的国外代表团应有的一切礼遇。但是，看不到任何兄弟般的感情。领导和人民对我们都显得拘谨、小心。我被邀请在话筒前讲话，我的讲话是集体领导草拟的。因此与其说是我个人的见解，不如说是苏共中央领导的意见。在我讲话后铁托说：‘你看，我们用不着把你的讲演译出来，在场的人都懂俄语。’

我想他是在故意显示我们在总的气氛中已经感觉到的那种保留态度……我必须承认，我对我们在机场上受到的冷淡接待有些失望……”

1955年5月27日，两国代表团在专为这次会谈准备的托普契德尔的近卫军之家开始了正式会谈。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7年前，当南斯拉夫同情报局发生冲突的时候，正是在这里召开了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南共的誓师大会，全党团结一致顶住了巨大的压力。铁托曾在这里充满信心地说过：“我们的胜利是确有把握的。”历史应验了铁托的预言，今天苏南握手言和，近卫军之家又成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所在地。

这天上午，铁托在近卫军之家欢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时说：“同志们，我欢迎苏联代表团……我有机会在这里，在我国欢迎苏联代表团，我感到高兴。我们今天在这里见面，是为了研究与国际局势和我们的相互关系有关的某些问题。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深深意识到这一伟大事件的意义……我知道，还有各种各样的障碍是现在在这张桌子旁无法立即加以消除的。不过，我还是寄希望于我们在这里、在这次会议上能够为我们今后的关系提出一些原则……”

赫鲁晓夫的开场白这样说：“你们到我们那里去要比我们来你们这里更困难，这一点我是理解的。因此，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一致认为：为什么我们要到丛林后面的某个地方会晤呢？不如我们就去贝尔格莱德，开诚布公地谈谈我们对事情是怎么看的……我承认，最初是我们方面开火的，而且做得并不体面，因此，我们也有责任首先提出停火……”

接着赫鲁晓夫以嘲笑的口吻影射南斯拉夫同西方的关系：“当然，现在会有热闹看了。不过，他们美国人又能怎样？”

考虑到我们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是相近的，他们可能……不给你们钱。”铁托立即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我们不会为了钱而出卖自己！”赫鲁晓夫发现自己说漏了嘴，赶紧转变话题说：“我有责任指出，尽管遭受到种种指责和蔑视，你们体面地顶住了，你们懂得维护自己的政策和独立……”

在赫鲁晓夫结束自己的长篇开场白前，还说了几句为自己开脱的话：“我们在这里分手的时候，应当既不是战败者，也不是战胜者，而应当是平等的，是改善了关系、讨论了种种问题并找到了将使我们接近的道路的朋友。”最后，他建议“忘却我们之间的分歧”，铁托表示“同意彼此可以取得一定的谅解”。

第一天的会谈结束时，赫鲁晓夫感到满意，他笑着对铁托说：“如果你们和我们的外交官不从中作梗的话，一切都会顺利。”铁托也笑着说：“但愿如此！”

第二天，会谈继续进行。铁托心情愉快，首先他以开玩笑的口吻问赫鲁晓夫：能否允许他坐下来讲话？另外是用俄语还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讲话？赫鲁晓夫回答：“好，铁托同志，没有问题，没有必要站着讲。我可能有站着习惯。我喜欢站着，这是我的习惯。人是好动的，人站着，便于做手势。”至于用哪种语言讲话，赫鲁晓夫说：“随您便！您讲俄语，我们都能明白。或许您不方便，因为您要用本国的语言思考，而讲的又是俄语。我也常有这种情况，因为我得按照乌克兰语来考虑，再翻译成俄语。”

其实，铁托的这番玩笑话还是有用意的。他今天要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早在战时就产生的一个老问题——苏南冲突的症结到底是什么？他希望赫鲁晓夫能尽量听清楚并充分理解他说的每一句话。

铁托坐了下来。他对赫鲁晓夫说，为了改善相互关系，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不论意见是否一致，要把事实说清楚：“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么，我们的整个会晤和结果都不会是我双方所预料的那样，也即不会为我们今后的关系奠定基础。我说这些话是因为我认为，导致1948年中断关系所依据的恰恰是一些没有根据的、可以说是不确凿的情报，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因为在此以前也多少存在某些误会，包括战争时期在内……特别是雅尔塔会议的结果……对于我国人民来说，这是办不到的，污辱性的……总之，这一争执是在不确凿的情报和错误对待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小国和大国之间的关系的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我国独立发展和享有充分主权的问题，这是具有首要意义的问题，我们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受到威胁，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提出了异议……”

铁托接着真诚地说，苏联没有比南斯拉夫人民更忠诚的朋友和合作者。“你们失去了这种好感，我们比你们更痛心，因为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教育我国人民，特别是教育共产党员，要对苏联抱有好感。对于我们来说，这当然是精神上的巨大打击……过去了7年时间，对于我们来说是7个艰难的年头，但是我认为，对于你们也不是非常愉快的，尽管你们是一个大国，尽管各国共产党都站在你们那一边……使我们最痛苦的是，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们听够了种种恶言秽语，把怀疑强加于我们……说我们出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赫鲁晓夫很不情愿地听着铁托的数落，他知道他到贝尔格莱德是代替斯大林来受过的，不论铁托怎样说，他只能洗

耳恭听，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反驳了几句话：“我希望弄清楚你们所说的我们的政策是针对南斯拉夫的主权这一件事。具体地说，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同志们，我们自己需要弄清楚，而且要尽可能具体地了解清楚，了解了过去，才能在今后防止出现这样的现象……”

铁托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关于这一切，我们有整理好的材料，向你们提供，没有什么困难……我认为，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这些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我国的攻击的实质在哪里？……”爱德华·卡德尔补充说：“我们还收到了一份照会，里面说，‘将用别的方式来对付法西斯走狗们’。”布尔加宁插话说：“我的理解是，斯大林和丘吉尔在雅尔塔解决了划分利益范围的事……”铁托插话说：“正是这样，对半开。”

苏联代表团成员当然不愿谈这个问题，但是，他们也看到，如果回避这一事实，会谈不可能走多远，因为南斯拉夫人显然要求作出解释。解释这一“对半开”的差事落到了布尔加宁的头上。他说：“英国人想让整个南斯拉夫处于他们的影响之下。斯大林不想同意，不想让一个斯拉夫民族有这样的遭遇，因此双方商定对半开。苏联的意图不是要掠夺南斯拉夫，而是想帮助革命运动。作为交换，英国人要求缩小我们在希腊的影响。我的理解是，我们这个协议是符合南斯拉夫的利益的，因为英国人通过让军队登陆，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目标……”

这样的解释能让南斯拉夫人满意吗？布尔加宁看到铁托和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皱着眉头，赶紧话锋一转：“提法本身确实是侮辱性的，因为两个国家进行了对半开的划分，而且是在幕后进行的。抽象地来看，这是侮辱性的做法。”

苏联代表团总是想尽量回避那些实质性的问题，他们又

把话题拉到了南斯拉夫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援助的问题上。米高扬说：“关于你们接受美国援助一事，我们当然无权加以谴责，这一点，我们是明白的。我们只是担心，你们走上政治上作出让步的道路。”

赫鲁晓夫补充说：“我们不仅担心，而且我们有情报甚至说到你们哪些地方设有外国基地。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同志们！”

铁托断然驳斥说：“在南斯拉夫，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有外国基地。”

赫鲁晓夫则以更加咄咄逼人的腔调接着说：“我们认为，资本家是不会白给钱的。”

铁托气愤地说：“你们凭什么怀疑这一点？你们凭什么认为我们可能成为西方国家反对苏联的工具？”

赫鲁晓夫解释说：“我想说的是，冲突一旦爆发，事情演变的逻辑就会是这样……我要说，我们过去的出发点是，可以说，你们不是共产党人，你们远离了马克思和列宁……我们认为你们是一个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

铁托再也克制不住了，提高了嗓门，打断了他的话：“但是，你们的逻辑不大对头。我认为，你们有可能不只一次地听到我和我的同志们的公开讲话，有可能从报上看到我们的讲话。在西方面前，甚至在我们很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从来不隐瞒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不会允许对我们内政的干预。”

这时，一位苏联代表团成员以挑战口吻插话说：“由于有这样强大的共产党，你们才未能声言反对共产主义！”

铁托立即严厉责问他：“你怎么能这样讲话？！”

赫鲁晓夫接着说：“我们曾经反对过你们。因此，你们要理解已经有了定见的反对者的心理，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你

们的讲话和公开的声明不足以证明你们果真站在你们所谈的立场上。我们当时认为，这种话可以说是说给群众听的，存在某种幕后的路线，导向截然相反的方向……”

铁托不能容忍他的这种批评，再次打断他的话说：“魔鬼也休想驱赶我走向另一种制度。我一生都在为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我一生都在斗争，我不是为了钱才干革命的。我不是为了钱才去服苦役的，我也好，我的同志们也好，都不是这样。我不是为了钱才把自己的一生用来从事革命工作的。我怎么能否定自己呢？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想？我怎么能否定‘自我’？！”

赫鲁晓夫意识到苏联方面太过分了，于是他对铁托说，他是理解铁托的，是尊重铁托的看法的，但是，南斯拉夫同志们也应当体谅他们极不轻松的处境。对于过去的一切不幸事件，他都又归咎于贝利亚和情报不确凿。

当赫鲁晓夫发现南斯拉夫代表中有人嘲笑他的讲话，甚至根本不信任他时，他有些动感情了，大声说：“为什么我们到你们这里来呢？……我们不是由于软弱才来到这里的。我们为什么来这里？我们谩骂，谩骂，把你们叫作法西斯分子，还有鬼知道别的一些叫法。而现在我们以这样的—一个组成来到这里！请你们听着，要是我们是一些不讲原则的人，要是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家，我们现在最容易做的是继续奉行原来的路线。我们现在很难解释清楚这种状况。你们知道，我在你们这里的讲话……这篇讲话更多的是说给我们国内听的，因为我们过去说过，你们是法西斯分子、杀人凶手，你们是出卖了灵魂的，是资本主义代理人以及鬼知道还有什么叫法，你们是德国间谍，要想跟你们开战！这是荒唐的事！我认为，我们说的话是对这一切指责的回答。”

铁托点了点头，表示赞许，但是他没有说话。

赫鲁晓夫想知道关于党的问题铁托究竟是什么态度，他挑战似地对铁托说：“我们已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现在轮到你们了。”铁托不想发表意见，他认为双方一定有很大分歧，担心谈起来又要发生争论，耽误太长时间，因而提议：“同志们，我认为，现在重要的是进午餐。”但是没有人响应，大家都没有起身，铁托郑重其事地说：“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在这里开始详细论述什么是原则性的问题，什么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而什么又不符合，那就会拖延很长时间。我们始终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和根据业已取得的成绩来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认为应当采用赫鲁晓夫同志所提出的那种方式来解决：我们南共联盟和苏共中央交换某种信件。我们并不怕这么做。”

赫鲁晓夫问道：“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认为，应当予以发表？”

铁托回答说：“是的。信里应当把我们之间现在的状况写清楚。”

赫鲁晓夫说：“现在我明白了，我们同意。”

就这样，经过两国代表的商定，1955年6月2日19点25分在近卫军之家的大厅里，在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在场的情况下签署了《贝尔格莱德宣言》，并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俄语宣读了《宣言》，随后，铁托和布尔加宁在上面签了字。

宣言中确定了南苏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和本着这种精神必须采取的措施。宣言强调两国政府在相互关系和国际关系中以下述原则出发：和平不可分；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平等；承认和发展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而不问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这意味着一切国

家在一般国际关系中，特别是在经济和文化关系中进行合作；坚持互相尊重的原则，不以任何理由——经济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理由——干涉内部事务，因为国内制度问题、不同的社会体制问题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形式问题，纯属各国人民自己的事；发展双边经济合作和国际经济合作，在本国经济的范围内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消除妨碍商品交换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切因素；通过联合国的组织并按照联合国的原则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提供援助以利于这些地区的人民和发展世界经济；停止任何形式的散布不信任的宣传、虚伪报道以及其他行动，停止以任何方式阻碍创造出建设性国际合作和国家间和平共处的气氛的行动；谴责任何侵略和任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配他国的企图；承认军事集团政策会加强国际紧张局势，破坏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和增加战争危险。

赫鲁晓夫后来说，这是“铁托坚持要我们作出保证”，“承认”这些原则的，因而，对赫鲁晓夫来说，宣言写上这些原则是一回事，能否真正做到则是另一回事。但不管怎么说，这是苏南和解的良好开端。

《贝尔格莱德宣言》阐述的这些原则成了南苏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各个领域里顺利地进行合作以及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合作的基础，它的签署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各国首脑纷纷发表讲话，表示欢迎。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说：“苏联和南斯拉夫通过这一方式对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事业以及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罗马尼亚人民跟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和各国劳动人民一样，热烈欢迎《宣言》中所陈述的各项原则……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为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常化以及发展友好和睦邻的关系和合作作出自己的贡献。”

印度总理尼赫鲁高兴地说：“印度欢迎向以友好方式解决争端迈出的每一步。”希腊外长斯特凡诺普洛斯说：“贝尔格莱德会谈的结果使我感到高兴……宣言是以南斯拉夫迄今为止在奉行自己的政策时所依据的准则为基础的，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变化。”

英国外交部官方发言人说：“从苏南会议一开始起，南斯拉夫政府就向我们表示，不会发生促使南斯拉夫同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现有良好关系发生变化的任何情况……从种种情况来看，在苏南会谈中，这种表示是得到遵守的……”美国国务院官方发言人说：“国务院感到高兴的是苏联公开接受了南斯拉夫的独立……”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团指出：“《宣言》是世界头等历史事件，它的后果尚待观察。为争取承认平等权利而进行的7年较量结束了，这同时也提供了积极共处政策的第一个令人信服的事例。”

《贝尔格莱德宣言》的签署也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赞赏和欢迎。1956年10月毛主席出席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席间，毛泽东主席手持酒杯来到南斯拉夫大使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身边，对他说：“为铁托的健康干杯！”并说：“我祝贺铁托，他的原则取得了胜利！”

● 情报局解散了

1956年2月14日至24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此苏联进入全面改革时期。在对外关系上，苏联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宣布“和平共处”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

在此基础上，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明确肯定了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承认了苏南关系中苏联的错误。

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权属于劳动人民，社会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了管理经济和建设国家机器的特殊具体形式。”

米高扬在会上指出，苏联新政府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敢于公开正视事实，他说：“过去，我们的对外政策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我们的过错而使关系变得尖锐紧张。苏联政府坚定地走上消除我们在对外政策领域工作的缺点的道路。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现在解决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中的问题上。当然，只有真正的列宁主义者才能采取中央委员会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间，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所采取的步骤。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大胆的步骤是多么正确，这些步骤表明，它们对于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卓有成效的……南斯拉夫革命的胜利，是我们同正在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人民建立日益深厚的友谊和兄弟同盟的源泉。”最后这句话在大会场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莫洛托夫的大会发言强调，在过去的一年里发生的某些事件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他说：“这些事件中包括同兄弟的南斯拉夫人民建立友好关系，这种关系现在正日益发展，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而且有利于加强和平和国际安全。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有几年时间存在不正常的关系，保持这种关系只会对和平的敌人有利。”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领导人的大会发言也都对同南斯拉夫恢复正常关系表示赞同和满意。

苏联对南斯拉夫立场的根本转变，使南斯拉夫人深受鼓舞。二十大在世界上引起的巨大反响以及苏联实行全面改革的立场，增强了铁托对苏联的信任。这一切使铁托更加确信，苏联的事情确实在变好。他以南共联盟的名义给代表大会写了一封信，表示真诚地祝愿代表大会顺利和卓有成效，“以利于你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以利于国际关系和合作的进一步和平发展。”

这封信中对南苏关系的改善表示满意，铁托写道：“通过你们领导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等同志去年 1955 年对我国的访问，通过发表所谓的《贝尔格莱德宣言》，不仅在我们两国关系以及我们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新时期，而且无论是在加强爱好和平的力量方面，还是在各国人民间逐步建立信任和相互谅解以及缓和紧张局势和对新战争的恐惧方面，这都对国际关系的发展起了强有力的积极作用。我认为，我们远远不能对目前的国际局势感到满意，但是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和平的呼声越来越压倒某些好战的叫嚣。最后，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关系逐步和不断地改善感到满意，正是这样一条渐进的道路对于建立相互间牢固的信任和合作来说是一条最健康的道路，而它同时也使得有可能妨碍我们相互信任的一切因素得以在日常实践中消除。”

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不久，1956 年 4 月 15 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举行了第五次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4 月 18 日，情报局发表了《关于结束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活动的公报》，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也宣告停刊。对于解散情报局的原因，公报指出，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为各国共产

党和工人党的工作创造了新的条件，因而，“认为它们在1947年成立的情报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4月19日，南斯拉夫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关于情报局解散的公报。最有影响的《战斗报》还特意为此发表了一篇编辑部评论。该报评论说：“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停止活动的决定，是一个重要的积极行动，我们欢迎这个行动，因为我们认为，不仅对于各国共产党今后的发展，而且对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这都是有益的……至于决定本身的解释，现在还不是时候来对情报局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进行详细分析，尽管我们不作这样的分析，我们显然不能同意情报局成员党在关于停止情报局活动的决定中所作的积极作用和积极评价的提法，我们的经验表明，这个机构从一开始起就被利用来对南斯拉夫奉行不正确的政策，这正式表现在情报局通过了两项反对南斯拉夫的决议。”这篇评论恰好反应了南共联盟对情报局的总体评价。

在扫除了南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一切障碍以后，铁托决定应邀前往苏联访问。4月30日南斯拉夫对外宣布：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约·布·铁托应苏联最高苏维埃和政府的邀请，于6月对苏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 铁托重访苏联

1956年5月30日午夜，铁托总统从贝尔格莱德火车站启程，乘专列前往苏联进行正式访问。除夫人约婉卡外，随同他前往的有他的亲密助手爱德华·卡德尔、科查·波波维奇、米亚尔科·托多罗维奇和亚科夫·布拉热维奇。当列车

驶入苏联国境后，铁托回想起 10 年前的那一幕，不禁感慨万端：那是 1946 年 5 月他最后一次访问苏联的事，他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里曾为“兄弟情谊”喝过交臂酒，他们因此而“结拜成兄弟”，但是斯大林希望铁托成为“小兄弟”，而自己像老大哥那样行事，试图向他这个小兄弟发号施令。然而，他这个小兄弟可不愿意事事都听老大哥的指挥，自然他们分道扬镳了。今天老大哥已经不在，苏联乃至世界都发生了许多巨大变化，铁托相信克里姆林宫不会再把南斯拉夫看成是小兄弟了。

载着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代表团成员的专列于 6 月 2 日 17 点整抵达莫斯科基辅车站。车站的月台墙壁上悬挂着大幅标语：“热烈欢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铁托同志。”月台上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前来迎接铁托的苏联领导人中有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还有苏联其他领导人：卡冈诺维奇、基里连科、米高扬、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谢皮洛夫、福尔采娃、什维尔尼克、沃尔科夫等人。当铁托身穿一套浅色元帅服出现在车厢门口时，月台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车站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后，铁托检阅了红军仪仗队。随后乐队奏起了两国国歌。伏罗希洛夫首先致欢迎词：“亲爱的总统同志！亲爱的同志们！我谨以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政府、苏共中央以及我个人的名义，在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热烈欢迎您和陪同您前来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同志，苏联人民把您个人当作友好的南斯拉夫和贵国人民来欢迎，苏联劳动人民同南斯拉夫人民有着牢固的兄弟友好的联系……亲爱的总统同志，请允许我表示确信，您

前来苏联将对加强苏南之间的亲密友谊，对更大地扩大我们两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作出新的巨大贡献，它将使苏南两国更加积极地合作，以解决当前的国际问题，以利于和平和人民的幸福。”

接着是铁托讲话，他向莫斯科的 시민致以热烈的问候，他说，他很高兴，应苏联领导人的邀请，他能访问这个伟大而美丽的国家，使他有机会在现场看看苏联劳动人民在实现更幸福的伟大未来所取得的创造性成果。他说：“我们两国人民自 1941 年至战争结束与同一个敌人的共同斗争证明一个不可辩驳的真理：我们的命运是不可分离的，我们有理由彼此赞赏和尊重。但是，发生了前所未闻的悲剧，责任既不在于南斯拉夫人民，也不在于苏联人民。我们曾经感到痛心，但是我们相信，使我们分离的一切将被克服，我们的友谊将获得牢固的新基础的时刻终将到来。由于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的正确政策，这一时刻到来了。今天，这一切全都已成为过去……”

铁托还谈到去年在南斯拉夫签署的《贝尔格莱德宣言》是建立新型南苏关系的根本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过去那样的事情。铁托说：“我确信，我们两国之间关系和友谊的这样一种发展进程不仅是对缓和世界局势的巨大贡献，而且是对国际关系的正确发展的极大贡献，是对国际工人运动和整个进步运动的鼓舞和进一步发展的路标。”

当铁托走出车站，乘车前往下榻处时，沿途受到数十万莫斯科市民的夹道欢迎，他们不断欢呼：“铁托！铁托！”的口号，接下来两天的参观访问，到处都受到莫斯科人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这一切的确让铁托激动不已。

6 月 4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设午宴招待铁托，在南苏关系破裂以后，伏

罗希洛夫曾激烈地攻击过南斯拉夫及其领导人。1950年2月，他在布拉格说：“现在的南斯拉夫的命运是可悲的……这个国家的当权派背叛了社会主义和民主阵营，逃进了资本主义和最黑暗的反动势力的阵营……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在国内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南斯拉夫人民现在和将来都不甘心于充当华尔街代理人铁托之流强加于它的角色……”如今，在布拉格发表这番错误言论之后不到6年时间，他在莫斯科把铁托当作最好的朋友来接待，是他第一个亲切地拥抱了南斯拉夫总统。在这次为铁托举办的午宴上，伏罗希洛夫要为过去的事向铁托赔礼道歉，甚至竟当着铁托的面哭了起来：“我是傻瓜……说了些多么愚蠢的话……我感到羞愧……请你们原谅我……”

6月5日，两国代表团的正式会谈在克里姆林宫开始进行。会谈中，卡冈诺维奇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苏联共产党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对待南斯拉夫党和我们党之间的冲突。我们在战前，在共产国际时期以及大战时，都习惯于把南斯拉夫党和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看成是进步的党和进步的工人阶级。我们把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不仅看作亲兄弟，而且看作忠贞不渝的列宁主义者。发生决裂是令人可怕的。现在来分析造成这一决裂的种种条件，这里不是合适的地方。我们全心全意地进行讨论，拒绝并否定我们之间曾经存在的这一切责难和这一切误会……”

“我们理解南斯拉夫党的同志们，我们理解，你们的处境更为困难，你们的创伤更深更重。我们理解……再这样继续下去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这不仅因为这是不正确的，还因为从政治上来说，对于工人阶级，对于革命运动和对于共产主义事业，这将是有害的。因为人们看了我们同南斯拉夫和南

斯拉夫共产党的关系会提出问题，新的道德、社会主义关系的道德是什么？既然共产党采取敌对的态度来解决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的道德又是什么？我们得以这一关系为例来表明，这一新道德实质是什么，如何通过共同的努力和共同讨论来解决问题。在这件事情上，必须由责任更多些的一方，由挑起冲突的一方来采取主动。

“因此我们党中央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全体一致同意，应当去南斯拉夫……成果是巨大的。铁托同志，你们的功绩在于你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困难条件下没有让资本家进入你们国家，你们保住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中的社会主义关系，你们保住了工人阶级政权。从这个根本问题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你们是共产党人……”

赫鲁晓夫为了向铁托表示友好，同时也为了彻底否定斯大林，他讲了一个俄罗斯关于毛拉和粥的故事。他说：“一位毛拉在城里闲逛。人们遇到他并问他：‘你来的那个地区有什么新闻？’他回答说，那里在向所有的人免费施舍大米粥。他是想开个玩笑。但是这个消息一传一，在全城传开了。人们奔向毛拉去过的那个地区，大家全都奔向他所说的地方。这时毛拉自己也迟疑起来了，人们都奔向哪里？‘难道你不知道？城那头在免费分发大米粥。’他摸了摸后脑勺，撩起长袍，说：‘或许真的在分发。’他也奔向他所说的地方。他自己编造了故事，又相信了这一故事……”

讲完了这个故事，赫鲁晓夫望着铁托，又看了看他的同事们，神情严肃地继续说道：“我得告诉你们，这一故事很像我们。我们自己捏造出了这场冲突，我们自己又相信了。同志们，当我们讨论去南斯拉夫的时候，当我向朋友们说我们应当去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向我们提出了种种告诫。有人友

好地拍了我的肩膀说，‘当心，把两只眼睛睁大，有可能在那里把你们打死’。……当我告诉我的女儿，一个10年级的学生，说我要去南斯拉夫，她问我：‘你到法西斯那里去？’责任不在于她，而在于我们……我回答她：‘小猪仔，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法西斯分子？这种事你知道什么？’我们是这么进行教育的，这是我们告诉她的。”

赫鲁晓夫讲到这儿似乎十分激动，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最后说：“不过，我们还是了结了一件事，我们结束了这一愚昧可耻的事，消除了这一捏造出来的冲突。我们说了，根本就没有大米粥，这一大米粥是捏造出来的。现在，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

在克里姆林宫为会谈准备的午宴上，赫鲁晓夫情绪高昂。他举杯大声说：“我提议为加强牢不可破的友谊干杯，希望这一友谊是这样一种友谊，任何‘毛拉’都不会再使我们上当，而是我们要用自己的脑袋来思考，是否在施舍粥，让我们自己经过考虑，认识到这是愚蠢的。”

苏南两国领导人在这次会谈中的基调是友好的，但所追求的目标并不一样。苏联人的目的是要“设法使苏南关系恢复到老样子”，以主动改善苏南关系换得南斯拉夫重新回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来。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就公开表示，“协调是必要的”，“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之外，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行动是不可思议的……不能每个国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那样，将是工人阶级的巨大不幸”。他还说，就像一个士兵站队一样，应该向领头的看齐。

这番话又使铁托想起了过去和斯大林在所谓老大哥和小兄弟之间的种种不快。他决不能再接受建立这样的关系，更不愿意再回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去。铁托访苏的

目的在于把苏南关系真正建立在平等、独立和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因此有一天，当赫鲁晓夫在与铁托祝酒时说：“铁托同志，让我们为牢不可破的友谊、为阵营，干杯！”铁托毫不客气地立即回答说：“阵营？我想象中的阵营是四周围着铁丝网……呆在里头一定很不舒服。”说得赫鲁晓夫很是尴尬。

6月7日，铁托访问了列宁格勒，6月11日，铁托又访问了斯大林格勒，这两座著名的英雄城市的人民给了铁托隆重而又热烈的欢迎和接待。铁托永远忘不了39年前的1917年6月，他作为战俘曾来到过列宁格勒（那时叫彼得堡），在这里，他认识了什么是革命，并且还走上街头亲自参加过工人、士兵反对战争和资产阶级政权的示威斗争。今天他作为南斯拉夫国家元首和党的领袖又旧地重游，回首往事，历历在目，他怀着激动而又自豪的心情谈到自己很久以前在这个革命摇篮城市的逗留。他说：“当时，我还是青年，我就认为俄国有伟大的前途。我在这里看到工人们慷慨激昂。我是街头斗争的见证人，我也多少参加了一点街头斗争。我当时明白，工人们决心维护自己的自由，为自己争取更美好的生活。此后不久，同年10月，工人们就结束了过去，走上了新的道路——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6月20日，访问结束，两党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关于南共联盟和苏共的关系的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宣言强调，将继续进行两党合作，其出发点是：国家不同，情况各异，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各不相同，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和形式问题上，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任何倾向，都是不能容许的。两党一致同意，南共联盟与苏共之间的合作“应当以完全自愿和平等为基础，以友善的批评和就有争论的问题同志式地交换意见为基础”。宣言既没有提到“意识形态团

结”，也没有提到“社会主义阵营”，这无疑又是铁托坚持的结果。

● 尾声

苏南关系的正常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被看成是共产党之间关系新时期的开始。《贝尔格莱德宣言》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则成为南斯拉夫与东欧国家以及与其他工人运动和进步运动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从此，开始了苏南和解的新阶段。在苏南关系全面恢复的基础上，南斯拉夫恢复了同东欧各国和各国党的关系。苏南签订的两个宣言，其意义大大超出了苏南两国关系，对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具有借鉴意义，为它们在同苏联打交道时争取独立和平等扩大了回旋余地。

以铁托为首的南共联盟不屈服于大国、大党的压力，一直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为建立与各国各党之间关系的新准则而不懈地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给小党小国树立了榜样。铁托赢得了世界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称颂。

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说：“一个人要享有民族威信，他的国家不一定是一个大国。例如铁托享有国际威望，是因为他首先享有民族威信。”

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最严峻的年代里有这么一位领袖，这是他们的幸运。我把铁托总统看成是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他毕生为南斯拉夫的独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以及团结而进行的斗争，他赢得了世界公众的尊敬和称颂。他的政策一向是

为和平服务的。”

意共总书记路易吉·隆哥说：“我说不清后来我见过铁托同志多少次。刚一解放我就亲自率领意共代表团去南斯拉夫。铁托同志的倔强的个性，他的个性和广阔的政治见解，每一次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在我们两党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在我们之间关系最紧张的时期，铁托同志，他所领导的党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也为民族解放的共同事业，为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说：“铁托在美国是受欢迎的客人。铁托总统在战争与和平环境中都有非凡的生活道路。尽管美南之间在观点上有分歧，但美国前政府和现政府都坚信南斯拉夫的独立，欣赏南斯拉夫为维护自己的独立而作出的努力。”

1975年南斯拉夫总理访华，毛泽东主席接见他时，称赞铁托是铁，不怕压，压不垮。这是对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十分形象的评价。

苏南冲突最终以独立自主原则的胜利而告一段落。如今，随着苏联、南斯拉夫的相继解体，它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早已成为过去；但是，这段历史却永远令人难以忘怀，它留给后人的将是无尽的思考。